

洒扫封尘 启迪来者
——读《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区。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

1988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陆和港台约30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27篇，大致是就陈寅恪生平曾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题探讨。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死于1969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80岁。这80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的处分。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

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国的赤子之忧，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 and 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路和走向。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陈寅恪史事新证

近日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很受启发。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档案材料，及有关人物的书信、日记、谈话、回忆，好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对研究陈寅恪晚期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我过去也写过几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文章，自谓对他前期的几部著作和有关隋唐史的文章多少有所把握，对他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虽心向往之，有所研索，但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位大学者当时的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总是未敢贸然着笔。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去了解得具体了。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我从1958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书中提到1961年3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又说同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页320引1961年《陈寅恪近况》，说“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

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我在1995年初曾写过《齐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同年第3期。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供参阅。

1960年8月22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1960年8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12月12日给杨荣国的信：

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

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 21 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 1961 年 1 月 6 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 3 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有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出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年3月中华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年3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年1月10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生退稿的。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淡，无所获。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时隔三十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阅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所获呢？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年轻时看《红楼梦》，与40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奴隶主意识。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片言只语，往往能使人咀嚼再三。如说曹植“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说五言诗到了阮籍手里，增加了“文人化的程度”。又说陶渊明“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划山水的人；他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但谢灵运不像陶渊明，陶诗中也讲哲理，这些哲理“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而谢则“像硬装进去似的”。同样说理，杜甫又有不同，杜甫“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至黄庭坚，虽继续将诗散文化，但由于刻意求新，“使每个字都斩绝地站在字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这些评论，既见出朱先生作为有高度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的工力，也包含有他作为诗人的精致的审美体验。

可是《经典常谈》写作时是作为普及读物而写的。我作为 50 年代前期的大学生看了觉得不够味儿，料想现今的大学生也不会对它有特别的爱好。由此我想到古典文学的普及应有不同的层次。《经典常谈》可以说是普及读物，但这是专门研究基础上向具有中高级的人作的普及，不是一般的鉴赏或赏析。它是在严格的知识传授的意义上，对古典作出系统的评析，这可以说是普及的中间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中间环节，再作浅近一些的普及。我总感到，目前古典文学的鉴赏、赏析作品，数量很多，五花八门，但一是讲得太腻，二是有不少知识性的纰漏。这方面的读物存在着提高科学性的问题，就需要有如《经典常谈》一样较高一层的普及著作，也就是普及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作品。在普及读物的写作上也应提倡多层次，不要简单化、一体化。

感召

前些日子听说《叶圣陶文集》已经出版了，想来卷帙一定繁富，可惜无缘拜读。近来因偶然的机，从我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获睹几件叶圣陶先生手迹的复印件，读后受到一种人格与文品的感召，久久不能平静。特记于此，谨以自勉。

从 1958 年起，中华书局即致力于《永乐大典》散佚本的辑集，至 1959 年，已从国内外公私所藏收集到 720 卷。为供学术界研究、观摩，中华书局于该年 9 月选印其中一册，全照原书大小式样，影印仿制出版。这一仿制本前面有一篇出版说明，由编辑部一位同志起草，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特地将这篇出版说明送请叶圣陶先生修改。

这篇出版说明篇幅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由 720 字一张的稿纸誊写，共 32 行。使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行都有叶老修改的笔迹。叶老修改，每一个虚字、每一个标点都不放过。譬如文中说《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叶老把“七”字下的顿号删去，并在旁边批注：“此顿号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一句“未毁者几全被劫走”，叶老改为“未毁的几乎全被劫走”。原稿“劫”字写成“劫”，叶老特地勾出来，用毛笔正楷写成“劫”。最后一段原稿说：“要说明《永乐大典》这一类型的百科全书，这一册的内容是具有代表性的。”粗看似也说得过去，但被叶老划去了，并特地在文末写了三行字：“一册的内容具有代表性，可以知道全书的体例和规模，我觉得想不通，恐怕一般读者也想不通。因此，代表性的说法不如删去。如果必须保留，就该说得明白些，说明从什么几点可以见出这一册的代表性。”经这几句一点，真使人豁然开朗。

叶先生当时的工作是很忙的。他在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忙碌殊甚，每日上下午非开会即商量文稿，傍晚归来，颓然无复精神。”但他还是对这样一篇极为平常的文稿作那样仔细的审阅和修改，一点“大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1959 年至 1960 年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是朱先生以通俗的笔法介绍古代经典文献的著作，解放前即出版，无论专业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都爱读。这次中华书局重印时，拟请叶老写篇序。由叶老为此书作序，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华书局文书档案内保存了叶老为此事给金灿然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

“作序之事，非我所宜。您应了解我，古籍云云，我之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人皆以为我知道什么，我实连常识也谈不上。此一点恐不能叫人相信，以为我谦虚。您与我相识十年，且非泛泛之交，当知我言非虚也。苟我稍有真知灼见，则佩弦为我之好友，于其遗著，有不肯欣然作序乎？至希亮察。”

我想，读了这几行信中语，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叶老的人品，真如光风霁月，能使人胸中连一点灰渣尘屑也可以去除得干干净净。叶老说他于古籍，其知识并不超于高中学生，因而不敢为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作序，我相信这是叶老真诚的谦虚，也是真正学者的一种自爱。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被捧为什么“大师”，有时却连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也会在笔端中流出，却颐指气使地训斥别人，对照叶圣陶先生的这几行文字，不知会有什么想法？

启 示

——读顾颉刚一封论《尚书》今译的信

前些日子我在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看到顾颉刚先生一封亲笔长信，读后很受启发。我曾翻阅过顾潮同志为其父所作的年谱（《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书中未曾提及此信。因此我想把信的主要内容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或许对目前的某些学风会有一些针砭的作用。

此信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时间是1959年6月25日。顺便提一下，反右以后，1958、1959年，政治运动还是连续不断，这也波及到当时年已届六十六七岁的顾老先生。从《年谱》可以看出，这两年顾先生无论公私两方面都极忙。1958年他已受命点校《史记》，2月份又有几天出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当时齐燕铭为组长）。从2月起，一直到年底，就连续参加政治运动，如2月到8月，“参加民进整风，作交心资料及检讨书十多万言”。按十多万言，可以说是一本专著了，不知尚存否，这倒是一份有价值的当代文化史材料。据《年谱》，3至4月，又“参加历史所整风，写大字报及检讨书”。11月至12月，又出席民进中央会议，写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而12月，历史所又展开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顾又被作为重点。不过好在于1959年初，他应历史所、中华书局之约，整理《尚书》，稍能回到书斋中来。但运动还是不断，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在四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他作了《我在两年中的思想转变》发言，据说在这次发言中，他谈了这些年来“以运动太多，不能从事业务，此知识分子同有之苦闷，而予暴露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注意。但过了半年，11月，又不得不“参加历史所反右倾主义运动”。

我之所以罗列上述材料，是想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想搞一点学问，就环境来说，是何等的不易，这在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了解我所要介绍的这封信可能也会有所帮助。

上面说过，顾颉刚先生就历史所、中华书局之约，正式开始整理《尚书》，这当也是上级领导之命，光是历史所、中华书局是决定不了的。但不管怎样，顾先生对此是欣然接受的。所以他的信在开头时就说：“翻译《尚书》为现代语，这是五四运动后我所发的大愿，40年来没有一天忘掉，只是为了生活的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解放初，我在上海诚明文学院担任‘尚书研究’课，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翻了几篇；那时书籍分散，仅就手头所有凑集成文，不自满意，故未发表。许多朋友们知道我这件事，都劝我把这事做完，因为如不译为今语，一般人对这部书就不能读；可是学校功课一停，我又忙于别事，不能做了。现在这件事已定为我在科学院的工作，我欣幸这个愿望会逐渐接近实现。”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到，顾颉刚接受这一“任务”，是何等欣喜，这倒不是藉此可以逃避政治，而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他慎重提出：“但这是一件非常细致和复杂的工作”。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即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

首先，他认为，要译成今语，必需先认定《尚书》本身的文字。这本是古籍整理中极易理解的常识性问题，但目下的一些今译者，对此却往往漠然视之，他们可以随手拿来一个本子，不管正误如何，就可立即翻译。顾颉刚先生则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必须先决定了是不是这个字然后可以决定该

不该这样解。”他说，《尚书》中有错简，有缺文，有衍文，有误文，又有注文混入本文的。在汉朝，又有今文和古文的问题。随后他举例说：“例如《盘庚》里的‘心腹肾肠’，似乎很讲得通，但这是后出的古文本，在较早的今文本里是作‘优贤扬’的，意义太不同了，究竟应用哪个本子，应当怎样去解释它呢？”

我想，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其意义已超出于《尚书》整理的本身，而是涉及学术的严肃性与规范性的问题。正如顾先生接着提出的：“我们如不仔细校勘一番，岂不是放弃了前代学者的优良传统，岂不是会被世界各国的汉学家所嗤笑？”因此他认为：这一基础工夫是省不得的。

在确定了文字以后，接着就是正确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信中的第二点就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离开现在已有2000年到3000多年的时间，‘语法’或‘成语’早已变了样子，所以其中诘屈聱牙的殷盘、周诰在西汉时已读不懂，这只消看司马迁的《史记》，对于这些文字只能作一些空泛的叙述，或竟避而不书，书而多误，不能用汉代的语言文字译出，就可明白。”顾颉刚先生行文有一个特点，他往往能把深奥的学术问题用浅近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古史辩》文章是如此，后来连续在《文史》刊物上发表的《尚书》译解是如此，这里的几句话也是如此，确实表现了一位学术大师的本色与风度。

对《尚书》文字的理解，自汉儒起，就各有各的说法，有些是言之有据的，有些则以意为之，今天就需细心辨析。要辨析，就要看书。关于这一点，信中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项工作为有这样大的困难，所以最好先有一个充分的读书时间，把大量的书读了，再来作翻译。但我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不可能太长，所以只得‘重点’地读书。依据现在的计划，该重点读的书约有50余种。”在此信后即附有这50余种书目，从孔安国、孔颖达起，历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学者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器时代》，于省吾的《尚书新证》等。我想，光是把这些书浏览一遍，就已很了不起了，这要花多少时间。在商品大潮中，从某些人看来，这样做岂非傻瓜。应当说，开出这50余种书单，是表现了一个真正做学问者的气度和责任感的。

信的第三点，着重提出，《尚书》的翻译，不能仅凭一己主观的理解。信中说：“从前我翻译《盘庚》、《金縢》的时候只32岁，年轻胆大，凭着一股勇气，几天之内就译出来了。现在呢？年纪大了已不止一倍，读书越多，胆子越小。而且这是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自有其当代的学术水平，也有其国际的汉学水平，不容许我轻率从事，否则就对不起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一般读者对我的期望。所以我计划，每译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发给各专家评定，这是《尚书今译》的群众路线，非走不可。”信后附了一个名单，有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尹达、侯外庐等），有文字学家（唐兰、容庚、于省吾等），有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陈乃乾、顾廷龙等），有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等），有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高名凯等），有科技史家（钱宝琮等），共四十余人。《尚书》今译走群众路线，这确也是新鲜事。

信的第四点，说自己年龄已是67岁，健康又不太佳，因此提出请中华书局提供一至两名助手，帮他搜集材料。这也是情理中事。

信的最后说：“总之，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必须

集中了版本校勘之后方始可以写出一个定本；必须把各时代的解释细细研究之后方始可以有所取舍，确定经文的意义；经文有了确定的意义之后方始可以着手标点和翻译。又《尚书》是哪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成书之后又在封建社会里起过怎样的作用，我们该把这些情况列举出来，为中国历史增加些资料；《尚书》是怎样编写的，各篇的文字和它们的出现有些什么问题，它的事件先后和写作先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矛盾，我们也该细细地批判，为古籍校订学增加些资料。”这一段话不啻是研治《尚书》的入门之学，确实为顾先生数十年间的治学经验之谈。

我已把信抄录了很多，但我还想抄录一段，这段话就不止是治学了，而更见出一位真正对学问、对事业负责的读书人的人品：“我自知，自己功力不够，工作上存在许多缺点，好在有几十位专家在，只要我诚心诚意去请教，未必不能讨论出一点道理来。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将来各种重要古籍都得译为今语，我这个工作虽然做得慢一点，对于你局的整理古籍工作也许可以奠定一部分的基础；而我个人到了晚年，能在科学院的领导和你局的协助之下作出一点贡献，更是莫大的光荣了。”

我想，这就是一位文化工作者的良知。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不必靠广告效应，不必求吹捧评奖，它自能在历史上显示出其价值和力量。

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在古典文学界，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也未能被充分的理解，而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研究。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需要提高，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向前辈学者学习。这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特别是对一些有突出成就，能体现一代学术发展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作细致的、虚心的研究。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要取得当代意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这样壁立千仞的著作，我们如果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还不断地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已知的认识，怎么有真正的研究可言呢？钱先生在治学上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就是树立一个高标准，使我们懂得，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这样的治学才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这才使一切有志者不致浅尝辄止，而奋进不已。我想，真正静下心来读钱先生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或比我们晚一些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获有多有少，笔法有新有旧，但似乎总有一种程式，不管搞一个作家论或作品研究，或一个时代、一个命题的探讨，总摆脱不开一种固定的格局。而钱先生却不然，在他那里，似乎已纵逸于一切程式或格局之外。钱先生没有特地写什么作家评论，或什么某某研究、某某诗评，他似乎在行文中偶一涉及，但就是这些看来不经意的寥寥数语，却正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髓所在。这种能超然于程式、格局的学术研究，古人往往用化境加以形容，正是我们要着力研究之点。这可能会突破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的较为单一的缺陷，使研究者视野能有所开阔，从而活跃研究的空气，丰富研究的内容。

但钱先生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学养不到这一步，勉强模仿，就会显得做作。钱先生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明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有些人的诗文笔记，特别是明清人的一些作品，似乎除了钱先生引述过以外，过去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经钱先生一加引述，使这些本来似乎无甚意义的作品获得新的价值，也使读者在认识和鉴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会有如此丰富的宝藏。

对于古典文学界来说，研究钱先生的著作应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他们正在取得成绩，但这种研究格局的数量和规模还远远不够，与钱先生的贡献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太不相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

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钟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

承程千帆先生的好意，寄赠给我一部由他整理编录，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汪辟疆文集》。汪辟疆先生，作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专家，恐怕现在中年以下的学者知道的是极少的了。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50年代时由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这是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以外研读唐代传奇的最切实用的入门书。书中于每篇作品之后所作的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和后世演变等等，对于初学者不啻开启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现在读到这部近70万字的文集，真有如过屠门而大嚼，虽当酷暑，也像五柳先生所自赏的那样，“孟夏草木长，时还读我书”起来。

汪先生名国恒，字辟疆，又字笏云，号方湖，1887年出生于江西彭泽。1909年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毕业。他长期执教于过去的中央大学及后来改名的南京大学。1966年3月去世，时值“文革”前夕，但终究没有逃脱劫难。——他自清末至一九五四年数十年间从未间断的百册以上的日记全部被掠，残存的仅三册，一册是一位教授在南京夫子庙的冷摊上买回，另外两册是掠夺者于匆忙中遗落。见到《文集》前面影印的两张日记残叶，望着那正楷书写、一笔不苟的隽洁书迹，真令人痛惜。

通读文集全书，深感这位学者治学门庭的宏阔。他研究版本目录，又对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颇下一番功夫，写出几篇结实的考订文章；又研究汉魏古诗和唐人近体诗，他的几篇谈李商隐的文章，至今尚能给人启发，他在日记中说的“义山人地寒微，但知有知己之感，实无恩牛怨李之成见”，寥寥数语，明达透澈。不过我认为，文集中最好的还是论近代诗派的几篇，特别是《近代诗派与地域》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60年代时我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读到他的《论高密诗派》，觉得以这样的冷题目作如此细文章，真是高手，现在读到这两篇，益觉其大手笔。汪先生对清诗有通盘的考察，他独具只眼，认为清诗“以近代为极盛”，而这又与“世方多难”有关。他特别深究于光宣五十年间的诗人与诗派，所举上百个诗家，列述其事迹与风格特点，真如数家珍。由于家世和交游的关系，汪先生与诗坛前辈及并世名家多有往还酬唱，因此不但他的记述确实可信，他的评论也充满韵味。光宣的诗坛是直接“五四”的，但我们研究“五四”诗歌，往往忽略其前承，似乎那时是石破天惊，忽然产生出白话诗来似的。汪先生这几篇文章，真可为当今研究者所取资。现在对这一阶段的诗歌能如此熟悉，而又具通识的，以笔者所见，也只有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两位了。

文集中所记近代诗派，不仅于文学研究者有益，且对研究近代社会与思想，都提供了不少真切生动的材料。如那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记道：“文襄（张之洞谥）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作，顿足骂道：‘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把这位“洋务”人物的面貌讽刺得入木三分。

程千帆先生是汪辟疆先生的学生，他在编录文集时也已届70余高龄，但在后记中仍口口声声称老师如何如何。前辈风范，令人钦仰。中国近代学人，博洽者有之，专精者有之，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的著作多有散佚。学术界和出版界真应该组织人力，逐步地将这些著作整理、编印出来。对于学术

遗产，似也不应厚古而薄今。不少中国近代学者，在风雨飘摇、世路坎坷中，默默地著书作文，这些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积累的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想起一则“附记”

前些天看《光明日报》5月2日的《史学》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意发现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书柴德赓 史籍举要》。吕先生是语言学家，却在历史学的副刊上发表有关史籍介绍的书评，不免引起我的兴趣，就不管这一版面上题目看来重要得多的几篇宏文，专心读了这一豆腐干式的短文。

说是豆腐干式，确也不错，我曾大致数了一下，全文只不过720字光景，加上标题的位置，也不过800多一些。写得极朴素。不过700来字的文章，讲出了全书的主要优点，举出了读者看得明白也看了信服的例证，而行文又清晰、自然，真是一篇难得读到的书评。

吕叔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权威，他的几本论汉语语法的专著，我在大学时是作为教材研读的，工作以后因为忙，读他的专门论文少了，但仍不时读到他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的小品，感到非常有趣。却没有想到，他能放下大学者的架子，破门而出，写史学方面的小文章，而又写得那么普普通通，似乎很不起眼，却又是那么富有见地。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新整理出版的某些古籍中标点上的错误，题目叫《整理古籍的第一关》。这篇文章引起了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反应很好。文中引了唐人李济翁《资暇集》中一句话：“学识如何观点书。”吕先生把“点书”是作为句读或标点来理解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中年教师吕友仁，是70年代末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与我相熟，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给我，提出与吕先生意见不同的理解，认为李济翁的所谓点书，系指音训而言，其含义是在一个字的某个角上用红笔加个点，以表示该字的正确读音，这是一种标音手段，是当时的习惯作法，而与“句读”无关。

吕友仁同志的文章，意见新奇可喜，论证详细平实。他作为晚辈，不敢直接寄给吕先生，只叫我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未征得他的同意，就告诉吕先生了。吕先生很快从我处要了去，过了不多久，复信告我，说他将此文推荐给《中国语文》，并已直接与吕友仁同志联系。1989年第4期的《中国语文》刊登了吕友仁的文章，文后吕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则“附记”，其中说：“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

读了这几句，我真是非常感动。吕友仁怎么能同吕叔湘这位大学者相比呢？但大学者却把这位晚辈的纠误之文主动推荐给语言学的专门刊物上登载，还特地检讨自己写文章时的疏忽，并把这一疏忽提到学风的高度。至此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古人所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也真正理解了“盛德”这一词的含义。

学术理性的启示

我于 1958 年夏进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审读、加工了不少书稿。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话。编辑的劳动不纯粹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力，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

可惜自 80 年代初以来，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我逐渐脱离了具体的编辑岗位，进入了所谓的领导层，同时也就失去了安静地阅读、加工书稿的乐趣。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最后一部书稿，就是启功先生的《启功丛稿》，时间是在 1981 年 5 月。那时我虽已担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还能抽出时间发一些书稿。这部将近 28 万字的著作，5 月份发，同年 12 月印出，加上送启功先生校阅一次，我校读两遍，整个排校、印装过程是相当紧凑的，按现在的速度算是够快的了。

但是说实在话，当初我虽说对启功先生的这部《丛稿》读过不止三四遍，但限于自己的学识，体会还是不深。过了 10 年，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

启功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书法家，这大家都知道，但对于他的书法的体味、研究，却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而对于他的著作，如他关于古代书画碑刻的考证，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语言的论述，却更非一般匆匆浏览就能指说一二。启功先生作为著名书法家、文学史家、文物鉴定家，他的涉及中国文化几个重要方面的卓越成就，督促我们不能只限于赞叹、仰慕，而要进行踏实的钻研、探求。

在古代文学方面，近些年来，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作家作品与某些文学现象，已引起重视，文学与历史、艺术等交叉研究，即所谓比较文学，也成为热门。但恐怕很少人会想到，启功先生在 30 年前，即已郑重提出，并作出极为扎实的范例。他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写于 1961 年，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啻为空谷足音。我觉得，年轻的研究者倘有志涉足于古代文学这一领域，这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启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碑帖中的材料，门类不一，例如除可供研究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材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学史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资料。”接着文章具体论证了古代碑刻资料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即 1. 作品的校勘，2. 集外作品的补编，3. 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4. 创作技巧的研究。启功先生所举的实例，上起晋代的《左棻墓志》，王羲之的《兰亭序》，下至明代董其昌的《剑合斋帖》，例子之繁富，考辨之精当，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章中所少见的，极富启发，现姑举一例。文中说：“其他像《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有黄庭坚的草书写本，异同也不少。……这《忆旧游》一诗，校注《李集》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事实确实如此。如李白诗中有“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这里“北凉”二字，黄庭坚草书写作“北京”，应当说是正确的，因为这几句写北上太行，到太原游览，又说这位元参军之父这时正好作尹并州。唐时太原称北京。这点为李白集作注的清人王琦已注意到，他说北凉即张掖郡，在西北，而此诗“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晋祠，中间忽言北凉不合，当是北京讹

耳”。可惜他没有看到黄山谷的写本，只能疑其误。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文，因看到山谷写本，即指出“行来北京岁月深，集本作凉，非”。启功先生作此文时，校订李白集者，还没有利用前人已有的资料。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能就平日读书所得，举此一例，但于此已可表明，启功先生在文中所举的不少例子，可供我们进一步研讨发挥的正复不少。古典文学在与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作互相结合、比较的研究，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它可以使我们的理论探讨更有一个坚实的事实依据。这一点，在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因山东、湖南、湖北、甘肃等地陆续发掘的帛书、简牍而呈现十分活跃的状态，可以得到证明。

启功先生在利用碑刻材料时，能以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广泛引用书面文献，使他的结论建立在众多信实的材料基础上。如《坚净居艺谈》中的《颜书竹山联句》，引近人岑仲勉《贞石证史》，又引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指出岑氏之说尚可商榷。《李后主临江仙词》，二三千字的短文，引用了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耆旧续闻》、《墨庄漫录》、《宣和书谱》，明人的《剑合斋帖》、《淳熙续帖》，以及近人唐圭璋、王仲闻两家的李煜词校注本。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此文初稿作于1954年，1980年为编集《丛稿》，作了重订。这是《丛稿》中一篇重头文章。文章从梳理材料着手，逐层驳斥了董其昌所说的，唐宋以来，画家也如禅宗那样分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为祖，南宗以王维为祖。经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启功先生明确指出：“我们在明末以前，直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有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更没见过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应当说，对董其昌的所谓画分南北宗之说，近代学者虽也有人提出疑问，但从来没有人像启功先生那样作过如此全面的论证，经过这篇文章的分辩、论析，应当说是有了科学的结论了。但可惜，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些关于王维的论著，还是依袭旧说，以王维之所谓南宗画引申来论其诗歌艺术，这样其论据的前提即建立在非事实的沙滩上。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启功先生无论是作长篇专论，还是短篇题跋，他都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以朴素简括的文字，说得明明白白，行文如行云流水，而又间以风趣幽默，使人在得到学术进益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这是启功先生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样的学风，正是启功先生光风霁月般的人品的映照，更值得我们深入的研求。

读冷僻书

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因为职业上的缘故，与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多有所接触，承蒙他们不弃，常常收到他们的新著。久而久之，读这些所赠的书，就成为一种癖好。为什么呢？说来也有点意思，我虽然身在出版社，职业是编书，但近些年来却很少跑书店。就以我工作地点最近的王府井新华书店而言，这几年来书确实添了不少，一走进店堂，使人目迷五色，我似乎觉得是到了新潮时装店，找不到适合我穿的中老年服装，往往乘兴而去，废然而返，后来就渐渐不去了。倒是不时接到的赠书，却如远道而至的故人，不拘形迹，可以放怀而谈。它们好些是冷僻书，其中不少是我所不懂的，或者是过去所未曾闻见的。既然是友人相赠，自然得略为披览，却想不到大有所获。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剩下。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以他两大厚本明式家具研究而饮誉中外，去年冬天却想不到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小册子，名《北京鸽哨》。别看轻这总共只八十几页、不到五万字的小书，却是“绝活”。鸽哨者，即系于鸽子尾巴上的壶卢，又名哨子。不要以为这只是纤末细小的东西，却是倾注了好几辈民间匠人心血的精致的手工艺品。这种玩艺儿，我国南北都有制作，但以旧日北京为最精。北京现在是高楼林立，车如流水，已经很难领略到晴空中群鸽飞翔时传出的忽远忽近、倏疾倏徐那种清响的情趣了，书中所描述的鸽哨品种，如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类，等等，以及自晚清以来民间艺人的种种精品，读来使人似乎顿然超越于日常的琐屑，回复到一种悠闲的岁月。世襄先生在自序中说他从小就好于“秋斗蟋蟀，冬怀鸣虫”，而养鸽放飞，更是常年癖好，“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不觉自叹，还复自笑也。”寥寥数语，不是正显示了这位渊博学者的一颗童心吗？这对于为纷扰的世事感到困乏的许多人来说，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去年的阳历岁暮，我又有幸得到傅熹年先生所赠《藏园群书题记》一厚册。这是与《北京鸽哨》完全不同风格的纯学术性专著，却同样是冷僻书。熹年先生为整理其祖父藏园翁的藏书题跋，化了不少工夫。他的“整理题记”是1981年写成的，书却是1989年下半年才印出。其间种种曲折，不必细说，总之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最终的全部稿费充购书之用了结；而即使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肯定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全书85万字，印了3000册，出版社至少得赔上万元钱。虽然拖了几年，终于印出，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增湘先生数十年间累积的题跋，得此一编，成为完帙，实在方便读者。我在接到书的当晚，一口气读了有关唐宋人别集、总集的题跋，真如过屠门而大嚼，抬头不觉已过了午夜。

阳历元旦刚过，又收到两部书，那就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李审言文集》和中华书局陈抗同志所赠《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这两部书也称得上是冷而又冷的。

李审言，名详，江苏兴化人，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编印他的文集，确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即使搞中国古典文学，年龄在50上下的人，知道李详名字的也已相当的少了，至于40以下的中青年学者，我敢担保，百分之八九十恐怕是没有听说过这名字的。李详写得一手好骈文，从其乡先辈汪中

(容甫)入手，上追汉魏六朝，其治学则以《文选》为重点，尤精于李善注的研讨，而骈体与选学，恰恰是“五四”以来所反对、鄙薄的，因而李详的著作也就长期受到冷落了。我自己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为了查证杜诗的几条注和汪中《哀盐船文》的几个字义，翻阅过他的零星篇章。这次通览全书，想不到他除了选学、杜诗以外，还对陶潜、庾信、王安石的诗文，以及《世说新语》、《文心雕龙》、《颜氏家训》，都下过工夫，其中之详赡精切堪与我所读过的北方大学者高阆仙先生几部笺注相颉颃。这部文集约 90 万字，近 1500 页，精装两册，印数仅两千，可以想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也是要赔不少钱的。

所谓古文字，就是自汉字产生以来至小篆的文字，大致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文、简帛文等等。近些年来，这些古老的文字，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以致古文字学成为文献学中的一个热点。但这门学科专著多，供初学者学习的范本少，而这一《商周古文字读本》却以文选、通论、常用词解释的有机组合，提供读者学习古文字以从感性到理性的完整的知识，使得我这个门外汉也领受到一种涉足陌生境地所产生的新鲜感与喜悦感。

俗话说，熟能生巧。套用这句话，年终与岁首，读了这四部书，感到冷能避俗。

会心处不必在远 ——读王世襄《说葫芦》

王世襄先生新著《说葫芦》，写就于1992年1月，1993年8月于香港出版，并由香港中华书局发行。全书精装一厚册，除文字说明外，尚有彩色图188幅，黑白插图26幅。每件实物都有详实的文字说明。全部中文文字都有英译。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有关文化艺术与工艺美术专著从内容到装帧形式都臻于上乘的极为难得的精品。

王世襄先生的书，我读得不多，读过的有《明式家具研究》、《刻竹小言》、《鸽哨》、《蟋蟀谱集成》以及这部《说葫芦》。读王先生的书，总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如《世说新语》所记简文入华林园所说的一段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确实如此，凡读过王世襄先生以上这几部书的，都自然会有一种一竹一木、一虫一鸟“自来亲人”之感。

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可能不大容易说清楚，但这种感受，这种情思，我认为是真挚的，而且有一种精神上自我享受的雅致。

就以这本《说葫芦》来说吧。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七章，讲葫芦的各种装饰方法和实物；下卷五章，讲几种鸣虫如蝈蝈、蛐蛐、油壶鲁等的畜养和欣赏。我们现在在大都市生活，不要说用葫芦来做成各种装饰物，恐怕连吃新鲜葫芦也是不太多了的。至于蝈蝈、蛐蛐、油壶鲁，不要说见到它们的样子，一般人连它们的叫声也不一定能听得到了。每天一早起来，忙于吃早点，收拾东西，接着是挤车、赶路，下午下班，又忙于买菜、接孩子，哪来这种闲工夫，挣钱还来不及呢，是不是？现代化的生活，固然使我们获得不少新的知识与享受，但那种忙碌与浮躁，真也不知道丢掉了人间原有的多少乐趣。读王世襄先生的书，使我们进入返归自然的境界，让人再次享受童年天真的欢悦。也仿佛使人感悟到陶渊明所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那种明智的超脱。

我非常欣赏启功先生为此书所写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说王世襄先生的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就以这本书来说，从古到今，葫芦大量的还不是作为价廉可口的蔬菜，最多做成实用舀水的壶、瓢，但我们的祖先，却用勒扎、刀刻、针划、刃押、火烫等手艺，做成各种盘、碗、瓶、盂、罐，各种乐器，以及鼻烟壶、首饰、鸣哨等等器物。看了书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片，使人难以想象这些竟是出于过去颓垣败墙间的葫芦。中华民族璀璨文化充溢于人世间的一木一石，让人由衷地对祖国历史传统产生一种亲切而厚实的感情。

我不懂葫芦，小时虽也捉过蟋蟀玩，但比起王先生来则实在是算不得一回事。但我却极为欣赏王世襄先生对每件实物、每一图片所加的说明，这些说明，都可以单独成篇，远可以与《世说新语》比美，近乃超越于《浮生六记》。如不信，不妨抄几则以飨读者，也作为本文的结语。如289页记“官模子扬帆出海图蝈蝈葫芦”，云：“大江水阔流急，舳舻相接，双桅张帆，似将出海远航。江边树木楼阁，堤岸石阶，纤悉可数。唯纹细景繁，须旋转谛视，始得其全。”——按此可见写景之清远。

239页记“紫红大蝈蝈葫芦”，云：“三十年代初，虫估吕虎臣设葫芦摊于东安市场，与星命馆向心处相对。其最高层囊匣成行，此葫芦位居正中，

号称镇摊之宝。几次问鼎，以索价奇昂，无力致之。不意 20 年后，于挂货铺复见，付值不过虎臣所索之什一。原装锦匣犹存，而虎臣谢世有年矣。”——按此寓人事沧桑于恬淡笔墨之间，使人起悠然之思。

又 46 页记畜虫葫芦所用之模子，有云：“官模子瓦范烧成未用者，往年亦曾在冷摊觅得。十年浩劫，被当作手榴弹于谩骂声中掷碎，惜哉！”——此又可见此老之幽默会心处。

读《日本汉诗选评》

我看过的日本汉文著作，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被称为弘法大师的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另一是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前者把中国古典韵文的格律知识和写作手法介绍给日本学人，却无意中保存了久已在中土失传的好几种唐代诗学著作，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韵文史料；后者记述了作者从山东半岛登陆，怎样步行鲁中平原，穿越太行山，进入五台山佛寺，又怎样从晋北迤迤南行，晋谒唐朝的国都长安，恰好碰到了武宗灭佛，又被赶走，经东南回国，其写封建大帝国的通都大邑到荒野村落，真切生动，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僧人，唐朝时都到过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有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为读过这两部书，早有一个念头，想再读一些彼土文士所写的汉诗，藉以窥见其诗心与文情。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程千帆、孙望两位先生选评、吴锦等先生注解的《日本汉诗选评》，大大满足了我久已渴念的夙愿。我觉得，这本书的编选出版，对于进一步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历史上的域外传播，认识日本古代诗人的汉文化造诣和精致玄微的审美心理，都是极为有益的。

日本古代写作汉诗，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我国的初唐时期。在这以后，随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不断演进发展，日本的汉诗创作，也如大江流日夜那样，波浪迭起，面貌日新。据本书注者介绍，“汉诗在日本兴起、发展、繁荣，到形成独特的‘日本汉诗’风格，最后终于式微，大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本书选了大约200位诗人300多首汉诗，时间从8世纪至20世纪初，有律诗、绝句，又有古体、乐府，可以说一编在手，佳作尽收于眼底，开卷披览，真有点象《世说新语》所说，如于秋冬之际行山阴道上，“尤难为怀”。

通阅全书，可以看出日本诗人浸沉于中国诗域之广且深。显而易见，中国诗人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是白居易，好些诗特地标出效白傅体，其次则是苏东坡。为什么白、苏二公对扶桑的士人（不止士人，还有王公、贵臣、名媛、僧人）有如此的吸引力？是他们特有的人生态度呢还是一种超脱的艺术风格？这个课题是很值得中外比较文学者来加以研究的。日本的汉诗写作者，写出了颇有声韵之美的效法初唐歌行的长篇，也有许多精细工巧的律绝，他们似乎还饶有兴味地参加中国诗歌评论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唐宋之争。一位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兼诗人赖襄，有一首《夜读清诗人诗戏赋》，所评及的清朝诗人，有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施闰章、朱彝尊、王士禛、宋琬、冯班、蒋士铨、袁枚，真使人骇异其才学之精博。

日本汉诗的成就，给中国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言不同的两个国家，竟可以使用同一种文字，相同的诗律，创造出既相同而又相异的诗境？我们东邻的友人有些绝句确有宋人风致，如广濑谦的《春塞》：“梅枝几处出篱斜，临水掩扉三四家。昨日寒风今日雨，已开花未开花。”又如“钟声云外寺，树色雨余村”，“眉雪老僧时辍帚，落花深处说南朝”，也都深得唐人风韵。但无可讳言，诗人们虽然尽力仿效唐宋诸贤，写出来的总带有日本气息，与中国的汉诗终究隔了一层。这似乎是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但我相信研究者的努力定可探究出其中的奥秘。古典文学界应当开拓自己的研

究领域，打破固有的樊篱，把视界展向域外的汉文化区，这将会带来新的收获和新的见地。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闲堂、蜗舆两位前辈的诗评。程、孙两位先生既是渊博的学者，又是极有造诣的诗人，这就使得他们的评语简约而隽永，既具理致，又富情韵，实是古体诗歌评论的别开生面之作。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出版二三事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即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那时的小组成员，大约将近20人，有范文澜、翦伯赞、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数虽不多，却都是国内外著名的第一流学者。我从1958年夏天起由商务印书馆古籍编辑室调至中华书局，那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也即古籍小组成员。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那时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在齐燕铭同志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金灿然同志就中华书局的总体规划以及某些具体选题，都经常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也时常写信给灿然同志，或在中华书局呈送的报告中加以批示。但那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普通编辑，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我只记得1963年，章士钊先生给燕铭同志一份材料，是南京高二适校录唐人刘宾客文集的书稿，燕铭同志即转给灿然同志，让他找人看看。当时灿然同志即要我审读此稿，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高校本写了否定的意见，并代为起草了一封给燕铭同志的信函。那时我对燕铭同志，只知道他在二三十年代曾从吴承仕（检斋）先生治国学，在北京上大学，似乎还在大学教过书，仅此而已。“文革”当中，有一次，造反派曾把齐燕铭同志扭到中华书局来批斗，我记得当时他站在批斗台上，回答问题，态度从容，思路清晰，凡是涉及金灿然同志在执行出版方针中的所谓罪行，他都包揽过去，说这一切都应由他负责。结果，也斗不出什么名堂，就草草了事，押送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燕铭同志任组长的第一届古籍小组，可以说是抓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制订文史哲三大类的整理规划，这个规划现在看来似过于庞大，实际上也确实难于在短期内完成，但因出于对古文献素有研究的专家之手，因此制订得非常细致周到，不但开列书名、作者，还列出所用的版本，有些书所列版本还不止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一规划对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第二是抓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点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影印，为古籍整理的科学性起了示范的作用。第三是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专门人才。那几年（即六十年代前半期）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同志，现在很多已成为我们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队伍的领导和骨干力量。

从对一些稿件处理上，可以看出齐燕铭同志尊重历史的公允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大约60年代初中华书局拟印行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其中有一段涉及台湾问题，与《明通鉴》等书中提法有所不同。是照原书印出呢，还是略为改动几个字，当时曾向齐燕铭同志请示，燕铭同志特地为此写了一封信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很值得介绍，今将全文引录于此：

“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中国可知。以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排比而观，本无抵牾（荷兰人、日本人皆曾侵占台湾，观各记载，荷日不过

海寇性质，当地居民固仍为土著与中国贫民)。《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又在中华书局的报告上批道：“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上面这封信真可称得上是一篇学术笔记，既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观点，又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原文付印，不必改字”，表现了尊重历史的科学精神。

还有一件是编印王国维集的事。1958年7月，中华书局曾为重印《王静庵遗书》事向外界征求意见，当时曾提出三种方案，一是照原样整部重印，不删不补；二是先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因此两种皆为学术性论文，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多，但删去此两集中的诗词及几篇寿序、墓志；三是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及有关戏曲的八种，从当时的认识出发，认为“其中论及美术、教育及叔本华哲学的，其观点很不正确”。

齐燕铭同志也收到这一征求意见信，他仔细地阅看了所寄商务版《观堂遗书》总目，用红笔圈了17种，并在旁边批示：“以上十七种可先印，以后可印二编或三编。”现在不妨把他所圈的17种书目列出，以见齐燕铭同志当时对王国维著作选择先后的看法：《观堂集林》24卷，《两周金石文韵读》1卷，《史籀篇疏证》1卷，《殷礼征文》1卷，《简牍检署考》1卷，《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蒙鞞备录笺证》1卷，《圣武亲征录校注》1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卷，《观堂别集》4卷，《观堂古金文考释》5卷，《释币》2卷，《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卷，《黑鞞事略笺证》1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2卷。

在这之外，燕铭同志还另写一信，表示了他对重印的几点意见，意见写得很具体，也很有启发，今引录于下：

“一、目前应择要标点印行，非切需者自可到图书馆借阅，无须立即重印。因此选择宜严。二、将来标点本总宜‘全’，总不应使《王忠愍公遗书》专美于前，而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倒无全集出版。三、由于以上两点，所以我主张分辑出版，留待以后陆续出全。四、因此原编各种，可以少出、迟出，但出版时，除别人所作的序、传等，均以不删为是。如别集中致北大某教授书，足见王氏政治态度，尤不宜删，像这样文章实谈不上什么毒素。《苕华词》近又翻阅一过，毒素似也不比苏辛词更多许多。总之，此种资料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

写了这四点后，燕铭同志以幽默的口气又写了这样两句：“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燕铭同志的这几条意见，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对王国维的著作，他首先坚持的一条，是应该出版，不过从步骤上，可以先出选辑，后编全集。他特别强调，新中国对于王国维这样一位学者，是应编其全集的，不能让过去的《王忠愍公遗书》专美于前。在编印时，对王氏本人的论著不能删，对王氏思想应有客观的分析，不应随便扣以“毒素”的帽子。

齐燕铭同志很重视古籍整理研究人才。1960年，吴则虞先生为哲学研究所作《论衡集释》，为此他搜辑了清人惠栋、卢文弨直至近人黄晖、刘盼遂等人的有关著述。他大约曾从黄晖的书中间见其引及齐燕铭同志对《论衡》所作的校记，因此特地请金灿然同志转给燕铭同志一封信，信中说：“尊校已

见黄书征引，渊洽精当，莫名赞叹。黄书征引谅非全璧，学随年积，创获必多，渴求录副见示，俾收入《集释》内，以惠学人。”此信是8月15日写的。现在文书档案中有燕铭同志于8月17日给灿然同志的信，说：“张校《论衡》四册和我的一本笔记（《论衡》札记）送去请收。我的一本笔记大约是1927—1928年所记的，后来有的写在书上，有的写在别处，有的抄在这本子里，有的找不到了，所以后来残缺不全。工夫下得少，颇多臆改之处，本想再用《淮南》、《说苑》、《潜夫论》等书校一遍，当时因有别的事也未做。可参用之处不多。如有同志要用，用后请仍还我，亦家有敝帚之义而已。”信很短，但情真意深，可以见出燕铭同志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行家里手，以及他对同道学者的支持与帮助。

从以下几件事例中，可以进一步看到燕铭同志对一些学者治学路数与学术成果的充分理解和真心尊重。

1961年1月，金灿然同志曾就向陈寅恪先生约稿，出版其文集一事向齐燕铭同志请示，信中说：“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灿然同志的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燕铭同志在接到此信后即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在那时，能作出这样的决断，确实表现出学术上的灼见和勇气。

1959年，中华书局曾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草稿，征求意见。齐燕铭同志看到后，第一句话就提出：“此书整理应征求陈垣同志的意见。”

1960年，陈叔通先生转给齐燕铭同志一份张宗祥的著作目录，并送上张所著《本草经新疏》、《论衡校勘记》两稿。燕铭同志马上转给中华书局，并说：“此人著述真多，值得注意。应如何答覆，请研究告我。”

叶恭绰先生曾编有一部《五代十国文》交科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审阅后认为书稿质量有问题，数次与叶先生交涉，好几年未能出版。叶先生为此向齐燕铭同志写信，科学出版社就写了一个详细报告，谈及稿中存在的问题，还说到此稿虽是叶恭绰署名，实际上是叶请好几个人代编的，体例不一。出版社还找到其中一位主要的编纂者曹家琪，转述了曹家琪对此稿的看法：“（1）收录不全；（2）校勘不精；（3）编纂方法不善；（4）根据定本不一。”燕铭同志是同意这一报告的，他还特地写了一句：“其中所说的曹家琪似是一能作编书工作的人，可以注意。”曹家琪一般的人恐怕不大知道，后来他有一篇《资治通鉴纂修考》长文在《文史》开头几期上发表，写得很有分量。由此也可见出燕铭同志的细心，能从这样一篇谈及具体书稿处理的报告中注意到可用的人才。

另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1963年夏，张舜徽先生来北京治病，住在北方饭店，他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因此特地写信给齐燕铭同志，“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宿问题”，并寄上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燕铭同志当时并不认识这位张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替他安排了住处（教育部招待所），并给金灿然同志写了一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派编辑去找了张舜徽先生，我记得我也去见过张先生，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即由此在中华书局出版的。

祝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成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过数千名图书馆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近 20 年的辛勤劳动，编纂工作于 1995 年初全部完成，经部、史部、子部和丛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积累。

古籍的保存、搜集、整理和出版，建国以来，虽然几经曲折，从整体上说，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即使在 1975 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仍然发出“尽快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指示。这一指示极大地启示了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遵循周恩来总理的这一指示，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在各级有关部门领导下，对我国珍贵古籍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编录。现在完成的这部目录，著录了中央国家图书馆、地方图书馆、文化馆、学术团体图书馆等所藏的善本书，共约六万种，涉及的藏书单位将近八百个。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好书，抢救了大批古籍，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古籍保存的条件，培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精通古籍版本目录的图书馆专业人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为我国古籍整理与图书编目事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要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工作，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就必须掌握传统思想文化的文字载体——古籍。我国的古籍数量繁多，有人形容为浩如烟海。世界上有几个文明古国，但历史文献有如此丰富，保存有如此完整的，只有我们中国。因此可以说，中国古籍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要使这一宝贵财富真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要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研究的第一步，就必须从整体上掌握古籍流传与保存的情况。古籍编目的科学意义和社会作用也就在这里。

古籍编目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我国古代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从汉朝刘向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起，一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是传统学术的综合研究。它们的作者大多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成就，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我们现在的这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持编纂工作的顾廷龙先生，潘天祯先生，冀淑英先生，就是对传统文化有深湛研究的著名专家，编委会和不少从事于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也多是这一学术领域有成就的学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出版，既能使中国的珍贵古籍经过广泛调查与合理编排，供海内外学术界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作为一项学术研究成果，对我们如何进行版本鉴定，如何在传统编目基础上对古籍分类进行科学的归纳，都有极大的学术参考价值。

现在，在古籍小组的直接主持下，参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正在着手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提要》收录的范围将不限于善本，凡公元 1912 年（即民国元年）以前的各类书籍都尽可能加以编录，并对所收的书籍撰写提要。《古籍总目提要》的编纂，将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文献的确切情况，使得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有针对性，更便于制订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的总体规划。《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规模虽然要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大，但应该说，它是继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事业再

向前进行的，参加《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编目的同志，有不少就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委，《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分类和著录，也都充分吸取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长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同其他文化建设事业一样，正在蓬勃发展。许多优秀的古籍，经过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获得出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广泛良好的影响。实践证明，古籍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希望这一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教育的文化事业能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大关注和帮助，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文化精品与学术窗口 ——评《唐代文学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些年来出版的品位较高的出版物，现在虽然还只出到六辑，却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

建国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专门的断代文学研究书刊能连续编纂出版的，这还是唯一的一种。它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唐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2年，在开始几年，曾以《唐代文学论丛》的名义，辑集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包括一部分普及性的诗文鉴赏文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88年起，改名《唐代文学研究》，从内容上作了较大的调整，主要是加强学术性，着重发表理论研究和资料考证性的文章，改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出版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对于出版社来说，是要承受经济压力的，因为印数少，要赔钱。广西师大出版社能不计经济亏损，毅然承担这一学术性书刊的出版，这不只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支持，更表现了出版社同志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远见卓识。

最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于出版，《决议》明确指出：“要及时反映国内外新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觉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唐代文学研究》，是符合《决议》这一基本要求的。

最近有两位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中青年学者，分别著文谈及80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尚君教授在《问学纪程》一文中说，国内唐代文学近20年取得远迈前人的巨大成绩，而这一成绩的取得又与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界所形成的学术群体专心治学与精诚合作分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寅博士，在今年第三期《书品》上发表《文献整理与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可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成就卓著的领域。”

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更可见出这已出的6辑《唐代文学研究》的分量。《唐代文学研究》及时提供研究中的高质量之作，因此人们要想了解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就绝不能避开这六辑共收300余万字的精心之作。

为《唐代文学研究》撰稿的，除了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作者以外，还有欧洲、美洲、亚洲等国的著名学者。他们来自德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因此可以说，随着唐代文学日益走向世界，这六辑《唐代文学研究》已可充分反映海内外学人的最新治学成果。他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心态，来观察、探索唐代文学这一丰厚宝藏，这就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缘。据悉，日本、韩国、美国及东南亚的唐代文学研究者，颇注目于它，他们有的每期必购，有时不能及时买到，则辗转托人，期于必得。国外及港、澳地区的一些图书馆，向唐代文学学会秘书处所在地西北大学文学院函购或提出交换的，则更为频繁。《唐代文学研究》已成为我们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界向外开放的一个新窗口了。

今年9月新出的第六辑《唐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特色，颇值得一提。

这一辑将近 70 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论浙东山水与唐代诗人的。这是因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于 1994 年 11 月在浙江新昌举行。新昌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学人，而为年会所提供的论文中，就有不少论及浙东唐诗之路，如《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唐代诗人与剡中风光》、《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李白三至越中考索》、《论方干的浙江山水诗》，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非常吸引人了。文献研究结合实地考察，把一个地区的文学、书画、民俗、宗教、园林建筑、社会经济作综合的探索，这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开拓，《唐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本。

最后，我还要补充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不只出版《唐代文学研究》，还出版一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年鉴》是唐代文学学会于 1982 年成立时提出编纂的，1983 年以来每年编印一册，每册 30 万字左右。这十余年来从未间断过，为唐代文学也为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积累了有益的资料。《年鉴》80 年代是在西安出版的，后来由于经济原因，出版有了困难，在这紧要时刻，广西师大出版社闻讯后又立即伸出友谊之手。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唐代文学研究者，也作为出版界同行，深为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些年来为文化建设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感到钦佩，并引以为荣。

从《张说年谱》所想到的

最近读了一本《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作者陈祖言同志现在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本年谱原是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我觉得选择张说一生撰写成年谱，说明了我们研究者文学观念的某些变化。

我对张说曾是较早注意到了的。我觉得，唐代文学在由初唐转入盛唐的发展过程中，他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在《唐代诗人丛考·王翰考》中，我曾对此有所论述。

《张说年谱》的《前言》中说：“《旧唐书·张说传》称张说‘喜延纳后进’。张说所奖掖的文学后进（包括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现在我们能考知的就有：张九龄、贺知章、徐坚、孙逖、王翰、徐安贞、许景先、袁晖、袁述兄弟二人、赵冬曦兄弟二人、齐瀚、王丘、徐浩、裴漼、尹知章、吕向、王湾、常敬宗、崔沔、康子元、敬会真等二十余人（还有些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这简直就是一张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这批人，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大师，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纳后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就是这一当时享有大名、文学发展上起过一定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在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无论在唐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张说仅仅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未提到。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我想是否有两点：第一，我们的文学史结构，长期以来，受到旧的框架的束缚，好象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汇编，史的叙述很不够。这样，就很难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总趋势出发，对文学发展的倾向和动向加以宏观的考察，对某些文学人物的历史活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论断。文学的历史上往往有这种情况，他们在文学上的业绩，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的作品，而是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不把握总的历史趋向，而仅仅着眼于个人作品的评论，那末像张说这样的文学人物就会摒弃于文学史叙述之外，或者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第二，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往往仅从文体上来判断作家成就的高下，而对于某些文体，又缺乏历史的分析的态度。骈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个时期，往往把骈、散两种文体的关系说成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把事情看得非常绝对化，似乎写散文的就有时代性和现实性，而写骈文的无非是吟风弄月，流连词藻，不值得一提，尤其是以骈文的体裁写碑传墓志，则似乎更是为王公贵人歌功颂德的谀墓之作。因此，当时号称“大手笔”的张说，今天只能在批判性的叙述中找到其位置。这种看法，陈义虽高，但却是脱离文学发展的实际。不说汉魏六朝，即以唐朝来说，如果去掉骈文，那么唐文的成就就要重新作出评价。特别是初盛唐，就文来说，简直可以说是骈文的天下，其中脍炙人口的作品，我想，即使只接触过《古文观止》那样选本的读者，也会举出好些篇来的。

研究的方法，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研究客体的认识，当然也反映研究主体在认识进程中对事物内在规律探求的尺度。这些年来，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同整个文艺学的研究一样，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和创新，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就方法论本身进行理论上的探

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要踏踏实实地做出实际的成绩。

从以上就古典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研究背景来看，陈祖言同志选择张说这一历史人物作成年谱，这一选题本身就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既体现了作者的文学历史观，也体现了符合于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本身发展所需要的新的方法论。

祖言同志是年轻的研究者，他还有着自己的发展。《张说年谱》目前也还难于说是一部名著，书中有些地方表现了年轻匠者的斧凿痕迹，有些地方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可斟酌。但尽管如此，我觉得书中也确实表现了方法上的开拓和创新。作者把重点放在张说后期政治上居高位时的文化设施，着重记述了他对不少文士的奖掖，以及出于积极爱护之心的评论，这就抓住了张说的根本，也抓住了初盛唐文学发展中的契机。而同时，作者又恪守年谱撰写的传统要求，对张说生平的某些细节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如张说的籍贯，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称范阳，《旧唐书》等史传记载为洛阳，而据作者考查应是河东；张说制举登第，《新唐书》等说是永昌元年，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说是垂拱四年，据作者考订应为载初元年；张说迁荆州之年，唐史学者岑仲勉《唐史余沈》提出开元五年、六年两种可能，经作者判断是开元五年，等等。这些，看来似乎是细微末节，但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夫，凭“花架子”是做不出来的；而且有些问题可由小见大，如籍贯问题，可以看出人们观念是怎样受时代的局限而又如何随时代而变化，张说自称范阳，无非是想攀附高门大族，受旧的门第观念影响，而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主张，却又是那样的革旧变新。——历史的复杂性就是如此，严肃的著作不应回避这种复杂性，而应当通过对这种复杂性的剖析，说明历史是怎样在迂回中前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张说年谱》也说明了，传统形式和新方法应当有恰当的结合，我们在探索方法论上的革新时不应抛弃传统形式中值得肯定的一面，而且，在传统形式的运用上有扎实的基础，将会更有助于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创新。

宋人绝句艺术谈

绝句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曾被人誉为“百代不易之体”（明胡应麟《诗薮》）。五言绝句 20 个字，七言绝句 28 个字，篇幅短小，但古代诗人常常以之写景、咏怀、讽事、感时，尺幅小景而有千里之势。在诗歌发展史上，绝句是有着古诗、律诗所不能代替的优点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绝句似乎更能代表我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它较易于普及，易于为群众接受，而对于作家来说，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领悟，用绝句的形式表达，也似乎更为凝炼和隽永，更易引起人们的深切思索和长久回味。研究中国古典诗歌遗产，绝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门，而对于向今天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绝句则是更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

清朝的一位评论家曾说：“七言绝句起自古乐府，盛唐遂踞其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古代不少诗论著作，差不多都认为绝句在唐代已是顶峰，后人不可企及。诚然，绝句在唐代已经达到极高的成就，唐代诗人如李白、王维、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李益、韩翃、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等，都写出过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正如在大自然中，既有浩瀚奔腾的长江大河，也有清雅秀洁的细流曲涧，既有挺拔的高峰，也有深邃的幽谷，都各有自己的美而不相掩。这是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规律。我们现在编选宋人绝句，也可以向读者提供古代绝句佳作的另一种美的选择，美的品尝。

宋人绝句，也是名家辈出，有不少高手，他们在唐人的阔大宏放、高华典丽之外，另辟蹊径。清末著名的诗评家陈衍说：“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石遗室诗话》）石遗老人这里只举出陆游、杨万里、刘克庄三人，是太少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存有唐宋之见。如果抛开这一传统的说法，应当说，宋代优秀的绝句作家是远不止这几个的，宋代的绝句佳品在数量上或者还可以与唐人相匹敌。宋人绝句的创作特色，是构成宋诗特有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人绝句自有其新意，这种新意不妨概括为两点，一是诗的日常生活化，二是诗的哲理化。而这两点，又与宋代士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学观念相联系。

宋人绝句中，写社会重大题材的不多，这可能是它们的缺点，但宋代诗人却也把诗的题材向另一面扩大，把日常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情景，用平易浅近的语言形式，表现得很细腻，很有诗意，有美感，因而触发读者的再创造，发现生活中固有的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即使生活中的一个小小角落，诗人们也表现得富有情趣，在诗歌的意象中有所开拓创新，因而使得极为平凡的场景也闪耀出不平常的光彩，使人产生新的审美感受，感到人世间和自然界本有的诗意和美感。试读下列一些诗句：“何处山村人起早，橹声摇月过桥西”；“分得鱼虾归野寺，满江鸥鹭夕阳闲”；“莫言春色无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不都是可以开启感情的窗扉，领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美景吗？

诗的哲理化在宋人绝句中更为普遍，更为明显。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宋代禅学盛行，禅理入诗，而是因为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地主经济的发展使得地主阶级文人文化知识得到普遍的提高，他们中不少人有着较高的古典文化修养，并从而

能在对世界、人生的整体探讨中具有哲理的深度。另外，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大批中小地主文人走上仕途，在封建政体组成中增加新的成份，但因此也引起比前朝复杂得多的政治纷争。宦海的波澜和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引起士人们对本身命运的思索，包括对文学创作本身的思考。这一切的总和，就是宋代哲理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宋人绝句中的哲理诗有的写得很粗率，很平淡，缺乏诗味，但其中好的哲理诗，即诗的哲理化，却是诗人们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是对日常琐屑和无聊庸俗的解脱，使人的感情得到一种洗涤，似乎重新认识了自己，因而产生一种领悟的喜悦，好像超越自我而达到新的境界。像下面一些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是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给人以启迪智慧的理趣吗？至于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深”；“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诗怀自叹多尘土，不似秋来木叶疏”；更可看作为创作心理的别开生面的探索，有益于对古代美学思想的研讨。

“壶中天地”的悲哀 ——文化史研究小议

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是《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上。作者王毅，是《文学遗产》的一位年轻编辑，不但对古典文学有研究，而且对园林建筑有浓厚的兴趣和广博的知识，他有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一书即将出版。

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是“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变”，显然，作者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论述那一历史时期士大夫的艺术心态和审美情趣的。作者从大处着眼，把中国古代文化划成两大块，称为“渐盛”和“日衰”，认为中唐两宋正是其转折处。文章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唐至两宋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已明显趋向于衰落，而“士大夫们却偏偏能够使自己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精美”，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和生活越来越离开前一时期恢宏的汉唐风貌，而转入“壶中天地”，并悠然自得。

论点的新颖是使人感兴趣的，但使人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叙述的方式和所引申的想法。前些年文化史的研究曾经热了一阵子，这之中固然也有一些好文章，但以笔者的陋见，很大部分不是稗贩西方五花八门之说而令人眼眩，就是看似宏阔却大而无当，文字的生涩又是其共同的特色。比较起来，这篇文章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让人觉得亲近多了。

作者抓了一个大题目，却从士大夫日常的生活着手，写他们的诗酒茶食、书画纸砚、文玩谈资、起居游赏，写出他们在这些寻常生活中的心态变化。譬如说，对园林、建筑，汉唐是追求阔大的，中唐以后转向于精微巧妙，李白是“五岳寻仙不辞远”，晚唐的郑谷却是“峨眉咫尺无人去，却向僧窗看假山”。宋人宅园虽小，却尽有层叠巧石、清浅幽径之美。书画的变化更明显，吴道子等人写实的作风让位于宋人的“尚意”，绘画中充溢着士大夫飘逸的情趣，崇尚的是“襟胸洒落，如晴云秋月”的意境。而中唐以后士人对文玩的嗜爱之深也远远超越以前任何时代，他们博雅好古，玩钟鼎彝器，真行草隶，——有名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叙》真把那时士大夫的文玩爱好与生活追求写神了。中唐至两宋又讲求品茗，从陆羽的《茶经》到宋人各色各样的品茶诗文，把茶的形、色、味、用水、茶具等等记述得如此精细，使人叹为观止。他们饮茶，不止是一种物质享受，而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与写字、作画、着棋、弹琴一起表现其高情远韵的特殊方式。至于谈禅之玄适，酒食之精巧，服饰之清雅，风月玩赏之脱俗，在此表现了高度完善的封建文化所熏陶出的一种特异的胸次与气质。

文学创作上也何尝不是如此。宋代的诗话、笔记是为人所艳称的，但曹丕《典论·论文》中所大声疾呼的“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已越来越远了，代之而起的是资闲谈、备笑乐的随意漫谈。诗中的集古诗增多，与书法家的集古字一起，蔚为一代艺术风气。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其实宋人何尝不是如此。宋人的诗词，其正宗是精研和雅、恬逸洒脱。南宋诗人尤袤题其诗集名为“遂初”，即是求归隐；宋代文人虽居廊庙之上，骨子里终有隐士气。

这种种，说明了什么呢？在那种追求精美雅致的背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带根本性的缺陷呢？作者的结论是那样的清醒，也使人感到一种冷峻：士

大夫们那种创造高度完善、精美绝伦的文化体系的努力，“使这个肩负着整个社会命运的阶层越来越彻底和自觉地丧失了把目光投向壶天之外的可能”。原来，精美的代价就是视野的缩小，时代使命与人生价值的失落。壶中天地的悲哀也正在此。

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话大抵是不错的。但那时士大夫所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作过冷静的剖析。这使我想起前些年对清代考据学的赞美歌颂。颇有一些宏文无条件地赞誉清代汉学的高度成就，甚至认为是“理性”的表现，而竟忘记了在清政府高压政策下，清代的学术是如何由顾亭林等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转向于皓首穷经，导致几代知识分子关起门来钻古书。

文化史的研究应当具备一把解剖刀，把内在的真相显露出来，而不要被表面的光泽所迷惑。这是我读了王毅这篇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点启发。

高明的卒年

《琵琶记》作者高明（则诚）的卒年向无定说。钱南扬同志在《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中，从苏伯衡生年推测高明生于大德五年（公元1301），说其卒当在70以上。戴不凡同志的《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一书，据王昶《明词综》卷一高明小传：“洪武初召修元史，以老病辞归”，谓其歿当在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以后。这些都是揣测之辞。

清代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文云：

陆务观诗，大概学杜少陵，间多爱君忧时之语。如《题侠客图》所谓“无奈和戎白面郎”，《示儿作》所谓“但悲不见九州同”，《壮士歌》所谓“胡不来归汉天子”，其雄心壮气可想见已。此诗意高语健，不以衰老自弃，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莱廊庙异趣，而所贵者道，则其平生所志，又非徒屑屑于事功者。或者乃以韩平原《南园记》为放翁病，岂知《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事业，初无谏辞，庸何伤！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志于龙方。

同书同卷还有余尧臣的《题晨起诗卷》文章，现在一并抄录于下：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端，以为爱君忧时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岂以《南园》一记为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气象于三千载之上，又安肯自附权臣以求进。斯言也，非特尽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负从可见矣。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言行相顾而不背者，予于高公见之。永嘉余尧臣敬书。

高明这篇文章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据余尧臣说，过了六年，他就在四明（宁波）死去，则这年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高明的卒年就要大大提前，与过去的一些记载大不相同。

余尧臣是怎样一个人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一段记载：“余左司尧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学著。客居会稽。越镇帅院判迈善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与有保越之功，荐剡交上；无意仕进，于越之桐桂里治圃结第，署曰菜圃。已而入吴，居北郭。……吴亡之后，与杨基、徐贲同被征谪濠。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王行传》称“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后面又说余氏曾入张士诚幕府，明太祖立，“破例徙濠梁”，洪武二年放还，授新郑丞。

从关于余尧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第一，余尧臣大致与高明同时，又同是永嘉人，他后来客居会稽，虽一度参加张士诚军队，但活动地

文载剧本月刊社编的《琵琶记讨论专刊》。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按高明的诗、文、词今存约五十余篇。他的文，据《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和冒广生的附记，仅六篇，即《大成乐赋》、《余姚筑城记》、《乌宝传》、《碧梧翠竹堂后记》、《孝义并记》、《华孝子故址记》。这篇《题晨起诗卷》是他处未见的。

域仍不出江、浙一带。高明的行踪大致也不出这个范围。第二，余尧臣的交游，大多是元明之际的知名文人。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高明《柔克斋诗辑》中，我们还可发现：除了《丁酉二月二日访仲仁仲远仲刚贤昆季别后赋诗以谢》一诗以外（丁酉是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其他的诗都没有明显标出作诗年月，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些诗没有一首有入明所作的痕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史料：说朱元璋建国后，闻高明之名，使使征之，而高明却托词不出，这出于《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等书的记载。但这些书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人所著，就史料的可靠性来说，是及《吴越所见书画录》所收高明和余尧臣两篇的。

我们再从高明交游的线索中寻检一下：赵汭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其中说“既开幕府，及以论事不同，避不治文书”，这是1352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号以后，高明离开杭州时，赵汭送他的话。此外，刘基有几首诗赠他，这几首诗都写于明朝建立以前。这个情况也可为上说作一旁证。

根据以上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确定，高明是在明朝建立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逝世的，他的生年现在仍不可考。这样，过去不少有关他晚年生活的记载，有关他入明以后活动的记载，就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真实价值。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

乍一看，这个题目很怪，读者可能发问，卢文弨与《四库全书》有什么关系？

卢文弨与《四库全书》确实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出在：前一阵子文史学界似乎有一股《四库》热，炒清朝所修的《四库全书》做文章。有某一位大学问家，讥斥别人不读书、不查书，说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学者几千人，随后举了几个人名，其中有卢文弨。这位学问家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中华读书报》今年6月21日陈四益先生《读书真不易》一文曾有所驳正。不过我想，卢文弨也是清朝一位大学问家，名气不小，请他参加修《四库全书》，总不至于信口而谈吧。这些年来自己看书作文，养成了一种不好的考据癖，不免查些书，随即写下了这篇读书心得。

我先查了《四库全书总目》前面所刊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列的所谓“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这是《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历次参与其事的总名单，一共330人，这里有只领空衔的皇子，有管理行政的大臣，真正修书的学者不过一半左右，所谓几千人，不知语从何来？而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那末为什么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实确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一生理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眇神昏，而复自力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王僧虔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周年暨复建10周年,《清华大学学报》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等先生的检讨,在北大及毕业以后,又得到钱钟书、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等先生的教谕。各位先生,包括在此之前的闻一多、朱自清,及再早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前辈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学术路数各有特色,但我感到其中总有一种共同的、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西。

这种共性是什么?我想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宏观微观相结合,似乎过于笼统。疑古、释古,也似乎只就研究范围的某一方面而言(如特别是对过去历史的态度)。我建议,是否可就清华人文学系,从20年代起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有计划地逐一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研究。我想,这样的学者至少总得有二三十位。如果我们对这二三十位学者治学道路和著作成果一一加以剖析和总结,并联系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思想环境,我们就对清华的总的学术风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曾对陈寅恪和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思想作过一点探索,写过几篇文章,也细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古代文史研究的论著,再结合大学时听课所得,清华的学风使我受到教益的,可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整个研究思路总蕴含有一种清晰的文化意识。二是能着眼于当前的现实,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而又能沟通古今,并不牵强于什么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如闻一多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吟咏: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但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精神是清华学风中最可珍贵的。

热中求冷

《中国文化报》的编辑陆璐，写信给我，说她负责的“文化生活”版近期内新开辟“人生旋律”栏目，要我写一篇短文。一见“人生旋律”四字，不知怎地，就忽然联想起目下所谓“潇洒走一回”的时髦语。我从1958年开始就一直做编辑，每天无非是伏案看书，执笔改稿，而且做的又是古籍编辑，面对的无非是圈圈点点，早已被人讥嘲为“短竹之学”。这样的生活，实在无“旋律”可言，因此苦于无从下笔，不敢交稿。

但年岁毕竟大了，可能是人生通病，年纪越大，越爱回头看，觉得有些事，细嚼起来倒还有味道。这样，慢慢地也领悟出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道理。

我于195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做助教。开头几年似乎过得还不错。正好碰上所谓“向科学进军”，又所谓“风华正茂”，年轻人在一起，颇有点“指点江山”的劲头，头脑发热。忽然，1958年初通知我，说因1957年夏中文系几个人想搞同仁刊物，我也在内，就补划我为右派。随即从北大贬出，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那时自我感觉似乎忽然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缙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也可算是我的乡先辈，小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缙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

那时商务总编是陈翰伯。他也是文人，对像我这样的人似乎不放在心上，有点听之任之的味道。在商务只几个月，后来改入中华书局。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算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这种“热中求冷”，或许也可算是“人生旋律”吧。

1958年7月到中华书局，马上转入纷繁紧迫的编书生涯。刚到中华，在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300首来加以消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揭露其黑暗面，重点收录所谓民间谣谚，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再加上白居易、杜荀鹤等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只选诗，还要在注中表现批判的观点。我从北大出来，总算学过一些新理论，就把我作为主要劳力，晚上加班，星期天上班，赶在当年国庆节前出书。那时编辑室一位副主任，自称“三八式”干

部，解放前曾在邓拓同志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就请邓拓当顾问，请他阅稿，又请他写“前言”。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书一出来，马上向上级献礼，真是热昏了头。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端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描绘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那时我正好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寂静时，读到《人民日报》的这一揭批文章，真是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后给邓拓看看，怎么忽然变成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他是明白前后过程的，但却要曲意为此。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家农舍昏微的灯光下，面对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人生旋律中热、冷两方面，确可以来回转换，关键是自己如何把握。限于篇幅，不得不打住了。临了，还想说一点，1969年至1973年我随文化部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战地变成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内，点起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书香飘入百姓家

1996年3月，浙江宁波市由《宁波日报》、新江厦商城、市图书馆、天一阁共同发起，举办宁波市首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这一评选活动终于在5月下旬圆满告成。由于我是宁波人，又在出版社工作，长期与书打交道，因此《宁波日报》特地邀请我参加5月31日在宁波举行的十佳藏书家庭颁奖仪式，以及同时举行的“家庭藏书与文化建设”座谈会。我这次在宁波虽短短几天，却受到很大的启发。

据介绍，评选活动开始时，四家发起单位根据全市居民家庭藏书情况，规定藏书量在1000册以上者可以报名，结果全市范围内有182人报名。其中既有机关干部和大中小学教师，也有工人、农民、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涉及各个行业各种职业。评选工作人员逐户登门走访，详细记录，最后评选委员会根据藏书数量、藏书条件、藏书特色、藏书历史，逐项评估打分，评出十佳藏书家庭。

之所以说是藏书家庭，而不说是藏书家，据说根据现代中国的生活条件，如果得不到家庭的理解与支持，要有一定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实是家庭藏书的基础。如这次被评为十佳之一的童可权，为宁海中学一位教师。他藏书6000多册，可以说蔚为大观，但这全靠他的妻子鼎力相助。他的妻子善于裁缝手艺，80年代中期她只身西赴兰州，北上哈尔滨，又南下广州，设摊裁剪衣服，用十指辛苦挣来的钱供这位教书先生来大笔购书，毫无怨言。

另有一位入选“十佳”的，是一位照相馆经理，名杨曙光。他藏有7000余册书，还一年订阅30几种杂志。他家一间14平方米的大间和一间7平方米的小间全堆满了书，夫妇俩只好挤在另一小房间住。幸好他的妻子张可可也是书迷，因此住房虽挤，却也自得其乐。今年3月中旬，张可可还在《宁波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读红楼考据》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周汝昌的《红楼艺术》、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以及清人甫塘逸士的《续阅微草堂笔记》等，真不容易。杨曙光自己也说，他是搞摄影的，他所藏文史哲类的书似乎与其专业关系不大，但他认为，如果不能体验唐诗宋词的意境，不能进入莎士比亚、黑格尔的世界，是不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这样对摄影艺术也就不可能有所提高或升华。作为一个普通摄影师，有这样一个文化家庭，有这样一种文化意识，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现代化道路迈进上一个极为可喜的标志。

藏书首先是购书，而购书则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目下不难看到某些“大款”，为了装点门面，买几套豪华精装本，在装修一新的客厅中摆几只大书柜，以附庸风雅。这次宁波市评出的“十佳”，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是不高的。他们为了买书，多年以来总是节衣缩食。“十佳”之一的李建成，是宁波市钢锯厂的工人，他爱好中国书法艺术，总想把这方面的书买齐了。他说：“有时为了配齐一套好书，我消耗了很多心血。”平平常常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位工人同志在购书过程中饱尝到多少艰辛。

但收获仍是很大的。宁波师院中文系主任贺圣谟，自述“从青年时代起即有意设计一个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文学工作者的理想藏书结构：博罗古今、以用为主”。至今积书十六橱（架），有不少初版新文学作品，国内

研究文学的同行常向他索借。另一位“十佳”童银舫，是慈溪匡堰镇一位办事员，他长期钟情于地方文化研究，曾参与过7年编地方志的工作，其所藏7000余册书中，地方文献及慈溪人著作即将近一半，这对研究慈溪的历史文化必将提供珍贵的资料。另外，这次虽未列“十佳”的宁波市珠算协会邱美清老先生，多年积蓄，专藏古今珠算书籍，数量达300种之多，这也可说是独有的藏家。

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以千百计著名藏书家。藏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保存并传下大量的珍贵典籍。清人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曾把藏书家分成五类：考证家、校仇家、收藏家、鉴赏家、搜贩家。其实藏书家从事的不是单一方面的工作，而是关于人类学术文化多方面的工作。宁波是有长久藏书历史的文化名城，建置于明代、后被誉为“南国书城”的天一阁，即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卓越代表之一。当然，我们现在一般平民的藏书与过去藏书家凭籍其所拥有的土地资财购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新的历史时期，鼓励人们多藏书，藏好书，以有助于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提高家庭文化素质，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课题。

唐朝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不妨用此二句，以我这次宁波之行的感受，改写为：“旧时天一阁前香，飘入寻常百姓家”。

《文史》掇忆

《文史》这一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刊物，已经出到 30 辑了。近些天来，我翻阅了一下“文革”前的《文史》卷宗，对那一时期的工作有些感触。苏东坡说“事如春梦了无痕。”日常繁杂的生活是会把好些事湮没得一点痕迹也没有的，有时就需要我们作些具体的回顾，这样就能稍微再现当时的情景，使我们可以稍微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从过去的履痕中得到一种感情上的慰藉和认识上的升华。

那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显然经过一定的考虑，把《文史》放在文学编辑室。当时的室主任是出版界老前辈徐调孚先生，但他手下的一帮人，也就是那时文学室的业务骨干，大都不过 30 上下，除了王国维的儿子王仲闻先生是六十出头，不过他那时还不算正式职工。《文史》的责任编辑只一个人，就是沈玉成同志，当时他还没有摘“右派”帽子，正因如此，使一些害左视眼的人常为之侧目，这也是使我佩服灿然同志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也是“文革”中成为他的一条大罪状，即重用“右派”（包括我在内）。不过说实话，那时我们几个人，包括程毅中同志和王仲闻先生，倒是兴高采烈的。我们是一个办公室，桌子靠近，玉成是责任编辑，我们几个人帮他出主意，看稿，写稿，无形中形成一个小小的智囊团。有时调孚先生也从隔壁房间跑来，他总是站着，站在我们书桌旁，谈得高兴时，就把眼镜拿下来，气氛十分融洽，似乎左、右的政治界线暂时泯灭了（调孚先生那时已是党员）。

“文革”前办《文史》，最大的困难，也就是经常提心吊胆的，是政治问题。编这么一个偏重于资料考证的古代文史刊物，会不会被人目为繁琐考据，被指责为复旧，或被说成遗老遗少。当时的中华从领导到编辑人员，对此都很敏感，生怕触电。突出表现在《文史》第一辑的“前记”上。

还在筹备期间，灿然同志就曾让赵守俨同志和我分别草拟过“编辑凡例”，这两份凡例现在还保存在卷宗里。后来正式确定玉成专职从事《文史》的编辑工作，就叫他起草类似于发刊词的“编后记”（刊出时又改为“前记”）。玉成起草时也煞费苦心拼凑了几千字，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资料考据等等。灿然同志可能感到这样不容易说清楚，而且在当时政治气候下，这些方面说得越多也越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因此就叫玉成删了又删。最后写成千把字的编后记，分送社外几个编委和社内领导审阅。这篇编后记最关键的是这一段话：

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

这段话，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平温得很的，现在有些报刊上的文章，类似的意思，而词句比这尖锐的不知有多少。但就是这一段话，几位领导却表现得高度紧张，现在看看他们的批示，倒是很有意思的。

当时的副总编丁树奇同志索性把这一段整个地勾掉。灿然同志删去“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一句话；“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以“这是一种优

良”代替“对于改进我们”六个字，而把“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句删去。编委冯定和吴晗最宽容，未作改动，吴晗只在“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句，“细心的”前加“科学的”三字。林润青也删去“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以及“重视资料”以下四句。意见提得最多的是编委何其芳同志。他在“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等句下都打上红杠，并用小字作了批注：“此段值得斟酌的。我们今天只是‘提倡朴学家的学风’？批判地继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不等于就是提倡那种学风。我们还有我们的新东西。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也有许多不科学的，和我们今天说的‘实事求是’不同。如陈奂关于诗经的注解著作，一概以毛诗为准，那算什么‘一丝不苟’、‘尊重客观’？”“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二句，批注道：“这种说法也可斟酌。我们的学风也并非不重视资料，不认真研究、辨别资料。这种说法好像我们学风很成问题似的，好像连清代朴学家都不如似的。我们的学风的主流是好的；空谈、空话，不重视资料，不是我们的学风的主要方面。”说实话，当时我看了何其芳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很佩服的。现在看来，他的这些话也有合理成份，但可以看出，当时这几位领导对于稍稍涉及“现实政治”（那时的套语），是何等的紧张和敏感，生怕出问题。不过，他们对于出《文史》这样一个刊物，则从思想到感情上都是赞同的，包括何其芳同志在内。由何其芳同志的这些意见，我倒看出他那时对工作、对事业是何等的认真和虔诚。

“文革”前的《文史》，名义上由《新建设》杂志编辑，中华书局出版，实际上中华书局在组稿、审稿中所起的作用，无宁说起主要的作用。正如当时在《新建设》杂志社工作、具体负责《文史》稿件的王庆成同志（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在1963年1月31日给沈玉成的信中所说的：“《文史》的编辑工作，目前实际上是由我们两家合作来搞，而且你们花的力气比我们还多。”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当时不管是《新建设》转来的稿子，或是作者自动投来的稿子，都由玉成或我自己看，或由调孚先生组织编辑室内的同志看（调孚先生亲自为《文史》草拟退稿、退改或联系组稿的信件，现在还有好几封保存在档案里），有的还由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萧项平同志安排给其他编辑室的同志看。那时各编辑室的业务骨干都替《文史》审阅过稿件。当时赵守俨同志任古代史编辑室主任，李侃同志任近代史编辑室主任，他们也替《文史》阅稿，并写有具体的审阅意见。这里不妨从《文史》卷宗中摘抄两份：

守俨同志对一篇书稿所写的意见：

一、司马相如传二十七下“躬儼駢胝无胈”应从史记作躬胝无胈。案王先谦已言之。本文作者所谓“附录”，乃指殿本考证。史记是史记，汉书是汉书，这类的问题不能径据史记改汉书。

二、同传“以訾为郎”，訾应作贄。案訾与贄通，颜师古有注，不能改。如改为贄，则颜注变成无的放矢，连颜注一起删，更不能这样办。作者对以贄为郎的解释仍未解决问题。何义门云，贄郎乃择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似近乎是。

三、同传“夫容”改“芙蓉”，“毒冒”改“璫瑁”。案可通，不必改。

四、同传“乃饮卓氏弄琴”，“卓”上加“为”字。案作者把句子读错

了，应读作“乃饮卓氏，弄琴”，并不存在脱字问题。

此外对终军传及霍光传颜注的驳正也都不对。谓光传“挽显”的显是神主尤可笑，显是人名，又误解了史文。

此文不能用。

李侃同志对一篇《中国同盟会成立日期考》所写的意见为：

此文我意似可用，不过作为“补白”就行了。文字亦可大大节省，题目可改一个，不用“考”，因为这种“考”分量太轻。只把几种说法摆出来，然后证以可靠材料即可，大概有一千字足够。至于邹鲁为什么错了，可不说，邹鲁《国民党史稿》似可提，因为这是纠其错误，并作为资料引用（此点我把握不定，请再问问树奇同志）。

他们的意见有案断，有具体材料和分析。作为编辑室主任，来审阅不属于本编辑室的稿件，并且写出有具体分析的意见，可见那时中华书局编辑部从总编辑起，直到室主任和编辑人员，对此是何等重视。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1963年6月，为了讨论《文史》第三辑的内容和安排问题，还由几个编委和中华书局的副总编丁树奇、萧项平等同志联合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前由中华书局提供了一份第三辑所收文章的内容简介和评阅意见。这份材料是写得相当充实的。如对于《共工传说史实探源》一文是这样写的：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神话传说与古史的关系，引用了吕振羽、翦伯赞、吴泽等人的意见，认为神话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实意义”。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说共工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与洪水作斗争而以治水著名。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也是为了治水，把山打开一个缺口，水就可以流向东南低地。而共工氏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勇于斗争的民族，曾向三皇五帝作过斗争，但由于内政不修，因而失败。

徐旭生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大体还好。

吴晗同志批示说“这篇稿子可用，但稿中所引原文应逐条核对一下”。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不是一篇科学性的考证。文中所提出神话传说与历史的关系是不错的，但这两者并不能等同。这篇文章似乎就犯了这个毛病，对共工氏作了许多细致的考证，惟其太细致，而其依靠的基础却是神话传说，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文史》最好不登。

类似这样的表示中华书局编辑部独立不苟意见的有好几篇，而且把编辑部内不同意见也摆出来。如对孙常叙《楚辞九歌悬解之一》，先引文怀沙的审读意见，然后说：

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同志的看法也不一致。文学组的几位同志认为有关《九歌》的材料就是这么一些，内证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如另有坚强的外证，才有另创新说的权利。而这篇文章并无新的外证，而是从主观出发，想象再加想象，其结论似乎凿凿有据，但那是建筑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的。历史组的同志则认为此文颇有可取处，从所论证的各点中，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神话、歌舞的曼妙，富于想象力，是这篇文章的可取处。所用的材料，以楚辞同时代的《山海经》和继承楚辞神话传说系统的《淮南子》相印证，也是可取的，至少是一条很好的路子。

一篇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看（此文还请北大的林庚先生看过），而且还由不同的编辑室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就不仅显得郑重，还可见出当时编辑

部浓厚的学术风气，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真是难得，令人忆念。

玉成曾提到《文史》第一辑《文选六臣注订 》一文的作者祝廉先在文末提及感谢几位友人曾帮他修改此文，其中陈彦及为陈布雷，后经人指出，害得他作了检查。不过我看当时的档案，几位领导并没有强调个人的责任，丁树奇同志批示说：“可以写一个经过情况，并拟订今后防止这种问题的办法。”萧项平同志批示中说：“这篇文章我也看过，不能推卸责任。”我认为，这样的领导作风与气度，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还想提一个可能使人感到兴趣的小材料。《文史》卷宗中还保存第二辑和第三辑的稿费情况。第二辑最高是顾颉刚和章士钊，千字 14 元，其他基本上是 12 元。这是 1963 年 4 月。第三辑最高是陈垣，千字 15 元，其次冯家升，千字 14 元，其他大部分为 12 元。这大约是 1963 年 9 月。时隔 25 年，四分之一世纪，各方面情况都有不少变化，而目前《文史》的稿费恐怕比那时也只不过提高三、五元，我们学术文章的“价格”确实是十分的“稳定”，看到过去的材料，不免会使人想得很多的。

《学林漫录》琐记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使得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同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但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子。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的“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编者的话”说：“《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故作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脚，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的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艺术家、学者、作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些，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成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恣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史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不象现在都成为各自编辑室的主任，行政、业务事情一大堆。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艺术家、作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写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者久，了解更深，行文又自然真挚，

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总计已出的 12 集中，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其中除了王季思先生外，都已作古，而且也已有几位执笔者在近几年内去世，这更使人感到这些文章的可贵，和抢救这些活的史料的紧迫性。

关于这方面，有几件事值得谈一谈。一次，我们几个人闲谈，觉得近代藏书楼中，嘉业堂名气大，但记载不多，鲜为人所知，一般人知道的不过是鲁迅先生所记去买书而吃闭门羹的事。但请谁来写呢？嘉业堂藏书楼初建时，从 1925 年起曾请周子美任书楼编目主任，直至 1932 年周先生应圣约翰大学之聘，去上海执教为止，主管书楼事务达八年之久。请周老先生写当然好，但那时周先生任华东师大副教授，已是 87 岁高龄，双耳重听，执笔为文，诸多不便。后来我们得悉刘承干的嫡长子刘沂万住在上海，喜爱昆曲，正好我们在上海的友人陆萼庭同志也喜昆曲，与这位刘先生有来往，就拜托萼庭同志去打听，萼庭同志推荐了在解放日报社供职的许寅同志。许寅同志是老记者，又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与刘家是同乡，真是理想的人选。承蒙许寅同志允诺，他还特地找了刘沂万、周子美等作了详细调查，亲自跑了两趟南浔，写了翔实而潇洒的一篇记实文章：《“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这可以说是自嘉业堂创建以来记述其历史和现状的最完整、最鲜活的文献了。这篇文章据说真还起了作用，浙江省有关领导看了以后，特地指示拨款修整嘉业堂藏书楼以作为文物和旅游胜地。刘沂万和他的夫人李家瑛女士——李鸿章的侄曾孙女，本来在上海有几处房子，他们老两口在文革中被冲到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楼一角”，在这篇文章刊出后，据说也落实了政策，归还了一部分房子，刘沂万先生被安置在文史馆工作，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

以文章而论，许寅同志也确不愧为记者老手。譬如他写到南浔，在小莲庄吃午饭的情状：“在厅堂内小坐，张阿姨请吃饭。这里不愧为鱼米之乡，桌上这几样菜，一看就令人‘食指大动’：一盆盐水虾，几乎只只小指粗细，红得透亮，说明其新鲜程度之高；一盆酱蟹，黄澄澄地，小虽小，只只饱满；一条鲢鱼，肉头肥厚，浓油赤酱；一碗清蒸鲫鱼，上铺一层火腿、虾米、笋干；外加一盆碧绿的青椒、深紫的筋子、大红的番茄；色彩鲜艳，香气扑鼻，味道鲜美。一问价格，却相当便宜：海虾每斤不超过一元五角，湖蟹每斤仅七八角，鲜鱼也大抵如此，而且都是集市价格。”看了这一段，真使人想起前人词中所谓“江南好，能不忆江南”。这是 1982 年写的，看看那时虾、蟹、鱼的价格，对照时下的行情，真也够让人感慨的。

另一是写无锡国专的文章。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成立于 1920 年，校长唐文治。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学校，专门培养文史研究人才，类似于现在有些大学中设立的古典文献专业。短短 20 几年，这个学校培育出不少人才，有些已是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唐兰、王遽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等前辈老宿，还有不少也是当今学术界的骨干，特别在东南一带。我们认为无锡国专的办学有一套经验，应当探究。但请谁来写呢？最先曾想请冯其庸同志，他也是无锡国专出身的，但他谦虚地推辞，说他只是解放前几年在那边呆过一阵子，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对学校情况不熟。由他推荐，请唐史和唐律专家上海教育学院的杨廷福先生写，杨先生为人豪爽，很快答应，并约上海于近代日记有专门研究的陈左高先生，合写《无锡国专杂忆》一文，刊载于《学林漫录》四集。前些年江苏省一些学人据说曾因而拟议重建无锡国专，后虽因他故未能实现，但也可见这篇文章所引起的效应。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二三千字，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德译本 浮生六记 序》（八集），钱仲联先生《重修破山寺碑记》（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的，一是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钱伯城同志。一次我到上海，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后来我们经研究，决定在第六集一次刊出。想要了解本世纪二三十年间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大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同志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见《书品》1987年第4期《读（学林漫录）》）。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书名（即“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衍、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这在现今的刊物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1980年6月出初集，到现在已出版了12集，内容以第八集最佳。目前还有一集正在排校中，却已是拖了两年，迟迟未能印出，陷入经济危机。从出版的进度与印数来说，《学林漫录》可以说每况愈下，而特别是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万多册，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五、六集是1982年出，七、八集是1983年出，九集是1984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几千册。1985年倒也是出了两集（十、十一），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两年都是空档，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二千五百册。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出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出来的否。有的是开玩笑的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我们只有苦笑对之。俗语说，不怕慢，只怕站，说不定《学林漫录》就得到此为止呢！前途如何，渺不可测，我们只求在排校中的第十三集还能印出来，希望苦撑一段时期，还能一集一集的编出来，那怕慢一点。

1989年9月

《书品》 ——与著者读者沟通的桥梁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 1990 年底，1991 年初，中华书局编印的《书品》创刊五周年时，曾组织过一次笔谈，这些笔谈文章，读来很有味道，印象很深，好象还是昨天一般，不想一晃 5 年又过去了。唐朝诗人李商隐咏金陵在南朝的变迁，曾有一诗句，说“三百年间同晓梦”（《咏史》），很值得人玩味。300 年尚且如此，则五年更算不上什么了。但近来翻阅这 5 年来《书品》的文章，使人吃惊的是，中华书局竟还是出了那么多值得人评说的书，可见，尽管人事倥偬，文化还是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

5 周年笔谈，我很欣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先生的文章，他的题目是：《读书品，学品书，一乐也》。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不少人读《书品》后的共同感受。这一乐，乐在哪里呢？据我的体会，一是《书品》所品的中华版的书，或《书品》的评介文章，大多意趣高雅，不落俗套。中华书局所出的书，很多专业性较强，大多数人会觉得面太窄，达不到畅销的商业标准。但就我所接触的文史界朋友，倒觉得这些书是真正有用的。出版社应有文化学术意识。在目前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出版社当然不能忘记经营，而且要著意把经营搞好。但出版物并非是纯粹的商品，也不能简单地说把出版社推向市场。特别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文化与学术应当是出版社的灵魂。

中华书局是具有 80 多年历史的一家出版社，在本世纪，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无论是哪一个阶段，中华书局总是与文化界、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切的联系与交往。不同年龄段的著者与读者，一说起中华书局，总会产生一种带有时代情味的意绪。这是因为，中华书局这一老的出版社，在其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并不忘记文化意识与学术意识。也正是这一点，得到文史学界不少友人的好感与好评。

譬如《书品》1990 年第 1 期北大吴小如先生在《读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一文中，对中华“不惜冒亏本风险而终于印成此书”，认为“其尊重学术、尊重前辈学者的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感佩”。杭州大学吴熊和先生在《书品》1991 年第 3 期，写《词话丛编读后》，也认为中华能再版唐圭璋先生的修订本《词话丛编》，这实在是“对不久前去世的唐圭璋先生的最好纪念”。对老一辈学者是如此，对中年学者，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蔡美彪先生在评介中华所出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时所说的，“80 年来，特别是近 40 年来，中华书局为出版供学术研究之用的古籍和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蔡先生评许为这是有“大家风度”（《书品》1992 年第 2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老编审、著名唐代文史研究者朱金城，看到中华出版清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竟感慨万分，认为此书的出版“使我多年来的愿望成为现实”，说“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卓识与远见，尤其令人敬佩”（《书品》1992 年第 3 期）。无怪乎罗继祖先生难免带有很大情绪地说，“出版界不景气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的，一时全国黄色淫秽书刊在逐利书商贪婪的操纵下满坑满谷，流毒无穷”，而赞许“中华书局在这样的风气里，不顾一切，照样埋头出他们所担负的所整理好的古籍”（《书品》1991 年第 3 期）。我在这里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情况确实如此。最近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告诉我，90 余高龄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特地托人带话，说他还没有在中华出过书，颇感遗憾，他的一本论民俗文化的10余万字论文集，宁愿不要稿费，还自己买1000多册书，也要拿到中华来出书。日前陕西师大史念海先生写信给我，其中说：“犹忆数年前，尊驾莅临西安，曾嘱撰写有关历史地理学史一书”，并说“亦曾将尊嘱转告白寿彝先生，寿彝先生亦亟赞成，并告以早日应命”。史先生一再说此书写成后愿在中华出版。这些前辈学者殷切期望之情，既是对中华学风的肯定，也是对中华工作的关切与鞭策。

以上是蔡鸿生先生所说的“乐也”之一。其二，则是《书品》的文章所说的多是实话，无论是赞许或批评，都不作虚语，更无时下流行的广告语言，动不动就“天下第一”、“全球最佳”。尤其值得人读的，是一些批评文章。在自己办的刊物上，登批评自己出的书的文章，有时一期还不止一篇，有时还连续登，我想这在现在似还无第二家。奇怪的是，尽管有批评，这些书还是照样有人买，有人读。因为批评者的意见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他们虽是批评，但认为书还是好书，缺点或错误，有个整体估量的问题，这在有识者是心里明白的。至于有时候报纸上登一条有轰动效应的文章，把某一本书的错误作不适当的夸大，这也不要紧。出版社应当有一种气量，应经得起批评，经受得住无端指责，甚至攻击和谩骂。古人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个学者，一个出版社，他（它）有多少份量，是有公论的，要有杜甫所说的“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器识与度量。我想，这也是《书品》之能得人好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书品》上有不少篇文章是中华编辑部的人写的。我做过30多年编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文革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说过一句名言，说编辑好象理发师，一部书稿来了，好象进来一个要理发的人，头发蓬松，胡子满脸，经过编辑仔细审读加工，书稿干干净净印了出来，好象这位客人头发整齐，满脸红光，出了店门。因此，一位责编是最仔细的第一个读者，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评论者。我看了《书品》上几位编辑同志的文章，深为文风的于平实中创新而欣慰。

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颀、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局当时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受某种潮流的冲激，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操劳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编辑应当把学者化作为自己进取的目标。读者当可从《书品》中看到中华书局的编辑，是怎样把自己定位的。

我想，这就是《书品》创刊十周年时人们得出的一个共同感受——《书品》，与著者、读者起沟通作用的桥梁，希望它永远坚固。

历史的沉思

最近抽空读了两本有关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一本是晚清容闳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國生活的追忆》，一本是美国人A·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副题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两本书一起读，感到很有意思。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为学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作的认真的思考，倒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繁琐的事务中稍有超脱，起一种悠然的历史的遐想。

容闳的书原是用英文写的，1909年在美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了中译本，取名为《西学东渐记》。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所必读的书。我最早接触这本书是1949年下半年宁波刚解放不久，我还在中学读书，从学校图书馆尘封中检到这本书。中译本用的是文言文，但接近于林琴南译《茶花女》那种文体，我当时虽是高中一年级，倒是大体上读了下来。解放初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当然很深，而容闳的这本书却使我知道美国生活的另一面，但也使我疑惑，觉得象容闳那样眷恋故土，一心希望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却认为只有西方教育才能救中国，这到底对不对呢？

现在的中译本是由王蓁同志翻译的，比起原来的译本当然有极大的提高，用现代汉语译也更接近于原作的精神。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原来的书名《西学东渐记》似乎更能表达容闳作书时的用意；“西学东渐”这一简单的词组，真能勾勒出那一整个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不少忧国伤时之士的深切情怀和血泪向望。

1828年容闳出生于澳门以西一个小岛（现属广东省香山县）上的穷苦人家，1839年进入英国传教士郭施拉夫人创办的学校，后又升入一所英国商人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后来容闳随这所学校迁往香港，中间曾因父亲去世，生活困难，辍学在一家印刷厂做工。由于他勤奋向学，刻苦上进，受到学校的重视，遂于1847年他16岁时由马礼逊学校的教师美国人勃朗带到美国学习，并且进入美国第一流学校耶鲁大学。他于1854年毕业时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这时他已是美国公民。就在这时，他思想中极可珍贵的火花闪现了，他说：“教育已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他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他真诚地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他作了今天使人读了尚为之感奋的决定：“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灯，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容闳始终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这一番话完全是出于内心，一点虚伪、做作都没有，而且此后他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当时完全相信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与思想远胜于他“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的故国。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但这样的社会却在在使他失望。他回国以后所接触到的现实，最使他伤心的，是“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他认为清朝政府必然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腐败”，“一切都是交易，出价最高者就可以得标”，“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的组织”。

容闳根据当时的现实，说：“中国的历史，和她的文化一样，至少有两千年之久，就像一潭死水，充分表现出陈陈相因的民族特色。”正因此，他

在童年时一见到郭施拉夫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

容闳凭他的英语能力，凭他的学识，回国以后，在洋行中做事，经商致富，是一帆风顺的路。事实上也有人保荐他做买办。但他终于谢绝，说：“买办固然是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奴仆性质。”他在回国后曾对他母亲说过，“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后来在不同职务中，他总是把这一信念牢记心中：“至少有一个中国人是把洁白的名誉和诚实的品格看得比金钱更重。”

正因如此，他不屈不挠地努力，说服曾国藩和其他一些实权人物，争取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当清朝廷根据容闳的建议，决定分批向美国派遣 12 至 14 岁 120 名学生时，真使容闳感奋不已，竟高呼“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他天真地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从而建立起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

近代社会确有不少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多数着重于兴工厂、办洋务、开宪政，等等，只有少数人着眼于教育。第一个出使于英国的郭嵩焘，根据其亲身经历，曾说“英国富强之业一出于学问”，而西方之所以强盛，“其源皆在学校”。严复也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乃在于“一一皆本之学术”（《严复集》第 11 页，中华书局版）。曾参加变法维新而被革职的诗人陈三立，在一篇传记中，转述传主的话，“以为富强之术，宜专教育人材”（《散原精舍文集》卷二）。

但结果怎样呢？容闳所极力主张的向美国派遣的留学生，终因官场的倾轧，封建当权派的无知与偏执，未到年限即被中途召回，这批学生遂即也就星流云散。

容闳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现在看来，在他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平常不过的了。现在问题是，他的那套想法究竟对不对呢？他的那套教育设想，即“将西方教育与东方文化交融在一起”，并以为这是“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似乎是来回答这个问题，本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 A·柯文写了一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极富思辨色彩的文笔来回答应当怎样看待近代中国发展的走向，决定中国发展走向的到底是哪一种力量。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确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它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代表学者，他们治学的方法、成果和趋向，另一方面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并对其他有关的论点进行分析和批评，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西方的影响有极大的参照作用。

柯文以整整三章的篇幅分别论述和批判了三种西方中心的模式，这三种模式分别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它们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是始终不可能产生近代工业化的前提条件的，只有西方入侵，才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此书第二章一开头，即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三种模式的共同主张：“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作者在另一处说，美国历史学界，直到二次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本着“从 19 世纪继承下来

的一整套假设”，那就是：“认为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静态的，西方是动态的；中国无力自己产生变化，因此需要外力冲击，促使它产生巨变；而且只有西方才能带来这种外力；最后认为随着西方的入侵，‘传统’中国社会必然让位于一个新的‘近代’中国，一个按照西方形象塑造的中国”。

作者是对美国同行所作的批判，但读了这些文句，却使人感到美国史学界自我批评的勇气；正因能这样正视自己，不隐讳自身的短处，才有真正的活力。

其实，作者认为三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的“一整套假设”，也不尽然。上面说过，象容闳这样赤诚为报效祖国而奔走呼号的中国读书人，即坦诚地主张“以西方文明为基础”来建立“东方文明”的。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曾向张之洞建议，一方面要聘请外国人士在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担任顾问，另一方面还可挑选一些年青有为的学生在这些外人手下工作。容闳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使政府根据西方方式改造中国的行政机构，使它们根据西方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革”。

可见，这所谓西方模式，确实并非美国人的假设，而是19世纪一批中国知识阶层的真诚的追求。当然，历史的进程到底也证明这些都不过是美丽的幻想。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好几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这种说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新鲜和深刻。我们会说，我们不是老早就这么看的吗？但我想，一种认识，看起来似乎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了，认为人人都能理解的，但在某个特定时期，就会硬是不被承认，直至那一时期过去，人们迎来另一时代环境，回头一看，才明白原来早就应该如此。我们自己的经历，譬如“文革”时期的一些提法、做法，事后回想，不也正是如此吗？

时代决定意识。美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的这种趋向，反映了二战后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情况。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与作用日益明显。过去，西方总是以自己为核心来看待他种文化，把西方的经验看作是所有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普通道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在美国特别是越战后对社会心理所造成的震动，迫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自造的文化囚笼中走了出来，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在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使他们感到这一块世界确有他们所不及之处，于是，西方中心论就在烂熟了的西方文化体系中日趋瓦解。第三世界文化创造的被认识，这应该是本世纪后五十年世界文化新进展的一大标志。

实事求是地说，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本书的正面阐述中还不是很充分的，有些地方又稍嫌枝节、散漫。但是，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解决它所面对的历史时期的所有问题，正好象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来解决他所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一样。主要应看他怎样提出问题。容闳在19世纪腐朽没落的封建末世，提出向西方学习，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来造就新一代的读书人，这虽然是空想，却永远可以给人以启示。柯文在当前整个世界文化的转型期，提出不能以西方模式套用非西方民族的历史，要重视各民

族自身的传统，这看起来与容闳的想法正好相反，但也仍给人以有意义的思索。历史就是这样使人们在沉思中提高自己的。

细活与精品 ——从两本冷僻书谈起

目前见到中华书局所出的两本新书，一本名《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一本名《出三藏纪集》，苏晋仁、萧炼子点校。这两本都属于中华书局 80 年代以来所编的两套系列丛书，前者为《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后者为《中国佛教典籍选刊》。

按照现在时髦的炒热书标准来看，这两本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冷僻书。光是看书名，一般人恐怕也未必能全懂。但很奇怪，这两种书印数倒不算少，《帛书老子校注》印 5000 册，《出三藏纪集》印 4000 册，比起前些年一些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书，印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我一向认为，如果想真正读点书，如果想真正搞点学问，最好不要去追求什么热，这种热，看似热气腾腾，一会儿就灰飞烟灭。时下新编的大书多得是，什么“大全”、“集成”，什么“汇编”、“集览”，什么“世纪性丛书”、“全球性系列”，你仔细去翻查一下，不少就是东抄西捡得来的。正如顾炎武所说，当今人纂辑所谓新书，正像有些人铸钱那样，不是从原始铜矿中采来，而是贩买来旧钱，稍作改铸，既已粗恶，又将古人传世之宝割裂挫碎，不存于后，实在可惜。我看，顾炎武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出版界存在的散、滥现象来说，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刚才提到的两本冷僻书，就不是如此。为使读者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请允许我在这里稍作一些解释。

《老子》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典籍之一，但传世的《老子》一书，各种校注本虽然众多，但都属魏晋以后。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提供了西汉初期的两种抄本，这是我们目前所见最古老的两种《老子》本子了。这两种本子，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其中有不少衍文脱字、误字误句，而且出土时又因自然损坏，文字又有残缺。但是它毕竟是时代早，较多地保存了《老子》的原貌。通过校勘，可以证明，后世所传的《老子》各本，文字多有讹误，被后人改动之处甚多，往往因一字之讹，意义全非。据校注者介绍，如今本“无为而无不为”一句，世传各本不止出现一次，已成老子学说中的名言。但在帛书《老子》甲、乙本中，根本无此一句，而只有“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无不为”应当说并不出于《老子》，而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产物。于此一例，即可见出帛书《老子》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这一校注本，是以三国曹魏时王弼注本为主校本，另取敦煌本、道观碑本、历代刊本计 33 种为参校本。除校勘外，再作异文辨证、经义解释。我曾计算一下该书所用的参考书目，从唐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音义》起，到今人王重民《老子考》、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共有 160 种之多。这一简单的数字，就可见校注者所下工夫的繁重与艰辛了。

《出三藏纪集》是南北朝齐梁时僧佑的一部著作。这是一部奇书。其书共十五卷，记述了汉以来译经的佛典，译人姓名，翻译过程，译场规模，传播源流与内容大意，更有好几卷译人传记。要了解佛经早期的翻译史，这是一本必读书，后世有名的几部书，如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等，都无不取资于此，以踵事增华。但很奇怪，清朝修《四库全书》，却未单收此书。

现在这一校点本，收集和参阅各种佛经藏本及后世的有关著作，加以细心的校勘标点，非常便于今人阅读。读者只要读一下序言中摘出的传世好几种本子的断句错误，就可见出点校者的学识了。书后附经名、人名、地名、寺名、年号索引，就有 121 页之多，可见其认真细心之程度。点校者之一苏晋仁先生，现年已 80 多岁，一生从事于僧传的研究。我曾读过他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85 年第 1 期上的《佛教传记综述》一文，此文对传世与已佚的僧传，作了全面的考查，颇见工力。有了这样的学养，再加十许年的实实在在的操作，就不难想见此书所蕴含的宝藏了。

记得 1958、1959 年间，出版界对于“慢工出细活”，是狠加批判的。当时是着眼于多、快，认为细活有什么了不起，慢工更在批评之列。时下虽然没有对这句话有所议论，但实际上仍对此是看不上的。所幸的是，我们毕竟还有这样的细活，这样的细活确实是出于慢工。由这样的慢工制造出来的细活是真正堪称精品的。

我又想，这两本书，如果拿到图书评奖会上去，多半是评不上的，因为一是内容实在过专，过专未免冷僻，使人无心一顾；二是所谓校勘、注释、索引，不是当今造书、作学问的热点。但我敢说，这两本书比起一些广告效应的书来，是更能在时间上站得住脚的。学术书，不必看奖牌，而应看有一定学科领域内是否被人引用以及所占的学术位置。这才是真正学术著作的品位，也是它不可代替的骄傲。

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悦

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就学识而言，自从他于 1980 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以来，短短 10 年，他在学术上的进展是如此的惊人，无论是审视近 10 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回顾这一时期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这不是指他的作品的数量，比较起来，他的专著，他的单篇论文，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数量不能算是最多的，我是指这些论著的质量，特别是他的几本为数不多的专著，总是为学术界提供精品，无论从立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整个行文的风度上，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

就人品而言，最能体现他的精神风貌的，我以为是本书《后记》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同样的意思，也表现在他为《文史知识》1990 年第 10 期治学之道专栏所写的《路越走越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中的结束语：“我能说的唯一点经验，就是我在涉足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虽步履艰难而始终感受到无穷乐趣，这或者就是甘于寂寞的力量之所在。”话很短，但感情很重，只有充分了解他研究生毕业以后很长一段的坎坷经历，才会真切体味出这些话的分量。他自己说，自从上大学至今，35 年来，能够真正坐下来读书作文的，只是近 10 年来的事。我曾听他讲述过如何在赣南山区跋涉流落的行迹，听了使人心酸，但宗强兄讲起这些来，无论感情和语调，都是平和的。他分析古代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是很推崇道家思想的影响和贡献的，但他的为人，我总感到于儒家为近，特别是对友朋，温厚之至，而对自己，却似乎恪守君子固穷的古训，表现出类似于清峻的风格。

这使我想起近代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话。陈先生 1929 年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陈寅恪先生一生是以此自律的。俗谛的范围可以包括很广，他最鄙视的是以学问为利禄的工具。他总是把学术的分量看得很重。他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处于那样一种辗转流徙的境地，特地为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编》作序，盛赞杨先生“持短笔，照孤灯”，甘居寂寞不废著述的风概，并有为而发地说：“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这几句话，表现了一种学术上的自觉，一种对从事于民族文化研究的自信。在同一时期，他在寄杨树达先生的一首诗中，前一句说“蔽遮白日兵尘满”，是那年的战火纷飞的年代，后一句说“寂寞玄文酒盏深”，自甘于寂寞，在学问的研索中求得自慰。象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一种学术心态，是为“五四”以来我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也正因为此，近三四十年来虽有不少人经历种种坎坷曲折，只要他们能有机会做学问，他们总是如陶渊明所说的“量力守故辙”，为学术事业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前面说过，宗强兄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杜论略》，出版于 1980 年，写作当在此前几年。他自己对这部书不大满意，那是因为他站在今天的高度。这部书出版后我曾看过，后来我与霍松林先生共同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

还请人写书评刊入《年鉴》。但那时我正忙于其他工作，只是粗粗泛览，印象不深。最近因为要写本书《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重新阅读那本《李杜论略》，感到这本书出版后所得到的反应与它所达到的成就，是太不相称了。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一样，它的意义有时是不易为人所理解的。1980年或稍前一、二年，我们刚刚从“文革”所扫荡过的荒漠上起步，那时还只有少数一些学术著作出现，就象严冬刚过，在初春的寒风中冒霜先开的小花，寥落不受人们的注意。又因为人们厌恶前一时期假大空与伪饰的学风，乃一反其道，对实证的研究感到兴趣，于是一些偏重于材料考辨的著作格外受到重视和好评。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李杜论略》在当时的出版，现在看来，却以其准确的理论把握和细腻的审美体认，挺立于当时的古典文学界。书中对李白、杜甫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几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比较，从而也探讨了李、杜各自的创作特色。我曾查阅过在这前后的论著目录，并根据自己的回忆，当时还很少有对李、杜作这样深入的研究的。特别是书中提出：一种审美趣味之形成思潮，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理论主张。作家和评论家们在创作上普遍追求某种倾向时，也在理论上进行着同样的探讨。因此，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当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必须如此（见该书第103页）。这种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文艺思潮，也就是他在五、六年后写成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立论的基调：

“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它的艺术特质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某种重要的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时可能并不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有时甚至很少或竟至于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述，他的文学思想，仅仅在他的创作倾向里反映出来。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里，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大量的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因此，研究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了对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的研究，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

我之所以引这一大段话，一方面借以说明，《李杜论略》是人们怎样地还在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以及古代作家作品研究中摸索行进时，已经提出极可宝贵的一种新的思路，而可惜没有为许多人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宗强兄是怎样地从这一可贵的思想萌芽出发，坚韧不拔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步履艰难地）前进，终于对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有了成熟而明确的思考。

许多年来，不少学者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总是把材料局限于一些文论和批评著作，把古代文学思想史与古代文论研究混同起来。这样时间一长，就材料显得雷同，立论不免单一，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于研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批评史，是一个突破，它的意义不仅是扩展了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范围，而且是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树立一个高的标准，把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把创

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著作结合起来。这些年来其他学者也在作，而《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则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论述三百年来文学思想演进的轨迹，以实际的业绩说明这种研究思路具有规范的性质，这就极大地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但宗强兄不以此为满足，他又以此为起点，继续思考着如何深化研究思路，开拓研究格局。他从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在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出一种新的研究设想，即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这一次他是深入到文学思想发展原因中去寻讨，认为要真正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必须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而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又甚为复杂，有政局变化的原因，有社会思潮的原因，以及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学修养的相互作用。作为这一思考的成果，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一思路，当同时体现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我认为，这是他治学经历的又一新的阶段，也将是标志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又一新的进展。

士人心态的研究，实在是一个综合工程，它在许多方面已突破文学的范围，它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牵涉到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等。这差不多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海外有些研究者，也有以中国古代的士为研究对象写成专书的。但就我的见闻所及，这些书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图解式的研究框架，往往把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教养的士人，作简单的概括，归纳出几个统一的概念范畴，有时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比较起来，宗强兄的工作则“实”得多。他的目的很明确，研究士人心态，是为了更深一层地探讨文学思想演变的原因，研究文学创作所包含的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形成的社会因素与作家的心理因素，而他的立足点又在大量史料的搜辑与辨析上，对牵涉到形成士人普遍心态发展的具体事件，其前后因果和发展脉络，作细致的、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可以想见，这一工作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但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理论素质，还要求有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能够从政局、社会思潮的迅变和剧变中敏锐地把握士人心态的走向起伏，并从这些心态变化所引起的艺术情趣中去细腻地辨认其审美风尚的性质与价值。同时，还要求研究者不但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还要有细致地审核材料的严谨学风与功力。另外，不言而喻的，是要求有一种真正做学问的气质，如陈寅恪所说的，要有一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志尚。我觉得，宗强兄于此三者都是胜任的（他的《唐诗小史》艺术感受的新鲜与细微，简直可以作为美学著作来读）。我想这不是我亲其所好的阿私之言，这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就是明证。我的本职工作是出版，年来又因种种原因，事情杂乱，几乎达到杜甫所说“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的程度。但接到宗强兄所寄的这部书的复印稿，一天繁忙之余，于灯下翻开书稿，读了几页，心即平静下来，读着读着，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譬如书中讲到嵇康被杀的最根本的原因，作者不同意嵇康因与魏宗室连姻而与司马氏集团对立的旧说，认为嵇康执著于“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执著，就使自己在整个思想感情上与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起来，就使自己在思想感情上处于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又说“嵇康却是处处以己之执著高洁，显名教之伪饰。而伪饰，正是当时名教中人之一要害。”“嵇

康的执著的存在，对于伪饰的名教中人实在是一种太大的刺激。他之为司马氏所不容，乃是必然的事”。这种从当时当政者与嵇康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感情尖锐对立来分析嵇康被杀的悲剧结局，无疑是深刻得多的。又如论西晋名士心态，将其归纳为：“贪财，用心于和善于保护自己，纵欲，求名，怡情山水和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这与一些治美学史者好谈晋人风流，比之若神仙中人，何啻深浅之别。书中又并不将此归结于士人本身，而追溯到因政无准的而导致士无特操。又如东晋士人，过去史书上描绘的，大多是宁静、高雅、飘逸，一种洋溢着这样意趣的人生境界。而书中指出：“这种追求潇洒风流、高情远韵、寻找一个宁静精神天地的心态，千古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种高雅情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精神的美。但是，如果考虑到其时的半壁河山，考虑到中国士人的忧国忧民的固有传统的话，那么这种高雅情趣所反映的精神天地，便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自慰。”从偏安的局面，遂论及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以至他们的审美趣味，以及一代文艺思潮的形成，既合乎逻辑，又生动具体。

我认为，由这几个极少的例子，已足可看出士人心态的研究对于文学思想史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这是宗强兄经过几年的思考，继《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对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象《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样著作的出现，有象罗宗强同志学识修养与人品操守那样的学者在不断工作，作出成绩，是不是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呢？我谨借此表示这一虔诚的愿望。

1990年秋冬之际，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所作的序。

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

道衡先生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时，我正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分管文学编辑室的业务。在此之前，中华书局也出版过一些学术论文集，但著者都是七八十岁或已去世的老学者，如游国恩、余冠英、王季思，以及孙楷第等久负盛名的前辈耆宿。那时道衡先生只不过50开外，按照中华书局的惯例，似还轮不到编印个人学术论文集。文学编辑室诸同仁遂为此事与我商量，我们一致认为此例当破，遂毅然付印，结果反应极佳，赞誉中华书局不但为中古文学研究作了一件好事，也为像道衡先生那样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的学者稍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现在，我忝为中华书局总编，却接到道衡先生告知，说他应台湾文津出版社之请，拟将近年所作之文续编成集，并请我为文集作序。我很惭愧在我主笔政之际未能将道衡先生有关中古文学研究论文编成续集在中华出版，但也欣喜台湾的出版界同仁有学术眼光，能将大陆的高水平著作及时介绍给台湾学界，也预祝道衡先生的新著能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我于中古文学，虽有爱好，却无研究。50年代时曾在北京大学随先师浦江清先生治两宋文学，后又在中华书局于编务之暇辑成《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杨万里与范成大》两部研究资料汇编。因探索唐宋诗之异同乃对唐代文学发生兴趣，这是六七十年代之际事。又受到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通贯几代史事的治史方法的启发，乃又从唐代上溯魏晋，写了几篇考证文章，不久却又因种种原因，重理唐宋文史。可以说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是浅尝辄止的，但也因职业和兴趣的原因，对这一段的文学研究，一直颇为关注，也还因此，道衡先生的文章，在其发表之初，我即大多拜读，现在结集成书，又使我能有机会来思考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中古文学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确是较为冷寂的。过去也有些文章探究其原因，往往归结为这一阶段的文学自身比之唐宋明清来，无论内容与形式，有种种不足。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与实际总还隔了一层。我想研究人数的多少与研究成果的丰歉不一定成正比，而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高低也不一定即决定研究水平的高低。我有一个想法，魏晋南北朝文学，或通常所说的中古文学，较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其研究难度相对来说似乎较大，因而出成果也较不易。一个人研究某一唐代诗人、宋代词家，或者元明清的某一部戏曲、小说，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能有所成，但在相同时间内来研究中古时期的某一作家作品而要有所得，却难得多。人往往有避难就易的习性，如果能俯拾即得，为什么还要去跋涉长途呢？这样，中古文学就自然难以形成热门或热点，正像自然科学中有些领域和课题，虽然本身或许蕴含较大的价值，但由于研究难度高，不能短期见效，它就始终只能为少数人在实验室、在野外默默地进行着。

那么中古文学研究之难又在何处呢？这当然也不是短短几句话就能够说全的，而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难以一概。我觉得中古文学研究之难，主要不在于如后代那样需用全力搜寻大量的不经见的材料，而是要在较高的学识素养上来细心研索材料，又要兼具文学、史学、经学的根柢，把研究对象放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本世纪以来凡在这一领域作出较大成就者，如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唐长孺等，都莫不如

此。在当今，我认为曹道衡先生即是继这些前辈学者，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创获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我想我的学力实还不足以概括道衡先生的治学业绩，这里只就我所见及的谈几点他在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创新之功。一是他对整个北朝（包括十六国）文学的研究，从搜集零散的材料到董理成系统的脉络，使我们对北朝的辞赋、诗歌，以及整个学术文化，有一个清晰的、合乎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当时整个南北朝文学有整体的把握。二是他对不少作家作品以及某些文学事件的考证，可以作为科学的结论而为人们所引用。时代较早的，如关于《两都赋》、《二京赋》的写作年代和主旨，然后，从东汉末及建安，依次而下，如桓谭、曹丕曹植、陆机陆云、干宝、郭璞、鲍照、江淹、裴子野、王琰、何逊、王褒、邢劭、任昉等等，有关他们的生平、行迹、交游、著作，都有精细的考证。应该说，有关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考证文章，这些年来确也不少，但有些文章每使我想起王国维的两段话，一是《毛公鼎考释·序》：“自来释古器者，欲就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能，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又一是他为容庚《金文编》所作序中云：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形写之，犹此志也。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旨。

以我所见，一些考证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文章，所持证据尚不足，即强为立说，并自诩为创见。我想，我们搞考证的，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识者”，也“必附会穿凿以释之”。对比之下，道衡先生的考证，既精细，又通达。他的有些推论，应当说是充分有据的，如本书《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援引《隋书·经籍志》等书，推论王曼颖为王琰之子，又从证实王琰生活的年代，甚富新见，且极有论据，但他还是作为推论看待，仍不作为结论。

我感到，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有不少，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够成立的，符合于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需做的学术积累的工作。这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应当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开拓，能作为定论的点越多，就标志这一学术发展水平越高。我相信，如果有人对中古文学研究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则道衡先生论著中可以作为科学结论而列入学术成果积累的，当居首列。

其三，道衡先生治中古文学，还限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而还在于达识。他往往把某一作家或作品与社会历史、学术文化贯通联系，从而使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如本书论陶渊明，从其文风与为人考察晋宋之际有一江州文人集团的存在，他们与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的高门大族文人有明显的不同。又如论《雪赋》与《月赋》，能与作者身世遭遇及政治变故联系起来，分析二者风格的差异。著者对经学素有根柢，正因如此，书中对《大狗赋》作者贾岱宗的时代，才能纠前代典籍之失，并进一步讨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由此还解决了南北学术交流的一个大问题。我由此想到，中古文学研究之相对冷寂，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这段文学研究所要

求的知识水准高，这才不至于滥。我们可以在报刊上看到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的不少陈词滥调，因为这类文章容易做，而相比之下，这样的文章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就少得多。中古文学研究能保持学术领域中的严肃性，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这是与在这一领域中有像道衡先生那样具有高标格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关系。

当今在大陆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学识、人品为我钦仰者，有道衡先生和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他们治学的侧重各有所不同，但兼具专精与宏通，则为学界所认同。我所庆幸的，是我于数年前曾为罗先生的《玄学与魏晋文人心态》一书作过序，今又能为道衡先生的第二本论文专集写序。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都迥然出于我之上，我谨当追随他们之后，继续就力之所能，为学术界尽一点微力。这也就是我之所以不避僭越而敢于写这篇序文的私意所在。

1993年5月

注：该文是为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所作的序。

一种开拓的胸怀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26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著作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80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1989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答辩委员。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能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又能兼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当时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他们四位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得很多，更不能充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评论。这次我又受邀为本书写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殊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些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文章与专著。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出色的论著不多，这样，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从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来看章灿同志的这部《魏晋南北朝赋史》，就更易见出这部书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值得珍视的某些东西。章灿同志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

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全书曾有一个概括的说明，说这部书“试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宏观把握，鸟瞰二至七世纪赋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历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对赋体发展的影响；追寻赋体在拓宽自己的题材领域、表现空间和丰富提高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前进足迹；同时探讨赋与同时代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考察人们对赋的观念评论的变迁，并希望透过这一段赋史，观察作为其背景的中古文学和文化现象。”根据全书的论述，也可知作者想作两方面的考察。一种是历史的考察：纵向的是上溯赋体的起源，它怎样从民间走向上层，怎样从两汉步入魏晋，而在魏晋南北朝又怎样按其自身的演进而划分成几个阶段；横向的则是社会生活、时代思潮给予赋的影响，赋怎样在与其他文学样式交叉影响下前进，而摆脱过去作家作品论的单一模式。另一种是把赋真正作为文学而加以美学的考察，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文体作文献上的考述。因而作者把文笔深入到赋家的内心，探寻他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感情世界，赋体文学在形象地把握宇宙万物中与其他文学样式相较，怎样显示其优越性和不足。这种对赋体文学所作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使得这部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层次，也会使人感到辞赋的研究确有值得探讨、值得付出精力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如果说贡献的话，那末这部书的贡献倒不一定在研讨魏晋南北朝赋本身（虽然其中不乏精采的论述），而是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吸引，使他们觉得千百年前古老体式的辞赋，也是与他们的感情相近的，辞赋的世界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沙漠，而是他们可以亲近的，可以得到多种愉悦的人间。

本书的研究，还有两点使人感兴趣。一种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作者搜寻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作不仅仅是使读者醒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我们研究的是文学作品，我们作的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也必然要求一种科学的精密与准确。审美研究与科学上的精密与准确的要求，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应当是彼此促进的。周勋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特别提到程千帆先生在长期研究实践中形成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他以千帆先生的《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等学术论文为例，说明作者怎样运用近代物理学有关光谱分析的知识、有关光的反射原理，来阐释韩愈诗的艺术特色与创新手法（见《古诗考索·读后记——兼述作者学诗经历》）。这是一方面把考据向现代化推进，一方面把艺术鉴赏与科学分析结合，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精密度与精确度。勋初先生本人治学也兼具这种风格。我还感到，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近十年来养成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学风，就我个人的体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在文学的审美研究中加强现代科学思维训练的学术品格。章灿同志在书中所作的这种计量史学的尝试，固然得力于过去他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世界史专业，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他在做硕士、博士研究生期间受益于程、周两位先生所倡导而形成的这一学术氛围。

书中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论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如对于潘岳，作者就认为，潘岳虽然没有直接的赋论赋评方面的著述，但通过分析他在赋作中的艺术追求，我们仍可了解和把握他的赋论

观点。类似这样的分析，还可在其他有关章节中见到。我觉得，这样做，不仅仅扩大了我们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题材范围，而且更切近文学思想的实际，更容易直接把握赋在观念上的发展和演进。我个人以为，文学思想研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当首推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本书明确地认为：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结合文学创作来研究作家的文学思想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充分运用这一方法来论述几个大的历史段落，这是罗宗强先生对近十年来文学思想史研究所作的贡献。现在章灿同志运用这一方法来研究赋体文学，虽然还只是一种尝试，却使人立即产生一种新鲜感。我相信，辞赋研究将创作与批评结合起来，定会使得研究更为丰满，更有理论深度。

关于这本书，要说的还有很多，有许多吸引人的叙述和论点，如论赋起源于楚地民间文化，如何一步步走向文人化、宫廷化，对此应如何作出历史的评析；蔡邕对建安赋家有明显影响，但又不能以貌似相近而等量齐观；论建安赋的观念更新与批评自觉，并以自然、社会、人三大类的内容来描述建安赋所表现的斑斓的情感世界；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与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以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以审美沉思和理性批判见长的赋家；论东晋山水赋怎样以文体特长领先于同时代的山水诗；论不同时期赋的比较不能简单以价值批评为标准，应考虑不同的文化环境，等等，都有不少精采处，这篇短序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当会有更多的发现。

我觉得，近年来我们的辞赋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展，马积高先生的《赋史》，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体现了年长一辈学者治学的传统特点和长处。我们的辞赋研究还应从材料辨析和整理着手，我曾邀约马积高先生撰写一部史料学的著作《历代辞赋》，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对辞赋作一种容易使人亲近的研究，这种亲近的研究，也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历史的、美学的考察。辞赋研究同诗歌研究、戏曲小说研究一样，都有引人入胜之境，《魏晋南北朝赋史》已提供了我们这样的例证。我相信，继本书之后，当有更多的辞赋研究的佳作络绎问世，辞赋研究的繁荣也将指日可待，这也必然促进我们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最后十年走向昌盛，走向成熟。

1991年6月

注：该文是为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所作的序。

舍易就难 舍热就冷

吴汝煜同志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所作的序言中说过的几句话。我在那篇序的最后一段写道，尽管这部传记资料索引，收了八十多种书，书的范围包括正史、唐代的两部诗文总集以及唐人选唐诗、各种题名录、年表、书目、书画谱、五代十国别史、宋元方志、僧传与释氏书目录等，但如果要全面查阅唐五代人物的事迹，这部索引收录的范围就要大大扩大。在举例中我提到“《全唐诗》中诗篇提到的人名，也都应考虑辑入”。我说，如果把这些材料都加汇聚，并予以合理的安排，那末，我们就将有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汝煜同志一再说，他之编纂这部《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是受到我上述这一构想的启发。这当然是他的谦词。因为我当初虽然说了这些，但脑子里其实是很朦胧的，而且我以为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现在这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索引编出来了，它为我们展示了唐五代人物通过诗作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以及各种社会联系的具体而生动的图景，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已经不限于查找人物交往，也不限于订正某些史实错误，它使我们从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观察到那个社会，使我们对唐代诗歌据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进一步切实的了解。汝煜同志和其他几位参预本书编纂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实践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原来的很不具体的设想。我相信，正如我在上述的那篇序言中所说的，他们的工作“必将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和感激”。

我之所以说未必有人愿意来做这样的事，不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近些年来，这种编制索引的工作可以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夹挤。所谓内，是当前学术界中一些相当流行的看法，即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搞资料工作，看不起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研究，他们认为史学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危机也就在这里。既然如此，则比起资料整理、史事考证来技术性更加突出的索引编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谓外，是出版界中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出版界要改变过去单一的产品经济模式，参加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去，因而重视经营中的经济效益，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各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出版社迫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肯定会减去不少市场销售不甚理想的书稿，而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性较强的索引书稿必然会在首先“整肃”之列。

这种情况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也是很多人感到不满意的。但这是现实，而且可能短时期内不大会改变。那么出路何在呢？

我认为出路还在于我们自身。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文化积累的工作。我们虽然没有必要拿2000多年前太史公那句“藏之名山”的嘉言来作为立身的守则，但确实要有对自己工作的一种信心。在这里，我认为对资料工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对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过于强调对揭示历史规律的要求，殊不知在学术研究中要发现或揭示规律，需要有多少的积累，要进行多少具体的研究。在未取得许多的具体成果之前，所谓揭示规律，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解决不了实际存在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在过去那种空阔的要求下，具体历史过程的叙述和研究被忽略了。我感到，我们现在，对文学史上的好些情况，一般的谈谈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求你把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某些必要的细节，清清楚楚地、有根有据地说出来，有时是会作腊的。研究历史，一个必不可缺

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这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遗憾的是，对此我们过去是相当漠视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出不少原因，不过我想，从研究本身来说，弄清事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容易在短期内见成效，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的事实已经消失了，它只有靠文献记载下来，而各种记载可能彼此歧异，又可能有缺漏，有些更可能会有掩饰、伪造，这就需要广搜博讨、爬梳抉剔，把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具体地理清楚，这实在是一件艰苦细致、穷年累月的差使。在当前讲究“短期效应”的趋势中，更不容易做到。但就学术工作的整体来说，这又是非做不可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比起轰轰烈烈的什么“热”来，它确是比较冷。但“热”又怎么样呢？清朝的阮元在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当时的一种学术风气，叫做“朝立一说，暮成宗主”。这确乎很热了，但结果又是怎样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那就是舍易就难，舍热就冷。看到汝煜同志在本书《前言》中所写的工作中种种困难及如何克服困难等情况，我很有同感，也受到鼓舞，我觉得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在踏踏实实地前进的很好的例子，也是古典文学界必然会取得更大成果的迹象。

对于出路的第二个想法，是在竞争中力求高质量。可以预计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出版竞争会是相当激烈的。学术工作不得不参加到这个竞争的机制中去。出版界的一个叫得很响的口号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是一个“理想王国”，实际上恐怕是很难达到的，而且所谓统一，标准又是什么呢？也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可以测量的标志。根据目前我们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条件，学术著作的出版要达到这个统一，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叫做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也要出，这就要量力而行了。因为所谓经济效益差，就是赔钱，不过我们发明的术语多，能说得高雅一些。出版社不能老赔钱，这就要选择了。这里就会有种种门道。当然，不能保证在这之中不会出现歪门邪道，但从总体来说，质量高的总归会占上风。可以说，以学术著作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是彼此间的质量竞争，优胜劣败也将会起支配作用。对于这种竞争的形势，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要随时调整本身的结构来适应这一客观现实，力求使自己的成果通过竞争得以社会化。

以上两点，是我从本书的编纂所想到的。由本书所取得的成就，我更觉得这两点想法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使我惊异的，是编纂者竟如此广泛地吸收以往的和当今的学术成果，并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和解决了那么多的具体问题。这使我进一步坚信，索引和资料工作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编制索引和整理资料，是学术事业中的服务性行业，它有着强烈的利他的性质。但是它要服务得好，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本身即是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研究者。这使我想起 30 年代至 40 年代在我国古籍索引事业上作出很大贡献的燕京哈佛学社引得编纂处。这个引得编纂处，在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竟编纂、出版了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引得 64 种共 81 册，其中不少种在运用科学方法编制古籍索引方面具有开创性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主持者洪业先生所写的长达数万言的《礼记引得序》，后来得到法国铭文学院的赞赏和推许，获得了 1937 年度巴黎赠予的茹连安奖金。他的另一篇《春秋经传引得序》竟近 10 万字，简直是一部《春秋》经传沿革发展的学术史专著了。引得编纂处就是因为他们的严格追求学术性而站住脚

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据王钟翰先生所写的回忆文章《洪煨连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4月版），当时在引得编纂处工作的，除主任洪业先生外，只不过编辑三人，经理一人，抄录员五人，后来增设校印所，即把印刷机械也包括进去，总共也不过15人。但他们竟出了这么多高质量的工具书，平均每年出版二三种三四册。王钟翰先生的文章曾总结引得编纂处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为6个字：有钱、有人、有责。也就是有一笔固定的经费，专款专用；善于吸收和识拔有专长、有事业心的人材，像聂崇岐、翁独健、周一良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引得编纂处工作过，从中受到良好的培育；各司其识，责任明确，权力下放，发挥主动性。这样的经验是很吸引人的，我们现在有些做得到，有些还做不到。即以第一项而论，汝煜同志他们就不免略逊，以致他们要印研究成果《交游考》，还得另外申请经费，争取在《徐州师院学报》另辟增刊来加以解决（附带说一句，《交游考》最好与《索引》合在一起印，成为一部书，以便对使用者对照阅读，正好象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同编为一书那样）。

汝煜同志与我分处南北，我还未能通阅索引的全稿，但他与可先同志合写的《全唐诗人名考》（《徐州师范学报》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我是细心阅读了的。除少数略可商榷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有助于对唐代诗人事迹的考证。我相信，谁要阅读《全唐诗》，谁要查考唐五代人的生平事迹，进而言之，谁要了解唐五代人通过诗作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是不能绕过这部索引和这部考证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如果有10部、20部这样的著作，那么我们整个研究的水平就会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勤恳的耕耘者。我相信，读者今后在查阅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首诗篇的时候，是会想到编纂者的辛勤的。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吗？

1988年夏

注：该文是为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所作的序。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1988年夏，吴汝煜同志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脱稿，并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际，我曾应他之约，为这百余万字的书稿写了篇序言。在那篇序言中，我曾对当时刚开始不久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老实说，那时我对出版难的问题虽有所感觉，但感觉并不严重，而且对克服困难的信心还是很强的，因此提出作为我们研究者自身如何提高著作质量，以求在竞争中取胜。我想，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事的这项事业的，而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却远不是致富入仕的门径。陶渊明早就说过，“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似乎注定是一条清贫的道路。但他老人家也一再地说：“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我想，这是包括汝煜同志在内的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素愿。正因如此，当索引稿完成之后，汝煜同志又约胡可先同志，利用索引的成果，又开始一项更为艰苦也更为深入的工程，这就是这部《全唐诗人名考》。但与此同时，出版难的问题也更进一步发展了。时到如今，已不是我1988年所写的在质量上提高、于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说，似乎能否达到出版，或能否有较多的印数，是与质量无关的，而且有时越是质量高的书稿却越不易于出版。两千多年前的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想不到在今天倒真的印证了。现在，汝煜同志身患重病，我见到江苏教育出版社排印出来的这部《人名考》的校样，真不禁感慨系之。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是要负担经济亏损的，我们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有因著者病重才开始安排出版这样使人联想很多的情况出现。说到底，我们对我们的出版事业以及整个学术文化事业仍抱乐观的态度，我坚信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肯定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伟大的古代文化精华注入于有生命力的现代文化之中，开出璀璨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的困难终究是暂时的，我们，包括学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仍要努力工作，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前景作出我们自己的那怕微末一点点的贡献。

在唐代人物考证中，清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徐松的《登科记考》，赵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劳格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与《读书杂识》，沈炳震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等等，是综合性的考索，另有几部著名的别集注本，也都分别考查出不少诗文中提到的人名。但在这方面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并奠定人物考证基础的，是近现代两位大学者，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与岑仲勉先生。陈先生有几篇很精的考证著作，但总的说来，他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摄全局见长的，有些史学史著作把他归之于史料学派，并不确切。关于这点，我曾有《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刊《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12月）。岑仲勉先生则可以说倾其主要精力用于唐代人物与史事的考证，在这方面，他创获最多，现今可资利用者也最多。他们两位都是史学家，很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在1949年以后，却并未继续他们的工作。无论是研究历史或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在1949年至“文革”前的一段长时期中，所着重研讨的差不多都是大问题，而视资料的搜寻考订为琐屑短钉。1978年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呈全面繁荣局面，有几部理论研究的专著问世，为人瞩目，同时又有更多的考证专书与论文，而这些考证之作，往往涉足文与史两

个领域，并不纯粹是文学研究，但从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几乎没有专业的史学研究者，这倒是近十年来唐代研究中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门学问，越是发展，就越是要综合，要及时概括已有的成果，以便使这些成果有效地传达给同行，使他们从已有的基点出发更向前沿伸，而不要在原来的水平上重复已知的结论。正因为此，我在1982年西安的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的会议上，建议编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集合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逐年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这一建议为学会所接受，而《年鉴》遂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与我负责，从1982年按年出版，现在已出到1987年。现在，汝煜同志与可先同志的这部《人名考》，其中一部分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自清代迄今的有关唐代文史方面的学术论著逐一翻检，广泛搜集已有的唐诗人名考订的成果。书前所列的《编号表》，就是他们所搜得的以往成果的目录。可以看出，其中除少数为清人及陈、岑两位前辈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最近十年来的新著，而这些新著，大多数又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基础的深厚，也钦佩吴、胡两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细心地把发表于各地报刊上的论文收集起来，研究它们的论点，肯定它们的成果，吸收到考订中去，并一一加以注明。这种求实的、充分尊重别人劳动的学风是我们学术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我们多么需要这种造福于他人的踏踏实实的工作。

本书在积累已有成果的同时，还上溯唐宋时的众多史籍，独立进行研索。据《前言》统计，书中共搜辑他人成果约3440余人次，自己考出的人名约3860余人次，合起来总数约7300余人次。这些考订，部分曾发表于《徐州师院学报》，我已陆续拜读过，得益不少，有些问题也与作者讨论过。这次又读了排印出来的部分校样，更感到这确是一部切实有用、使大家都会受益的好书，也感到作者在治学态度上给人以不少启发之处。

书中不仅对众多的以行第、别称、官职、谥号相称的人物考出其本名，而且也连带地指出《全唐诗》的错讹。如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考出侍御为侍郎之误；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首》，考明节义为节愍之误。凡有确凿根据的，作者并不依违两可，而是明确断定是非。如沈佺期《李员外秦援宅观妓》，考订中引用《旧唐书·中宗纪》，《通鉴考异》引《纪闻》，《通鉴》胡注引《旧唐书》，指出当时任补阙、考动员外郎者有李秦授，而无李秦援；又引劳格《郎官考》所引《沈云卿集》之同一诗题，亦作李秦授，又引《太平广记》等的记载，并参以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然后作出“是李秦援为李秦授之误无疑”的明确的结论。另外有些地方，虽有旁证，却未能达到确证程度者，作者并不遽下断语，而是仅指出可疑之点，示人以继续研讨的余地。如张说《赠工部尚书冯公挽歌三首》，疑此冯公为冯元常，据新旧《唐书》的《冯元常传》所载事迹与诗中所述相对勘，谓均相合，但作者以为“唯其赠官工部尚书，史不载，俟考”。又如沈佺期《李舍人山园送庞邵》，疑此李舍人为李峤，据《旧唐书》本传，峤曾由润州司马诏入，转凤阁舍人，又引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李峤于神通三年闰10月以凤阁舍人知天侍，则李峤曾任凤阁舍人是肯定的。但沈诗中仅称李舍人，当时李姓任舍人之职者是否仅李峤一人，而舍人之职称除凤阁外还有其他，故诗中之李舍人是否即为李峤、尚未可必，作者仍以“疑为”表明自己的意向。我觉得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之风颇盛，这对于整个研究来说是有益的，但有些考证之作，所持的证据尚

不足，就以全称判断肯定是非，强为立说，誉为创见，这使我想起王国维为容庚《金文编》所作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侁、薛尚功之书出，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绝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旨。王国维认为阙义之说，“盖为一切学问言”，这话是有道理的。搞考证，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释者”，也“必附会穿凿以释之”。我想，我们搞考证的人要尽力克服或避免这种毛病。

我还是想到了陶渊明的另一首诗：“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覩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答庞参军》）。我与吴汝煜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84年冬在厦门，那时中华书局为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邀约部分专家学者，在厦门大学开会商议。我们时常面对远方的水天一色，畅叙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爱好和志趣。但他在徐州，我在北京，除了几次参加学术会议，很少见面，比起陶诗所说的“栋宇惟邻”来，相差实远。但书信是不断的，他给我的信总是那么谦逊、周详。现在他积劳成疾，以后要编写这样的著作恐怕是很困难的了，什么时候我又能为汝煜同志的新著作我所能作的一篇小序呢？默诵“我求良友，实覩怀人”，我实已难以为言。

1990年1月27日，庚午年初旦

注：该文是为呈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所作的序。

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

我曾为吴汝煜、胡可先同志《全唐诗人名考》作序，现在，我又为陶敏同志的这部《全唐诗人名考证》作序。为这两部性质相近而各有特色的著作的出版，能尽我的一点微力，表达我对著者的钦佩之情和谢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

吴、胡两位的《全唐诗人名考》约60余万字，陶敏同志的《全唐诗人名考证》80余万字。它们都是有益于学林的好书，不过比较而言，前者以相当的篇幅总括已有的成果，而以平实见长，后者则颇着眼于力破陈说，以独创新见引人注目。我曾在好几处说过，在近代治唐史学者中，倾其主要精力用于人物与史事考证的，创获最多，可资利用的成果也最丰硕的，要算岑仲勉先生。我觉得，在目前，真正按照岑先生的治学格局走而心不旁骛的，于中青年学者中，一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再一位就是本书著者陶敏。陈尚君同志曾以《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二十四辑）一文，使人们叹服其资料掌握的广博和论析的精细，他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登科记考补正》一系列唐代史料的辑补工作，使人们感到他的工夫的厚实。而陶敏同志，则真正是沈潜于史料的大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限于一家一集，既广泛占有资料，又穷究史源，而其笔力所向，则集中于攻人物考证，看来范围稍窄，却所获极精，也正因为拿出来的是精品，因而使人感到内涵的深广。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一：《全唐诗》卷七二三收有李洞《上灵州令狐相公》七绝一首：“征蛮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笑倚凌烟金柱看，形容憔悴老于真。”本书认为唐末无以姓令狐为宰相而领灵州者，首句“征蛮破虏”云云，亦与灵州不合。此诗《文苑英华》卷二六二题作《赠高仆射自安西赴阙》，云安西，亦与“征蛮”不合，且安西自贞元三年陷蕃后唐朝廷即未曾除授官吏。经考证，此处安西当作安南，而高仆射即为高骈。据《新唐书》本传，高骈于咸通中为安南都护，大破南诏兵，“拔安南，斩蛮帅段酋迁，降附诸洞二万计”，乃以安南都护府为静海军，授骈为节度使，后又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洞这首诗，即于高骈为检校尚书右仆射自安南还朝时所作。这样，就不仅考证出人名，而且纠正了《全唐诗》和《文苑英华》的文字之误。

例二：《全唐诗》卷一二七载王维《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陈左相宅所施之作》。此诗自清人赵殿成注，至现代学者如陈铁民、张清华同志所作年谱，杨军同志所作诗文系年，都定于天宝时所作，即以陈希烈时任左相。但他们都未注意到诗的首二句“已相殷王国，空余尚父溪”的用典。诗盖谓陈希烈于天宝中为左相兼兵部尚书，深受唐玄宗的信任，而安史之乱兵陷京洛，陈希烈竟相安禄山，犹太公望被周武王尊为“尚父”而竟相周之敌国殷；今陈希烈乱平后被杀，唯余旧溪，受人凭吊。诗题中之宋中丞即宋若思，也是在安史乱起后任为御史中丞，至德二载（757）尚在位。此诗当作于肃宗时，绝不可能作于天宝中。如此，则不仅考姓名，而且订作年，于旧说也多所匡正。

与此类似的，又如例三：《全唐诗》卷二 一岑参《崔仓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此处石为右之讹，前人的意见一致，但右相为谁，却众说不一。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谓“右相即中书令，崔圆曾为之，罢相

后出镇淮南，寅盖充圆之判官”。李嘉言《岑参系年》则以为是元载，陈铁民等《岑参集校注》谓指刘晏，他们都认为诗即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这些说法表面看起来似都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却偏偏忽略了殷寅生平的资料。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殷寅天宝四载（745）进士登第。又颜真卿《殷践猷碣》（《全唐文》卷三四四）载：“三子：摄、寅、克齐等”。又谓寅曾任永宁尉，后因事贬为澄城丞。这篇墓碣又说寅“久疾将歿，顾瞻太夫人，欲诀不忍”。则殷寅死于其母之前，而其母乃卒于乾元元年（758）。又据《旧唐书·杨国忠传》：“会（李）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凡领四十余使。”李林甫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卒，时岑参正在长安，诗题之右相盖指杨国忠。殷寅既卒于乾元元年前，则诗作于广德元年即不可能，右相指崔园、元载、刘晏等说也无从着落。

对陶敏同志来说，他的工夫不仅仅在对资料的广泛搜辑，还在于他对这些资料的精思。如《全唐诗》卷四九二载殷尧藩《送白舍人渡江》，一般都以此诗为殷与白居易交往之证，但引用者却未注意到诗中“铁锁已沉王浚筏，投鞭难阻谢玄兵”一联。此处反用历史故实，用来描述南北对峙，南方对北方作战获得大胜，中唐时期何来此种情势？陶敏同志于此产生疑问，乃进而搜寻资料，终于在明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卷中发现此诗，而“白舍人”三字则为作伪者所加，诗之末句“回首钟声隔凤城”之“钟声”，史谨原诗作钟山，改作之迹更为明显。《唐音丁签》所说宋本殷集实为明人伪造，陶敏同志由此更考得《全唐诗》中殷之《春游》即为元人虞集《城东观杏花》，《帝京二首》等三诗为明吴伯宗诗，《暮春述怀》等十六首为明史谨诗。他又有《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是近年来唐诗学界考辨唐集的力作之一。

陶敏同志并不专注于某一家的考证，正由于他能博采众书，融会贯通，遂能收左右逢源之功。如他对孟浩然诗中张明府、张郎中，储光羲诗中张侍御的考证，即十分精采。孟浩然有《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等诗，储光羲亦有《同侍张侍御宴北楼》诗。由于孟浩然与张子容有交往，有诗相赠答，因此有些研究者以为孟浩然诗中的张明府、张郎中即指张子容。本书据两《唐书》的有关纪传，《全石补正》卷五四之《张点墓志》，《唐会要》《两浙金石志》卷二《唐徐峤张愿诗刻》，《唐文拾遗》卷二六之崔归美《张曛墓志铭》，考证出孟浩然这些诗中之张明府、张郎中及张侍御（应作郎），都为张愿。陶敏并不专门研究孟浩然，但张愿的考出却大大有助于对孟浩然交游的了解。

这部人名考，在不少地方对唐诗文字的校勘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以前我校点《河岳英灵集》，卷下王昌龄诗，宋刊本有题为《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而四部从刊影明本，此诗诗题中“太”作“大”。“陶太公”未始不可通，且又是二卷本的宋刊，较三卷本的明刻当更接近于殷的原编，因此对太、大二字如何扶择颇为犹豫。后来见到陶敏同志的这部文稿，我特别翻阅了王昌龄此诗的考证，方始冰释。陶敏同志认为此处应作大，大为陶翰的行第。陶翰开元十八年进士第。又据《宝刻丛编》卷十华州：“唐华岳真君碑”，唐华阴丞陶翰撰，韦胜书。玄宗开元十九年，加五岳神号曰真君，初建祠宇，立此碑。”又据陶翰《饯崔朔司功入计序》及《新唐书·玄宗纪》，知开元二十年冬陶翰即在华州。而王昌龄诗云：“子为黄绶羈，予忝蓬山顾”，“昨日辞石门，五年变秋露”。王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登第，后为秘书省校

书郎，故云蓬山，而黄绶即指时任华阴丞的陶翰，其时也正好在开元二十年。这样，我在校记中即确定太应作大，并特地注明此用陶敏同志的成果。

限于篇幅，我只能举这几个例子，而且很可能这几个例子还不足以充分代表本书的工力。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书中对于《全唐诗》的考证是多方面的。有考定姓名的，有订正姓名讹误和地名讹误的，有考定作诗年月的，有纠正《全唐诗》误注的，有改正前代记述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以后，还没有一部书象本书那样，以人名考证为中心，对《全唐诗》作如此广泛而又如此专注的核查，而它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比之于《读全唐诗札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或许以为本书的作者定是一位埋首于唐诗数十年，大半生与古籍打交道的老先生，殊不知陶敏真正钻研唐诗，还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在此之前他却有一段极不寻常的崎岖坎坷的经历。

他于1938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的家庭，自小即喜爱唐诗宋词以及《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1955年秋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当时他听了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讲解，刘隲先生的文字学、音韵学，黄焯先生的诗经研究，刘永济先生的楚辞研究，席鲁思先生的荀子研究、史记研究。这些虽非系统而却以精博见长的讲授开启了来自潇湘之滨的青年的求知心，使他面对古老丰厚的文化油然而生一窥宝藏的壮志。但这棵早春的幼苗却遇上一场意想不到的风雪，终于受到摧抑而得不到正常的发育。1958年的反右补课，把陶敏稀里糊涂地补了进去，此后20多年岁月他就与古典文学绝缘。1959年9月毕业后分配在辽宁师范学院，坐了半个月的冷板凳就下放到农场劳动，喂了一年多猪，养了几个月鸭子，1961年4月，学校与吉林四平联合收割机厂协商，居然将他去换了农业机械。此后，陶敏就在四平这家工厂呆了1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陶敏又被以新罪名而受到揪斗，于是又重新劳动，后又至农村插队三年。1972年调回四平收割机厂，先后当过教员、车间成本、材料员。这样，直至1978年甄别改正时，曾去武汉大学调查，却未在学校及他个人档案中发现他当年之所以划为右派的任何证明材料，而整整20年的大好时光就如此地过去了。不过自此他也就调回湘潭师专（后改名湘潭师院）工作，总算拨云露而见青天了。

在近十年中，陶敏同志专注于唐代诗人的考证，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约三十余万字。又与郁贤皓兄合作整理《元和姓纂》，全书200万字，已在中华书局出版。他又有一部《刘禹锡编年笺注》稿60万字，待印。这些都为这部人名考作了准备，打了基础。

人们不难想见，以陶敏同志上面所说这样的经历，在唐诗考证中作出如此的成绩，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要付出多少的辛劳。陶敏曾对我说他走的不过仍是中国传统的路子，不过由于他搞的窄，所以有可能搞得细一些。他说的很朴素，但却很有道理，很有见地。有些搞大学问的，固然可以把摊子铺得很开，但我还是相信庄子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面对学术的海洋，我们一般的人，还是就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一定的范围内搞得精一些、深一些为好。过去的十年，古典文学研究也确实五花八门，陶敏同志并不去赶热闹，老老实实地读书，一个人名一个人名地考过去，而终于写成八十余万字的实实在在的著作。我始终认为，搞资料的搜辑和考证，是一种造福于他人的、使大家受益的工作。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

使人乐其易。”（《十七史商榷》自序）我们搞唐代文史的人，不是到现在还感受到岑仲勉先生几部考证之作的好处吗？我深信，陶敏同志这部著作的出版，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许多我们可称引的具体成果，还将有助于唐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形成的踏实学风的进一步发扬。

1991年春

注：该文是为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所作的序。

《唐才子传》研究的新成果

我与映逵同志，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是同行，就对《唐才子传》一书的整理来说，又曾是合作者，——由我承乏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映逵同志除了撰写岑参传的笺证外，还承担了全书的校勘工作，正如我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由于映逵同志的细心校阅，使得这部书在文字方面有一个扎实的依据。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四册《唐才子传校笺》，是集国内有关专家之力协作完成的，因为要对书中将近四百位诗家传记作笺证，无异是对绝大多数知名的唐五代文学作家考索其生平事迹，提供其基本线索。这是一项大工程，根据我们现有的学术状况，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在短期内完成是不可能的。我的本意，是想通过笺证，总结和体现我国唐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关于诗人传记研究的成果，显示唐代文学研究在一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而这种水平是应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这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希望今后唐代文学研究更有一个材料上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映逵同志又独立进行了对《唐才子传》的校勘、注释、补录和辑评，在全稿完成、交付出版之际，他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前面说过，作为同行和合作者，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但面对映逵同志以过人的毅力和辛劳、本该由群体来作而却由他一人毕功的这部著作，我觉得他人的任何序言都是多余的了，他为这部唐代文学著名文献所作出的业绩已经足够说明，撰著者在学术领域中是怎样的一位勤奋的追求者。不过我还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繁杂，又由于我即将去国外进行一段时间的学术访问，限于时间，我不能通读全稿。就我所读过的，我觉得映逵同志所作的工作是切实的，对于一般愿意深入了解唐五代诗人及其作品艺术风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十分有用。校勘细致而不繁琐；注释、补录简明确切，对前人记述的疏误所作的纠谬补缺，时有胜义；辑评部分着重搜采后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似更切合原书的特点。这使我想起1984年12月，我与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志在一起，因为着手编纂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商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同意，邀请有关的研究者在厦门开会。会议期间，我与徐州师范学院吴汝煜同志谈起为《唐才子传》作笺证事，我说笺证可以分头写，而校勘只能一个人作，我自己来作不免费时费事，不易见效，颇以简选合适的人选为难。当时汝煜同志就向我介绍了映逵同志。吴汝煜同志我是先读了他的文章，然后才认识的。我们在厦门是头一次见面，一见之下，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恂达君子，文如其人。由于他的推荐介绍，我也就信赖了映逵同志。后又听说孙望先生是映逵同志的研究生导师，而孙先生则是我素所敬重的学术前辈。每一次我因事路过南京，去看望他，都有如坐春风之感。前些年孙先生结集他的旧作，题为《蜗叟杂稿》出版，书前题记的结束语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本集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就我所知，都已有学者专家继续作出了深入的卓有成果的研究，如段熙仲先生著《古镜记的作者及其他》，王运熙先生著《元结篋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傅璇琮先生著《韦应物系年考证》和卞孝萱先生著《元稹年谱》等便是。这些学术著作，其中很多论点与考证足以订正拙文存在的缺失与错误，览者倘分别阅读各位专家的论著，自能发现，恕我不再在此一一加以说明了。”在自己的著作集中一一指出别人论著的长处，加以赞誉，并请读者与己之所作

加以比较，这种学术上的坦诚与谦虚，真如光风霁月，何等感人！我深深觉得，老一辈学者传给我们的，不止是术业，更重要的是学风。后来在接触了映逵同志之后，我也确实感到，他无论为人和做学问，也真象孙先生，朴质、敦厚，脚踏实地地耕耘着自己的那一块土地，而终于有所收成。

我后来就把《唐才子传》全书的校勘托付给他。他很快写了校勘凡例给我，掌握情况非常全面，版本源流讲得清清楚楚。但后来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快，其间我又把中国科学院所藏的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内阁文库藏本（“五山版”）复印了一份给他，他又重校了一遍。这些都可见出他的认真和审慎。我现在常常感到，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不可少的，吸收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的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校勘就是这种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怕是很不为人所看重的；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顾的样子。且不说清代学者段玉裁的那句名言：“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我们只要粗略的算一下，从两宋的余靖《汉书刊误》、相传为岳珂作的《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方崧卿《韩集举正》等书起，一直到清代以至近现代，前人曾撰写了多少学有根柢的校勘专著，这些专著的校勘实例以及总结出的校勘理论，我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古书某些字句的校误补缺，而是学术史上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求实学风。南宋人彭叔夏在其《文苑英华辨证》的自序中说：

叔夏尝闻太师益公先生（按指周必大）之言曰：“校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叔夏年十二三时，手钞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之源。”缺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文苑英华辨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校勘名著，它通过分类实例的辨析而得出的某些概括，已不限于校勘学，“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对于作学问，特别是有志于搞中国古代学问的中青年学者，仍然是有启发的。目下新说迭起，引人注目，我希望不要因此而把我们固有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好的治学方法丢弃了。映逵同志在《唐才子传》校勘上所作的，就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们决非属于如有些人很喜欢说的将被“更新”之列的。

我在为《韵文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创刊词》中曾提到陈寅恪先生的一篇文章（《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30年代初，朱延丰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曾将其所著《突厥通考》请陈寅恪先生审正。当时陈先生对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这里可以见出前辈学者对后辈的严格要求，而且可以感到他们对著述一事是如何的审慎。“十年磨一剑”，这本来就是中国古来创作和著述极端谨严的传统学风。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以这种谨严的学风大力开展专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象《唐才子传》那样有文献价值的专书是不少的，对于这些专书，需要我们化实实在在的功夫一个一个地加以整理和研究。感想式地或者掇拾一些新名词糊弄一番，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无益于真正的学术事业。我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

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样的一种研究过去是被人们忽视的，今后可能会提到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对每一历史时期研究的概况进行具体切实的研究，譬如说，每一时期对前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一时期又产生过哪些有贡献的学者和著作，这些人和书在整个研究史中的地位如何，一定时期的研究风气又是如何，有哪些成就和不足。如果我们这样来进行工作，就会大大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开启后学者的心智。而要进行这样的学术史研究，就要有专书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基础。我曾经在另外的地方写过，专书研究是最能考验著作者的功底的，这也是提高我们整体研究的有效途径。在提倡学术史研究的今天，那末象映逵同志所作的《唐才子传》校勘，注释、补录、辑评那样的工作，学术界会是多么需要，不是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映逵同志正富年华，他定能率精锐之卒，再次开辟新的疆场，这或许也是我这篇短序所寄寓的一个小小的期望。

1987年9月

注：该文是为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所作的序。

史文结合的又一新例

我与戴伟华同志原不认识。1989年下半年，在京的几位古典文学研究同行倡议编一套《大文学史观丛书》，并推选我担任主编。有位朋友介绍戴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建议列入此套丛书。我一看题目，觉得与我过去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中所谈的相合，就很快决定列入这套丛书首批印行的五种之中，后即由现代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自此之后，伟华同志即与我通信，彼此时常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后来他说，他有志于在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须在史的方面下工夫，于是决定着手作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赞同他的计划，在通信中就编纂等一些问题彼此切磋。我原以为这件工作总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伟华同志锐志奋进，在短短几年内即完成这四五十万字的大书。但随后在出版上又遇到种种困难，几经磨难，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问世，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我在写完《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于1984年为该书作序，其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升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知识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来牵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时间从事于斯。

正因为此，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伟华同志有志于深入这一领域，且决定从治史着手，这既表明他勤奋，也确显示他的见识。因为考唐代方镇，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虽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补正者正复不少。无论如何，方镇终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记载较多。现在要考其属下僚佐，而且要尽可能确定其年份，可以说比考方镇要难得多。首先对唐方镇僚佐的职掌作具体考述的，当首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于本世纪60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载于《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现在是要考列各方镇使府内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职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远非一、二篇论文所能比。我觉得伟华同志之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甘坐冷板凳来遍检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还在于能细心考绎其间的差异，纠正不少文献记载上的错讹。今谨就翻阅所及，举数例如下：

例一，邠宁韦丹，韩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遗爱碑及《新唐书》本传，皆云韦丹曾佐邠宁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职。今据《金石萃编》所载《姜嫄公

新庙碑》文末所署，考知韦丹在幕府任节度判官。

例二，邠宁张抗，《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载次子张祝，而碑文载其余子之名皆从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正作抗。

例三，平卢李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平卢节度判官。《新唐书》本传载“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此正与《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卢等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合。

例四，河阳韦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韦珩等京兆府美原等县令制》：“敕河阳节度参议兼监察御史韦珩……可守美原令。”而《册府元龟》卷六九九《牧守部·谴让》：“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知怀州河南节度参谋兼监察御史韦珩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职应从《册府元龟》作节度参谋，而非节度参议，其从事之节镇应从《全唐文》作河阳，而非河南。《全唐文》与《册府元龟》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军段瓌，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其中即提及段瓌。《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瓌小传，称“王茂元帅陈，表为判官”，此不误，但所载《举人自代状》，却正是李商隐上述奏状，《全唐文》误属段瓌。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此书虽汇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汇编》编者谓此志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主为李氏，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记有“夫人赵郡赞皇人……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诤栖筠”，也可与两《唐书》之李栖筠、李德裕传对看。书中考崔成相事，同时也纠正《汇编》著录之误。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汇编》洛阳卷第十五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纾撰”。此处并可参《汇编》第十三册之《孙简墓志》，称“第五男前京兆府渭南尉集贤校理纾书”，可见《李氏墓志》撰者为孙纾。而《汇编》编者却误作李纾，另于《孙简墓志》处之孙纾，又将其姓名写作孙理纾，其原因乃误读文中之“集贤校理纾书”，以“理纾”为其名。《汇编》之误不一而足，于此也可见伟华同志读书之细与考校之精。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举这些看似琐细的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做学问，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光是一般性地讲讲，一二篇文章也就够了，但若想在这方面作深一层的研讨，就得作史料的搜辑与分析。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们看了本书所考出的各方镇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镇，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荆南、西川等，不但僚佐的人数多，且人才也特别集中，这就无异于当时的文士分布图，可以见出当时（特别是中晚唐）人才流动的有趣的走向。这必定会丰富我们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当然，考方镇僚佐，确有一定的难处，这方面的史料较为零散，不易考见某一方镇在其任期内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现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确切反映当时的实际人数。且有不少材料所记较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职，

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错。不过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经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足可供人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伟华同志还年轻，一定能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文史结合上勤奋探索，作出不断的贡献。

1993年岁末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

他山之石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者诺思罗普（F·S·C·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背景上说，斯蒂芬·欧文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流的链索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

在探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显得十分突出。是他扬弃了在他之前的欧洲学者的共同学风，即服从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正是从韦伯开始，主张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来研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这就为尔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应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者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关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李珍华博士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1983）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这篇文章讲的虽然是美国的唐诗研究，实际上足以反映美国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学研究的巨大进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上一世纪同一时期法国学者对中国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李》的推崇，和本世纪近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对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的认真探讨，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

正是从李珍华先生的文章中，使我知道欧文先生在唐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华先生把欧文先生列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而称为“特别值得一提”，并推许出版于1977年的《初唐诗》为“一本杰作”，说“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欧氏可以说是第一人”。李珍华先生对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学均有深邃的认识，而又对唐诗、特别是初盛唐诗有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话是可信的。由于我参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较早读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别提及的欧文先生著作给我的印象很深，并盼望能早日见到全书的中文译本。现在依靠贾晋华同志的努力，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甚感欣慰，我想我们国内的唐诗研究者也会从这一译著中获得启发。贾晋华同志前数年从厦门大学周祖谟先生研治唐代文学，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她的对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欧文先

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同志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表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90年的光景，占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明盛唐的高潮。对这90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作细致的分析，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程，但欧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年出版了《盛唐诗》，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欧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果结集八篇文章，起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于1985年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得》，哈佛，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的读者。

欧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作，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欧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在独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

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口，这就必然影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由欧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误失，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结构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这是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着的。

1987年3月

注：该书是为欧文《初唐诗》中译本所作的序。

有朋东来，切磋诗艺

1987年春，我在为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的《初唐诗》中译本作序时，曾谈到，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因此我当时即建议，希望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这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样一套汉译丛书现在还不可能编印出来，但是我看到由王洪同志任执行主编的“中外学者学术丛书”陆续出版，其意图乃在荟萃中国和外国学者的佳作，对中国古代文学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我觉得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当前建立开放型文学研究的有益的探索。我们当前应大力倡导开放型的研究，而所谓开放型研究，应包括面向世界和面向多种学科这两个内容。前者要求知己知彼，尤应知晓国外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批评方法、概念术语，后者要求兼采众长，树立综合观照的心态，其他学科、其他艺术中凡能充作参考者，则尽量猎取，为我所用。我们要想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就应充分运用和提供这种开放型研究的范例。

现在，王洪同志主编的这套丛书又将出版韩国学者柳晟俊教授的《唐诗论考》，我认为这就为这种开放型研究提供了又一个示范。柳晟俊教授在韩国即已打好汉文学的扎实基础，后又到台湾接受博士研究生的训练、深造，近些年来又与中国大陆学者频频交往，他的治学经历即可说明他已兼采这几个不同地区不同学风之所长，而形成他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风格。

应当说，韩国已有上千年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不过，在过去长时期中，研究中国文学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混合在一起，统称为“汉学”。在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韩国的大学中，才逐步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设立。据我所知，在柳晟俊先生执教的汉城外国语大学，就在1954年开设中语系的，迄今已有40年的历史了。去年10月，我到韩国几所大学访问，也应邀到外国语大学作学术讲演，发现外国语大学就有好几位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很有造诣的学者。

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现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人数上，已经超出了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域外国家，其研究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也有显著的提高。就以唐代文学而论，去世不久的汉学者金达镇翁，把七百多首唐诗译成韩文，出版了《唐诗全书》。对唐代传奇小说的译介与研究，近年来也有很大的进展，有好几位学者如车柱环、丁范镇等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在这之中，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发表论著最多的就要推柳晟俊教授了。他很早就从事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研究，后又对陈子昂、李益、杜牧、李商隐等诗人作了更新的研究，其间他又写了有关韩国朝鲜时代汉文家的论文。现在在中国出版的《唐诗考论》只是他众多著述的一小部分，但就从这一部分中也可看出他的丰硕成果和治学特色。

我觉得柳晟俊教授治学很有中国传统学风的特点，就是笃实于课题本身，尽量掌握各方面的材料，不故作惊人之语，而在平实中创新。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学问面还非常之广，对清代戴震的音韵理论和反理学思想，对近世朴学大师黄侃的声韵学，都能有通盘的掌握和清晰的梳理。近些年来，我也看到过一些外国学者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受到不少启示，但我觉得

真正在中国学问本身下工夫的还不是太多，柳晟俊教授能从乾嘉之学下手，兼顾博通与专精，这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中使我感兴趣的，还有第二编“唐诗与韩国汉诗之比较”，特别是论述王维对李朝诗人的启示与影响，以及探讨王维与李朝时期大诗人申纬两人诗风的比较。我觉得，国外中国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天然园地。介绍外来文学，用本国读者的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释和分析，用他们所熟悉的作家和作品加以类比和反衬，是一条便捷的途径，能够取得以近譬远、以易解难的效果。所以，国外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比较的特点。我们过去讲中外文学比较，往往侧重于与欧美等国的比较，而不大注意与邻近国家的比较，其实与邻近国家的比较，更有切实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中国文学即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新罗立国期间，与唐代交往十分密切。柳晟俊教授在本书的“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就辑集了极丰富的资料，以显示唐代诗人与新罗诗人的友谊与诗艺切磋。李朝时期先是对唐代李白、杜甫、王维，后是对宋代苏轼、黄庭坚等诗作的研讨和仿作，形成一代的风气。柳晟俊教授细致地对王维诗、画、禅三方面与申纬作了比较研究，使我们感到这两种相近文化是如何在亲切的气氛中相互影响，而又如何彼此受益。

最后，我祝愿中国与韩国的学者在日益密切的学术交往中结成诚挚的友谊，让这种友谊进一步推动我们更广泛深入地研究两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深切情谊。

1994年夏

注：该文是为柳晟俊《唐诗论考》所作的序。

作家传记应当怎么写

蒋长栋同志在湖南怀化师专中文系执教。他于1989~90年间作为访问学者，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接受邓魁英先生的指导，写成了《王昌龄评传》的初稿。由邓魁英先生的推荐，蒋长栋同志曾到我工作的场所中华书局，就王昌龄生平的若干问题与我交谈过一次。由于时间匆促，意见的交流并不充分，但我已感到长栋同志对有关材料作了细致的思考。他表示将参照这次交谈，对文稿作再次修改。今年年初，邓魁英先生特地告诉我，说长栋同志的《王昌龄评传》即将出版，希望我为书稿写篇序言。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正好碰上我杂务丛集，又有几篇必须要写的文章得及时交出，再加上我所参加编纂的《全宋诗》，又是校样，又是发稿，弄得我焦头烂额，恨不得把自己一分为三。但邓魁英先生是我素所敬重的学友，她的踏实的学风和深厚的功底，二三十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仰。她的嘱托我是不能推辞的，于是我就抽时间断断续续把长栋同志的这部书稿读完，并将读后感借这一机会写出，至于是否符合序言的要求，在我自己确实不敢有什么把握。

我在前些年曾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有计划地编印一套古典作家评传，以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工程之一。我觉得要提高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水平，先要做一些扎实的工作，其中之一，是把文学史上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作家，一个一个地写出评传。这些年来，作家评论的文章确实已经不少，有关生平记述和考证的也有一定的数量，但我总感到，相当多的作家，他们的生平事迹，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是若明若暗，即使研究得较多的作家，似乎热闹得很，但要问究竟哪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哪些问题还不得解决，未能解决的症结何在，头绪还是不大清楚的。

我总认为，我们目前的古典文学界，还是追求表面的热闹多，务实的少。前一阵子讨论文学史应当怎么写，确实很热闹，五花八门的意见很多，但问题是要落实：根据你的高论，能否在文学史写作中具体运用呢？我是赞成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意见的：文学史应当怎么写？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这确是一语透顶的话。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确实没有一定的成法，问题是要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符合作家作品的实际。离开大批的作家作品，无论你主体意识如何超越，宏观体系如何高妙，终究是站不住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批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肯下苦工夫把历史上多少知名的作家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平及其各个环节搞清楚。我们要做到，写出来的论点是经得起推敲的，作出来的判断是有材料依据的。尽管以后对某一位作家的评论有何新的变化，我们所写的基本生平轮廓是不可能推翻的。一个学科基本材料和知识的稳定，是学科发展的必需前提。可以设想，我们如果有一二百个这样的作家评传，则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面貌必将大为改观，这样的基本工作必将大大有助于对文学史整体进行理论概括，促进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水平从资料到理论的全面提高，那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真正繁荣局面的到来。

从这样的一种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学术背景来看长栋同志的这部《王昌龄评传》，那么对它的长处和意义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对于王昌龄，我于70年代后期曾做过一些考察，但自从写了《王昌龄事迹考略》，后来又收入《唐代诗人丛考》，在此之后，即未暇及此。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李珍华教授却一直在思考王昌龄的问题。李珍华先生早就有《王

昌龄》专著于1982年在美国波士顿吐温出版社出版。1987~88年间我到密执安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得有机会与李先生共同研究，对我们二人过去的论点作了重新检查，以其共同心得，写出了《王昌龄事迹新探》和《谈王昌龄的诗格》，分别刊载于《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及《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而与此同时，国内学者近些年来对王昌龄及其作品也有一些论著发表。蒋长栋同志正是充分注意到学术界的新的进展，在广泛吸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已有材料进行独立的思考，而终于写出这二十余万字的详尽传记。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评传的新收获，也是王昌龄生平事迹探讨的一个集结与新的起点。

著者的努力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关王昌龄生平的记述确实不多，我过去曾经说过，这些材料竟是异常的少，少到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能稍为连贯起来，而且即使在一些已经很少的记载中，也还颇有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本书作者采取看来最简单实则最可靠的办法，即直接从诗人的作品中探求。书中不少地方，都对作品的细心辨析中发现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又联系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形势，以与作品相印证，从而论证诗人的行迹与思想的发展。书中论王昌龄的河北之行，此一时期边塞诗创作的特色，此后的河东及陇西之游对他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两次贬谪如何与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相联系，都有很好的论述。当然，其中对某些行迹的确定，读者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部评传确实把王昌龄的一生串联起来了，把我过去所说的“几乎无法把他的生平经历稍为连贯起来”的论断改变了。在记载、考析事迹的同时，还对王昌龄的作品加以系统的论述，使他的诗作的意义更加明晰，帮助读者对王昌龄的各类诗有一个完整的把握。长栋同志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教学实践中摸索出好的经验，用之于科研领域，使得叙述更有条理，更易为众多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稍为感到不足的是，长栋同志是湖南省黔阳县人，长期在故乡一带工作，而王昌龄晚年也正好在黔阳及附近地区度过的。如书中所述，他第二次贬龙标，心绪并不悲观颓伤，他在贬谪途中和谪居时期所写的作品，色彩很明朗，湘西明丽的山水定会对他的诗情有所影响。在这方面，长栋同志为什么不铺开来作些描写呢？1986年秋，我因参加韵文学会诗学讨论会，在怀化住了几天，后又应邀去黔阳，游览相传为王昌龄所住之处的芙蓉楼。黔阳县内的青石板路面，街两旁旧时建筑的店铺，在在引起我对儿时江南小镇的亲切回忆。在夕阳返照青山、远望一片黛色的湘西特有景色中，我缅想王昌龄当时不知是怎么一步步来到这个地区的，后来又是如何安于这山山水水，把自己融化于自然和宇宙。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长栋同志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之所在，写得有感情些，也可以写得轻松一些。

1991年4月

注：该文是为蒋长栋《王昌龄评传》所作的序。

陈贻焮同志是我的师兄。他的年岁比我大，1953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贻焮同志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50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708），杜审言卒。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710），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之问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713）；同年，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711），张说入居相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汲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像贾曾、贺知章、张九龄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716），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18岁的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的诗风。贻焮同志在《评传》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长安时期多方面的生活，

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像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像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也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论》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像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中，随着贻焮同志的笔触，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养下度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

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眼前。

1981年 10月

注：该文是为陈贻焮《杜甫评传》所作的序。

别出新解 如实探讨

绍基同志数年来于忙中作暇，研读杜诗，并写成随札，陆续发表于报刊，今又将所作汇集成书，名曰《杜诗别解》，交付出版，又函示命于书前缀以数言。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得获先睹，受而读之，谨略陈所感，以求教于作者和学界。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因后世研究者之众多，笺注评论材料之丰富，可以具备条件建立学术史的，大概首先推《诗经》、楚辞、《文选》、杜诗、《红楼梦》五种。《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杜诗学、红学，几乎与作品本身同样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应当说，在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史中，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会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绍基同志的这部《杜诗别解》，将与建国后出版的其他几部杜诗研究一起，成为我们新时期杜诗学有所建树的著作，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大凡每一种学科，其积累的资料愈多，传统的包袱也愈重。传统中当然有好东西，但弄不好，这整个包袱也会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杜诗在宋代就已有千家注之称，明清两代，评注者之多，迥出乎诸家之上。这之中似乎有两种情况，一种如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所说的：“今人注书，动云吾效李善。善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水；今人铤钉拾取，曾足当九牛一毛乎？颜之推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何况注诗，何况注杜。”另一种如季振宜为钱注杜诗所作的序所说：“后生轻薄，喜谤先辈，偶得一隅，乃敢奋笔涂抹改窜，参臆逞私，号召于人曰：‘我注杜诗矣！’是犹未能坐而学揖让，未能立而学步趋。”后一种之病在于不读书而舛陋，季振宜对此是挖苦得很刻薄的；前一种，陈义虽高，但容易食古不化，以致泛滥踳驳，割剥支离。从总体来说，古代讲说杜诗者，似以前一种倾向为主。黄庭坚有一句名言，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自从江西诗派倡一祖三宗之说，奉老杜为诗祖，山谷的这句话也就一直为学杜者、注杜者奉为圭臬，而山谷的更有价值的话却不大为人所知：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也，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七）

黄庭坚的这段话真说得好，这是他中年以后，历尽仕途坎坷，又提炼其创作之所得，发自肺腑的话。金元时期的元好问，也正因为注意到了《大雅堂记》这篇文章，才感叹道：“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学术史上的这些经验之谈，无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和研究，都是有益处的。

从传统杜诗学的繁杂、穿凿这一倾向，回过头来读绍基同志的《杜诗别解》，则其特点（或优点）就会看得更明显。作者似乎并不打算把摊子铺得太大，他主要守住清代的几部注杜名作，即钱谦益、杨伦、仇兆鳌、浦起龙几家注本，从这几位有代表性注家的意见中引出歧义，由此而征引有关的材

料，断以己意。我个人觉得这实在是机智的做法，很可为青年学人效法的。还可以看出，起初发表的几篇，像下棋那样，似乎还走得较为拘谨，所用的材料，大致也为通常所及，后来则逐渐走动自如，材料的征引扩展到不少如天文律算、佛道讖纬等冷僻的书。但本书倒并不以材料见长，而是能把材料及时收束，不使之旁溢，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在考订是非、解释疑滞中，不故作高深，不生立奥义，而是结合杜甫作诗时的环境与心情，作实实在在的探讨，每读一篇，都使人有化繁从简、弃芜存菁、推腐致新的感觉。我想，书名“别解”者恐以此，而非如作者嘲戏者之所云。

绍基同志 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还设在北京大学哲学楼。我也于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作浦江清先生的助教，当时中文系在文史楼。哲学与文史二处，隔楼相望，由于同行，也偶有过从；后因他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又长期担任所内的行政领导工作，我则因兴趣在诗文方面，又加种种人事原因，行迹日疏，二人的交往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淡如水”的。但他为人的质直则一直留在印象中。因此当他在报刊上发表读杜的文章时，我最初是很吃惊的，担心他除原来的摊摊外，又另辟新地，是否铺得太开，顾不过来。陆续读了几篇之后，感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了。现在读了全书，更另有一种体会，那就是我们搞古典文学的人如何力求使自己的学问面扩展得开一些，视野更阔大一些。我们往往看到老一辈学者，他们做学问的面是很宽阔的，博大与精深，往往是造就大学者两个互为联系的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一时代的中青年学者，往往在一个或几个点上钻研有一定的深度，但往往是点，不是线，至于连成片，或较大的面积，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这应当说是一个时代的缺陷，从长远来看，对整个学术进展是不利的。现在绍基同志从他原有的元明清戏曲小说涉足于唐朝开宝大历时期的杜甫，即不论其实际达到的成就，单是这种研究的趣向和方法，就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我们一些年轻学者，于此也可考虑治学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讨论从国外引进某些新理论、新方法，或吸收自然科学研究的某些成果时，适当结合我们民族的传统，注意总结我们同时代学者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和治学成果，是会有助于方法论的创新和探索的。

由此，我还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记载：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曰：“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世说新语·假诮》篇）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不知怎的，当我读到某些深文奥义使人难以捉摸的文章，就常常想起那位伧道人的话来。我与绍基同志同样，这几年做学问，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的路子，可能为有识者所笑，但所幸皆未故树新义，以负如来，或可以此互勉云。

1984 年 12 月

注：该文是为邓绍基《杜诗别解》所作的序。

对作家的研究首先要理解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大、信阳师院以及孟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2年4月20日至25日在河南孟县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典等国的学者。现在提供给读者的，是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结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0年代中，曾于韩愈的贬谪地潮州汕头召开过首次有国外友人参加的韩愈学术讨论会。时隔六七年，又在韩愈故里孟县举行参加人数更多、讨论问题更广泛、成果更丰硕的第二次学术会议。我觉得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国家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文化学术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而又相互促进的极可喜的形势。这些年以来，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每年至少总有十几起，而这些学术会议，好多是由地方上联合文化团体及企业集团，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我个人不大赞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口号，这口号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说得过于简单化，近于狭隘的实用主义。但也应当承认，从总体上说，文化的发展是要依靠经济实力增长的，只有经济发展了，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才能陆续展开。而文化的发展，也必然会提高人的思想素质，这也会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

由地方上举办学术会议，还不只经济上的意义，我觉得这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历史文化的执着之情。这种感情是十分宝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超出经济、政治的某种限定的。我参加孟县的会议，不过短短几天，但从与当地的不少人接触中，深深感到韩愈这一古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不管自古以来，对他有过多少次的争论，但他却一直存在于孟县的故老之中。孟县的农民亲切地称呼他为“韩老爷”，把他作为自己的邻里来看待。他们可能还没有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一首诗，但我们中国那种尊重传统、尊重学问人的极可珍贵的感情，却是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延续着的。

这次会议的论文，涉及面很广，我通阅了全部论文，获益良多。这本论文集主要在三个方面为韩愈研究作出了新贡献。一是以文化整体为背景，探讨了韩愈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我觉得这是从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以来对韩愈思想的最集中的一次总体探索。二是提供了域外的韩愈研究的情况，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只有两篇，但却很有份量。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极有学术意义的大题目，需要一个个具体的论述加以充实和支撑。因此这两篇谈及美国与韩国情况的论文，不只对韩愈研究有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三是从民俗、民情的角度来研讨韩愈作品中某些富有特色的描写，如韩愈与潮州文化，论韩愈《送穷文》与驱傩、祀灶风俗的关系，这都能使人耳目一新，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一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亲切感和迫切感。

虽然这本论文集集中谈及的面相当广泛，但其中一个基本思想，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学风，则是实事求是，是力求从韩愈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预先设定的政治概念出发。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韩愈研究之所以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就是忽略学术研究的客观独立性，过分受到某种政治气候或政治运动的影响甚至干扰。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也使得学术研究

得到健康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会，以及这本论文集，之所以能在韩愈研究上有所进展，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篇序文中不可能对过去韩愈研究中的问题充分展开来谈。但有些问题还想借此略为谈谈个人的看法。如韩愈与柳宗元的关系，过去有些论著，为了抑韩扬柳，总是把他们说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双方，我觉得这些论著在不少地方是不合实际的。譬如韩愈有《答刘秀才论史书》，有些论著就举出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柳宗元严正驳斥了韩愈为个人荣利而畏首畏尾、不敢写历史真实的卑怯心理。现在韩、柳两篇文章具在，读者不妨平心静气来看一看，果真如过去一些论著所慷慨陈词的那样吗？韩愈的信是答复刘秀才的，而从韩愈的信中所透露的，那位刘秀才是想要韩愈借修史来表现唐代建国以来的一大批所谓圣君贤相，韩愈不愿意，因此说：“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韩愈实不愿作这些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因此进一步又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试想，在那个社会里，谁能树立私党，造作语言，凿空构立？还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韩愈的笔锋显然是指向这些人的。韩愈说：“仆虽驂，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这样的心境，不是已相当明白，使人可以理解了吗？至于柳宗元信中所引的那一段，也即使一些人起而抨击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如果不是孤立取此一段，而联系全篇来看，应当说韩愈这里是一种愤激之词，是正话反说，是说从古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真要做到“据事迹实录”，且加褒贬，则非倒霉不可。其笔锋所向，指向何处，不也可了然于心吗？我们还可以举其另一篇书信来看，在他写给好友崔群的信中，有一段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为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这样回肠荡气的文章，真使人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读者不妨把这一段文与论史官书比看，当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柳宗元的信，也是有为而发的，并非专对韩愈而逐条驳斥，而且我们今天读来，还可感到柳宗元的信，既勇于立论，又笃于友情，对此不能作深文周纳的论析。

又如韩愈所作《柳子厚墓志铭》，过去有些论者以为韩愈乘柳宗元已死，借为其作墓志，夹杂私心意气，对柳宗元加以攻击。所持的论据，实指文中的“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认为这是对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的讥嘲。其实无论是从这几句还是从全篇来看，韩愈对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所用的字句是相当客观的，譬如前面说的柳宗元年轻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踔厉风发”。后来“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没有对王叔文有所贬斥。至于“不自贵重顾藉”，

也不过是说其“勇于为人”，不只为一己的身份地位着想。而其全篇，则充满对柳宗元的怀念之情。文中说柳宗元被贬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畜，为深博无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间”。这是对他永州时期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后又说他废退后，“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慨叹其“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不是对柳宗元才识及遭遇的深刻同情吗？文中又说，如果柳宗元被斥不久，即被用于朝，仕位虽然恢复了，“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样说也是合于实情的。这也使我们想起韩愈写的另一篇《送孟东野序》，这篇文章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著名论点，进一步认为一些有才情的作家，几乎是由于“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遂“自鸣其不幸”，因而取得文学上的成就。因此最后说：“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孟郊是他的好友，长期居于下位，“有若不释然者”，韩愈也特地以此相慰劝。

更使人读之不能忘怀的是，元和十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召回朝，又远贬，刘禹锡最初是远放播州刺史，柳宗元主动上诉，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柳宗元请求以自己已任的柳州换播州，“虽重得罪，死不恨”。刘禹锡遂因此得以改为连州。韩愈特为此写了以下一段议论：“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诋诃然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段话真是充满了感情，也可以说是韩愈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友谊最可贵的是理解与信任。理解是有过程的。我们不能说韩愈与柳宗元，在交友中没有一点误解。但可贵的是两人都能逐步走向理解。以上这一段话是韩愈对柳宗元人品的最高赞誉，也是他俩友情在人生道路上，历经种种曲折，而取得的理性的升华。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学术会议有时召开倒容易，但会议之后要出版论文集则可说是难上加难。这之中，一是需要有人肯化费时间对论文细加审阅、选录，二是得要找出出版社多次协商。这本论文集得能在会议之后两年内印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清华同志是功不可没的，他与孟县的一些同志这两年来一直为此事奔波操劳，终于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印出这本论文集。我想借此代表与会者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1994年4月

注：该文是为《韩愈研究（第一辑）》所作的序。

我认识吴在庆同志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的推荐和介绍。祖谟兄是我的学长，195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他正好清华研究生毕业，由于时间短，年纪相差不少，所以在学校中我和他除了他临毕业时全系合影曾一起聚会以外，并无交往。从清华出来，他一直执教于厦大，我则由清华转入北大，北大毕业后曾经短暂留校做了几年助教，嗣后即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地限南北，而又行业相隔，因此就更无往来。不过我仍记得30年前读过他写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史》，字数虽不多，议论在当时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新异之处，却是建国以来较早的一本唐文学通史。大约5年前，偶然有一个机会我重读其中的几章，觉得平实的文笔时时触发引人思考的见解，有些在最近十年才提出讨论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已经注意到，只不过限于体例和篇幅，并未充分展开罢了。近十年来，祖谟兄与我都在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活动，有时每年，有时隔年，都要在一起开会。这些年来他在唐文学研究中当然又作出很多新的贡献，但他第一本书给我的印象却一直未能忘怀，我觉得它很象祖谟兄为人的风格，平实而不乏新见，简略而通达大局。与祖谟兄相处，会有一种厚实的感觉，使人很安心。他的那种淡泊于名利、超然于奔趋的心境是为友朋所心许默识的。

在庆同志是他的研究生，八年前由祖谟兄介绍，我评阅过他所作的杜牧研究的硕士论文，后来即渐渐有文字来往。1982年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后，我负责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我乃约请祖谟兄撰写中晚唐研究情况的文稿，祖谟兄即推荐在庆同志与他合写，共同署名。第二期起，我征得祖谟兄同意，约在庆同志执笔撰写中晚唐或晚唐研究情况的综述。从那时起在庆同志已有关于杜牧及其他中晚唐作家的考论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所写的综述，则总是详细介绍别人的文章，很少提到自己，有时提到，也是十分简略而极为客观地一笔带过，倒是已故的吴汝煜同志在论述1987年的中唐文学研究时，特别提到：“在刘禹锡的考证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吴在庆的《卞著 刘禹锡年谱 辨补》（《唐代文学论丛》第八辑）。作者立足于本证，从刘禹锡诗中钩稽史料，在有关刘禹锡的事迹、诗文系年等方面纠正了《刘禹锡年谱》的一些疏失；又为十四首诗歌作了新的系年。文章思虑周密，征引赅博，结论可信。”汝煜同志对刘禹锡诗文的考订也是下过很深功夫的。他为人朴质，不尚虚誉，因此他对在庆同志的文章评价为“思虑周密，征引赅博”，我认为其结论也是可信的。

在近代学者中，真正为杜牧研究打下科学基础的是缪钺先生。缪钺先生的《杜牧年谱》和《杜牧传》，是一切研究杜牧的人所必读的。近10年来，在缪钺先生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对杜牧作了新的探讨，特别是有关杜牧诗文的辨伪和系年问题，收获更大。就我的浏览所及，如吴企明、张金海、郭文镜、胡可先、王西平及吴在庆同志，他们这方面的成绩都很突出。除了吴企明同志年岁稍大一些，其他几位多是40岁上下，胡可先同志则更小一些，使人感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力量的雄厚。他们几位的文风稍有不同，有的平稳些，有的大胆些，彼此也都有所争论，但我看在庆同志的文章往往能折冲其间，摘取诸家之所长，而加以充实和提高。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杜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一文中，考证杜牧出守黄州的时间，缪钺先生的《年谱》曾辨杜牧文集《上宰相求湖州启》所记月份之误，在庆同志又论述《年

谱》此一推算稍有误差，并从而认为杜牧出守黄州在会昌二年三四月间。在此处，他特别加括号注明：“此点郭文镐君致笔者信中首先指出。”对私人通信中他人的论点，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加以引用，并表明这一论点的提出乃在写作者本人之先，这种学术上的勇气和度量实在是非常值得称道，非常令人钦佩的。

我觉得，在庆同志的学风和文风，与祖譔兄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上面提到的，只是几个例子。这些年来，我因为与祖譔兄在工作上 and 学术上联系较多，从而也与在庆同志接触多了起来。他们都使我领悟到一种令人怀念和珍惜的交友之道。现在，在庆同志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杜牧的论文结集成书出版，要我为他的这本专著写一篇序。想起我与祖譔兄结识近 40 年来的交往，看到他们师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分别作出的业绩，以及表现出来的颇相仿佛的风尚，我觉得应该写出我的一点感受，并借以表明在我们学术界确有一种正气存在，这种正气的意义是远远超出于学者们取得的具体成果的。

我认为，在作家作品的考订方面，中晚唐的难度实大于初盛唐；晚唐与中唐比较，晚唐的难度更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史料的复杂。晚唐的史料并不缺乏，而却真伪混杂，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以杜牧来说，他的文集除了其甥裴延翰所编的二十卷本《樊川文集》以外，宋以后出现了好几种续编，如《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诗补遗》、《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等等。但这些别集、外集、补遗、补录，却数量不等地混入他人之作。南宋诗人兼诗评家刘克庄，在其所著诗话中就说过：“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是许浑诗。”他说这些续编之中，十有八九是许浑的诗，可能有所夸大，但现存杜牧集子中掺杂许浑之作，经学者们的考索，数量确实不少。要辨析哪些是杜牧诗，哪些是许浑的诗，必须考明两人的生平，而问题在于许浑的事迹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因此近些年来，研究杜牧往往同时也研究许浑（譬如我知道郭文镐同志已写了几篇许浑的考证文章，有的他特意寄给我看，我对他的用心之细是很佩服的。文镐同志这些年来也一直在出版社工作，编务极忙，但他并不放松研究，相反，他还因编辑工作之便结识了好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真正要弄清晚唐作家的事迹或作品的真伪，就要牵涉到另一个作家，则不得不先把第一个作家暂时放下，研究这第二个；而深入到第二个，则又碰到与另一个作家又有纠结，则势必又要去翻检那第三个的材料，并加以印证这第三个材料的确实性。这样，摊子就越铺越大，使人有治丝益紊之感。另一方面，晚唐的历史材料本身又极复杂，如唐代武宗的实录大部分佚失，宣宗以下的实录并未修成，这样，史家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即残缺不全，修史者又不分大小巨细，也无心顾及真假。对此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在评及《旧唐书》时就作过分析，而唐史学界长时期来对晚唐史料缺乏整理，这方面的工作往往被迫由治文学史者来担任。这就更增加对晚唐作家作品考订的工作量，也使得表面看来作出的成绩不如初盛唐。而实际上，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唐诗学界对晚唐的考证，所下的功夫是很深的，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实在的。除杜牧外，像对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张祜、韩偓、韦庄、罗隐等，都有极为丰硕的创获，它们有的已超出文学史的范围，对唐史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助益。

当然，收在在庆同志这本书中的，还有好几篇理论上的阐发，如论杜牧的思想、杜牧艺术风格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杜牧对后世的影响，等等，多有很好的见解，有不少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我认为，构成本书基础的，也

是构成在庆同志中晚唐文学研究基础的，是他对作家事迹的考证，他对作品的系年及真伪的辨析。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应当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但却往往为人所忽视，或为人所鄙薄。笔者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论这十年来文史学界的考据的。文章口气很大，说：“历史似乎注定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考据家不能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据说他们只是“消极地考证和确认一些支离破碎的事实”，他们“漫无目的和方向，但事考证，不问其他，鄙视历史理论的建构，纯粹的为考证史料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因此，文章判定，这样的研究“既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我不大清楚，这个我们共同经历过的80年代有没有产生过“风靡一时的考据家”，这些考据家有哪些考据文章或专书，他们又是如何的“漫无目的和方向”。据我看来，不论整个唐代文学，或晚唐文学，关于作家作品的考证，成绩是显著的，目的和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为整个唐代或晚唐文学的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使文学史的理论探讨有坚实的科学凭依。考证如何为理论提供事实的支撑，理论如何在考证的基础上作出令人信服的阐述，我认为在庆同志的这本书是能够作出回答的。我们的唐代文学研究界确实需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著作，而切不要放言高论而远离实际。

1990年9月

注：该文是为吴在庆《杜牧论稿》所作的序。

山谷诗风研究的新开拓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曾集中时间从事于宋代诗文研究资料的搜辑，后来结集为《杨万里范成大卷》、《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二书，列入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1964年2月出版的《杨万里范成大卷》的前记，曾谈到：“宋诗在唐诗以后，开拓了新的局面。人们一提起宋诗，就会产生与唐诗不同的感受。唐诗中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宋诗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但是很奇怪，在各自的错综复杂的诗歌群中，确有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存在，形成一个时代的诗风。宋以后的诗人和诗评家，大多企图来探讨这一虽然复杂却也饶有趣味的文学现象，但似乎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从比较来看，我们对唐诗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对宋诗，对其中不少的诗人和流派，认识得还不是十分透彻。宋诗研究的基础，比起唐诗来，是不够坚实的。近数年来，我断断续续在宋代诗文中摸索，希望在这方面整理出一些头绪，以便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痛感，单是在诗歌范围之内，也有不少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这就使我觉得非得先从积累和整理原始资料入手不可。在大量的和经过审查的资料基础上，再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这里抄录20多年前的这一段话，是想给企图了解宋代文学研究进程的同志们提供一个背景，表明我们这30多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曾经处于怎样的一种落寞的状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宋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的研究，是被看作冷门的，至于黄庭坚的研究，那更是冷门中的冷门。上面提到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全书共70余万字，是与《杨范卷》同时编成，而且是同时交付排印的，但那时出版社考虑到舆论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某些看法，不得不采取付型后暂不印的办法，这样，就直到1978年8月才与读者见面，这之间竟隔了15年！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15年意味着什么，我想大家都会有真切的感受。以过去的这样一种情况与今天对宋代文学热烈的讨论相对照，人们自然会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产生一种不能自己的兴奋之情。

1984年10月，我在济南参加李清照研究讨论会，遇到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夏汉宁同志，在交谈中我建议江西方面是否可对黄庭坚集中进行研究，并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夏汉宁同志回赣后写信给我，说省的文化工作领导很赞同这一意见，并着手开始准备。果然，一年以后，就由江西师大、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九江师专、九江市文联和修水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发起，于1985年11月上旬在修水县举办了纪念黄庭坚诞生94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深感抱歉和遗憾的是，我因临时为他事所牵，未能赴会，失去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事后听到与会的同志介绍，说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一百五十多位与会者对许多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后来又收到厚厚一袋论文资料，一次会议论文的数量，竟超过了半个多世纪发表的论文的总和！谁说我们的古典文学界是处在停滞不前的、落后的境地呢。

当然，黄庭坚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一个起步，虽然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起步。由于黄庭坚的思想和作品的复杂性，特别是长期以来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所造成的某种僵固的文学批评观念，使得他的创作得不到公允的评价。要在短时期内消除文学观念上的习惯势力是不容易的，我们在近年内的一些力求有新见的黄庭坚研究中还不时可以看到某些旧时的踪迹。我觉

得，当前黄庭坚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从总的方面，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出发，探讨黄庭坚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我们需要了解宋代知识阶层的情况。知识阶层，中国古代称做士，后来又称士大夫，他们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承受者。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之形成及其流变，是研究不透的，但在这点上，过去恰恰为人们所轻视，或遭到粗暴的否定。50年代林庚先生探讨李白的思想性格，曾用过“布衣感”一词，企图以此来探索和把握盛唐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但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此以后，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对文学主体的探索竟成为禁区。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研究作家所生存的文化圈，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文人心态，是摸索创作心灵的必然途径。宋诗的特点，也恰恰与那一时期文人的经历、兴趣、爱好密切相关。对唐宋历史与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闭目一想，唐代和宋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行为举止，是可以区分得很清楚的，虽然这些区别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还需要经过思考和研究。我个人以为，在宋代文人中，黄庭坚似乎更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特性，更能代表那一时期士大夫的优点和弱点。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哪怕是稍稍的涉足，也定会拓展古典文学研究的地域，引起人们在学术上的创新的兴趣。

第二，要有一个宋代文学编年史。黄庭坚生活的年代，是宋代学术文化高涨的时期。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音乐、工艺，以及哲学、史学、音韵训诂等都发展到极高的水平。黄庭坚的博学，他的才情，他的诗歌艺术，需要从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去加以理解。这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努力提供一个产生众多杰出人才的社会环境。我们还缺乏一些基本事实的说明，例如，黄庭坚进入文学领域时，北宋的诗坛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已经有多少诗人在进行活动，有哪些诗人已写出了成功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又譬如，受黄庭坚影响而写作的年青诗人，后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江西诗派的，他们在北宋后期是怎样活动的，黄庭坚与他们有哪些交往，彼此来往有哪些特点；又譬如，吕本中是在什么时候写出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他作这个宗派图时与哪些诗人交换过意见，他们的经历如何，在重大的政治变动中态度如何，给他们的作品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基本事实都需搞清，才能对黄庭坚的创作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要搞清这些事实，我以为最好是作编年史，它将会给我们一个纵横交叉的、立体的认识，更便于作宏观的考察。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编年写作问题，我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十二期《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意见》中有所阐述，请读者参考，这里就不再多讲。

第三，要精细地研究黄诗的语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诗歌的生命，研究一个诗人，落脚点必须在于对其诗歌语言奥秘的探究上，否则一切都将落空。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过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读了海涅，会有一种幻觉，整个宇宙是说德语的。”（《语言论》）这种感觉，我们在读我国古典诗作时也会产生。读了杜甫、李白的诗篇，我们真会惊异汉语的奇妙的表达能力，似乎汉语经过这些杰出诗人的诗句猛然加深了它的意蕴和内涵。对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有种种争论，但人们不得不承认黄庭坚终其一生对诗歌语言进行了严肃而真诚的探索，而他的哪些探索是成功的，哪些探索是不成功的，需要做细致的工作。语言的研究需要具体，在学术工作中有时把范围适当缩小，不仅更能收到成效，有时还能从

某一局部而拓展到全体。我相信对黄诗语言作较为精密细微的分析，会有助于对他的整个风格的认识，或许还会加深我们对宋诗的艺术风味的理解和欣赏。

以上三方面，都需要化时间，化工夫，我们希望研究者能潜下心力，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工作。在自然科学内，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确定事实，有时会导向规律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是否也可由此得到一些启发呢？规律是要谈的，新方法的运用也是值得讨论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有大量的事实作基础。脱离大量的事实，而侈谈规律和方法，就会像下面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所说的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能够承担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在经济上是要作出牺牲的，但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赞许和好感。我也是搞编辑出版工作的，深感在当前的情况下，出版工作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不能一致，如何抉择，就显出当事者的眼光和魄力。这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我想销路也不会太好。这里我倒想起了当代美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的一段话，他在为中译本《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北京出版社，1983年10月版）所作的导言中写道：在他写完这部著作后的3年中，这部手稿曾被美国17家大出版社所拒绝，后来对原稿删减了十分之一，才勉强为英国一家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出版，老板神情阴郁地对作者说：“我们印了五千册，我们还在求神保佑。”而后来，即到欧文·斯通写这篇导言时，这本书已经翻译成80种文字，销出了大约2500万册，《梵高传》成为全世界向往生活、向往艺术的青少年读者最为仰慕的书籍之一。不过，这中间毕竟经过了将近50年的时间，可见一本书，那怕是件艺术珍品，要被人所知，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相信，黄庭坚的作品一定会为自己开路，这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的辛劳将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报偿。

1986年11月

注：该文是为《黄庭坚研究论文集》所作的序。

学问追求与世俗超脱

近十数年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地区，词的研究似乎已成为宋代文学的热点，而豪放派的词人与词作，又更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关注。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豪放派词人胸襟开阔，情调高扬，特别是从南北宋之际开始，又因他们的词作系念于国家的安危、生民的哀乐，对于常有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是更能牵动他们的感情的。（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其实对婉约派词也表现出深沉的爱好，另外又有一种想摆脱豪放、婉约的传统模式而独创清丽一格的词，也是深受欢迎的。）我因为工作缘故，也出于个人爱好，对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确也是关心的，从中也受到触发和启示。但久而久之，却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产生。读着一些看似新奇的论点，细究起来总觉得浮在纸面上，看了几篇之后，种种宏论也就随着一些闪烁的词藻而终于轻飘地消逝。这样的感觉已非一年二年，而现在，读到黄珮玉女士这部沉甸甸的关于张孝祥的专著，过去那种不满足似乎得到一种理性的解答，那就是：

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学术，真正要有所前进，还得靠实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得以走向整体的成熟。

关于张孝祥，过去不是没有研究文章，但说来很可怜，除了安徽宛敏灏老先生那篇几万字的《张孝祥年谱》外，实在见不出有像样的专门著作了。但尽管如此，种种宏论，各式各样的赏析文字，竟是接连不断地在一块远非厚实的基础上生发出来。我们的研究能够在这种状况下达到繁荣昌盛吗？

黄珮玉女士的这部《张孝祥研究》，给人一种充实感。我觉得，它所蕴含的学术上的意义，已远超过书中论述的一个个具体的论点，尽管这些论点也都有极堪学人注意的独立的价值。

全书对张孝祥的生平、词、诗、文、书法、文集版本作了全面的探讨。著者对每一章节都倾注全力，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著者是写得很累的，但唯其如此，使读者获得一种来之不易的厚实感。著者似乎不放过张孝祥生平的每一个细节，有时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也会安排一长串材料。我知道著者是没有考证癖的，但似乎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迫使她去穷搜究讨，这种不厌其烦的心态不是更能表现出一种以全身心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吗？

有不少地方确实发前人所未发。如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过去的一些文献记载总抱有一种为贤者讳的态度，实际上是视此为张孝祥一个不小的疵点。书中引用详确的材料，说明张孝祥实在与汤思退没有政治上的牵连，更从张孝祥一生的大节着眼，清晰地表明张孝祥与汤思退之间在事关和战的大局上明显地划出一道界线。又如从绍兴二十九年罢官至建康留守，过去的研究对这几年实在未有触及，以至形成张氏行迹中的一段空白。著者则从为人忽略的常见材料中，写出那一时期宋金采石之战前夕，张孝祥出于对国事的忧虑和关怀，奔走大江南北，向一些主战派人士进言，希望朝廷能作积极防御的准备。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著者还利用前些年在江苏省江浦县出土的其子张同之墓志，勾稽出这位豁达大度的诗人兼政治家，在年轻时还有一段爱情婚姻的悲剧。陈寅恪在概括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曾提出三点，其中之一即是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地下出土文物作综合的考察。著者在论述张氏的爱情悲剧时，确是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近代中国学者开创的传统治学方法的。

我真佩服著者身居香港的繁华之地，而能沉潜于原始资料的搜讨。顾炎

武在《日知录》自序中曾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覆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这番话表现了顾炎武对当时有些人以贩卖现成旧材料自诩的讽刺，以及对自己治学的严格要求。黄珮玉女士确实也是如此。她所引用的宋代史籍、文集、笔记、类书、方志，既有常见书，也有生僻书。即以她所考的张孝祥之子同之事迹，所引之书，根据我所记录，以论述之先后，即有弘治《滁州志》、《宋会要辑稿》，陈傅良《止斋集》制词，《历阳典录》，桐城《浮山志》，陆游致张同之诗二首，以及周必大《文忠集》、张镃《南湖集》中诗各一首。应当说，对张同之的考述，并非全书最为用力之处，但即使如此，所引之书已非一般，由此也可见著者是以怎样一种严肃的态度来从事于此的。

我曾说过，我们应当有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写这样的传记，要立足于信实，要吸收已有的成果，又经过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事迹写得清清楚楚，不回避矛盾，也不强作解人，从材料出发，而这些材料又是经过核验的，无论今后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评价有何等样的变化，要做到这套传记所写的基本事实是推翻不掉的，而无论评价是如何的花样翻新，它们对这些作家生平的再探索必须以此为依据。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可以达到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做成了，则将是一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从事专书的研究，这是深层研究所必需做的一着。专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研究者工力的一种考验，也是我们整个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如果我们对宋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著作分别作了专题性的研究，就会使我们的整个研究基础较前更为充实，也会使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严谨学风的熏陶。

从这样的一种研究格局出发，作为一个大陆的古典文史研究者，我确实感到应当感谢黄珮玉女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它会使我们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学术上的责任，以及如何使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能有一个较高的品位。

最后，我还想说，黄珮玉女士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先后同学。我1955年毕业，她1957年毕业。但在校学习期间，我已记不起来是否曾与她说过话。她在校时曾在中文系学生会担任过工作，性格开朗，有组织能力，我曾见到她有条不紊地主持过中文系的全体同学会议。毕业后我留校当助教，不久就历经坎坷，她则任教于西安、广州等地，彼此不通音讯。“文革”后她到北京时曾来看过我，匆匆一聚。1992年、1993年春我两次到香港作学术访问，她都来带我在香港游览。她本在香港出生，后在大陆求学、工作，“文革”后回香港定居。在一般人印象中，她可以安安稳稳过富裕日子了，却不料她为了事业的追求，竟辞去职位，专心一志地写书。人间得失本无一定，从世俗的眼光看，她可谓失去的太多了，但在这些年中，她先有张元幹研究的专著问世，现在又拿出篇幅更大的张孝祥研究，这到底是失还是得？二张是词史上的关键人物，没有张元幹和张孝祥，也就不会有辛弃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研究宋词，要研究豪放派词和大词人辛弃疾，就不能过黄珮玉的这两部书。但是，我总觉得，珮玉女士实在是生活得太累了，她总是倾全力于事业，以致忘却自己的生活，对于个人来说，实在是失

大于得。这在香港社会，实在是非常艰辛的。我不善于安慰人，对于这位已饱经沧桑的老同学来说，也不必再作文字上的慰藉，我只能说，学术工作恐怕就是要安于清贫与寂寞的，而且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能相安于清贫与寂寞，也未始不是一种美德，一种超越。这算是这篇短序结束时聊以互勉的话吧。

1993年暮春

注：该文是为黄佩玉《张孝祥研究》所作的序。

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1989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辩的时间原定于6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纤琐”，“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页323）。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加以体认，这就有可能超越于某些传统观念的个人感情好恶，使人们可以真正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陈寅恪语）。

如江湖诗人的所谓谒客身份，书中不仅在正文中专辟一章，即第二章《文化传统的倾斜》，作专门的论述，还在附录中以大量材料，分类考析行谒的内容和方式，谒客阶层的形成，谒客的出现与幕府、荐举制的关系，当世显人和谒客自身对行谒的态度。不知他人读后感觉如何，我个人是，学句时髦话，是读得非常过瘾的。从来还没有把江湖诗人的谒客身份如此详细地讨论过。行谒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乞钱，但为什么到南宋中后期在诗人中竟形成如此一个群体，以致可以说是一个阶层，这之中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行谒对当时的诗人心理产生哪些失衡，他们又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使之平衡？书中都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这样的结论：“由于江湖谒客的出现是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身上所反映的诸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代、尤其是对南宋社会的理解”（页350）；“以往学者研究宋代知识分子，往往只注意了其正面形象，而经常忽略那些与宋代正统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们的探索便是

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以期加强对宋代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页42）。

当然，江湖派毕竟是一个诗歌流派，我们的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文学的分析上。书中并未忽略这一点，而是着重在这方面化了力气。书中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主题取向、审美情趣、时空与意象、诗歌渊源，以及代表诗人的作品评介，作了极为全面的称得上是美学的考察。我说是美学的考察，是说书中对作品的分析并不停留在一般的词句鉴赏上，而是对作品如何表现诗人的内心世界作既细腻又宏观的深切体认和整体把握。是一种与读者的诗情交流与理性共识。如过去一直以为江湖诗人只追求纤巧，被人讥议为琐屑甚至卑下。确实，江湖派诗人的境界是有狭窄的弊病，但正如作者所说，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仅作简单的价值评判。书中论这些诗人由于在艺术追求中往往把眼光投入琐碎的生活片断，视野不免局促，就使整体上缺乏超越性，但从具体艺术美感来说，这种追求仍有其不可代替的魅力，由于形象更加直观，感觉更加细腻，就从而在常见的物象中，进一步挖掘出清新自然之美。书中又论到，江湖诗人到处游谒，不遑宁居，因此对于时间的流逝，往往别有一种敏感。书中第三章《羁旅之苦》一节，写到这些诗人由于经常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因此最为刺激他们心灵的，莫过于清晨和深夜。书中指出这一点，并由此而展示江湖派诗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取向，论述颇富新鲜感，足以见出作者艺术触觉之细致与敏锐。

根据书中所考，可以列为江湖派诗人的，有138个。当然，具体哪些诗人是否真正属于这一诗派，还可讨论，但不可否认，这么多诗人组成一个流派，而前后活动期又在半个世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即使算不上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的。过去的一些论著，往往说他们只管个人琐细的眼前利益，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评论者没有看到当时的国家所给予这些诗人的是怎样一种重压，江湖派诗人的心灵创伤不仅来自于生活贫困所受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这一时代和社会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本书作者认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当以嘉定二年（1209）划线，这年陆游去世，《江湖集》编印面世。此说是言之成理的。而可以注意的是，在此以后，正是南宋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直至最后崩溃的时期。开禧二年（1206）伐金失败，标志南宋政权直线走向衰亡。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金和议，宋朝廷承受了改金宋叔侄为伯侄的屈辱，而且大量增加给金朝的岁币，使得本来就十分严峻的财政危机更加速发展。嘉定和议签订仅6年，宋金又发生秦州之战，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诏伐金，此后一直到金为蒙古所灭，宋金战争不止。绍定三年（1230），蒙古军攻破南宋剑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川的兴元及沔州。绍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金亡后，强大的蒙古国即成为南宋的直接威胁力量。不久，蒙军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军又举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阳，第二年，入襄阳。淳祐元年（1241），蒙军占领四川大部。蒙古国的铁骑步步进逼，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主动，南宋只是一个等待被吞食的弱兽。可以想见，这样的一种恶劣形势，持续半个世纪，对人们，特别是对下层士人，会造成怎样一种忧郁压抑而又惊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军费开支，以及战争的直接破坏，使南宋社会矛盾更加严重。吴潜在端平年间曾上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畜，扫地殆尽。”（《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徐鹿卿于淳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历述所走过的南康、池阳、太平等地，“流离殍死，气象萧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拨杂本账济饥民札子》）

嘉熙、淳祐间，杜范上疏，说东南一带，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离，襁负相属，欲归无所，奄奄待尽”。（《宋史》卷四七杜范本传）老百姓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宋朝仍横征暴敛，江湖派的代表诗人刘克庄，在他担任官职时曾说：“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应该说，刘克庄是一个尽职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曾多次为当时的财政困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文集卷五一《备对札子》建议“罢编户和余之扰”，以为是“裕国宽民之要方”。在这一札子中，他又激烈地指责“颍阍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又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当然，他针对此而提出的“追大吏乾没之赃”的措施，也与上面的“罢编户和余之扰”同样，根本未能行通。

我在这里举刘克庄的例子，是想说明江湖派诗人并非天生不关心政治，相反，他们中有好几位，在居一定官位时对朝政的腐败是慷慨陈辞，而处于平民百姓时也曲折地表达对世事的忧虑和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诗祸）和社会黑暗使他们对现状起一种冷漠感。这使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他说梁氏死后，“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实则这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极丑怪之奇观，而梁氏“少为儒家之学”，“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因此不免对政治总要介入其间，故虽“高文博学”，而终不能安心于学问。最后寅恪先生深致感喟：“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我觉得，造成江湖派诗人对世事之冷漠，也正是这一时代、社会之不幸，而不能苛求于诗人本身。关于这一点，书中也有较好的阐述，我只就平日读书所及，略作些许补充。

我还想说的是，张宏生同志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导师程千帆先生治学对他的启发，说：“程千帆教授的治学，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研究问题时，往往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抽象出一些规律来，尤其注重作品本身的体验。”关于千帆先生的治学成就，周勋初先生在《古诗考索 读后记》中已有很好的阐述，我这次重读勋初先生这篇文章，又读了千帆先生的《闲堂自述》，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思路有进一步的体会。

1983年，我与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基金资助评议会，就在那次会议上，程先生提出他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计划，我即从心底里钦佩程先生的识见与魄力。程先生很早就提出“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治学路数，而“唐宋诗歌流派研究”正是这一治学思路的进一步发展 with 具体落实。莫砺锋同志的《江西诗派研究》，蒋寅同志的《大历诗风》，和张宏生同志的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在千帆先生的指导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正是很好地体现了《闲堂自述》中的学术概括：“在诗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

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宁可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而不是反过来。在历史学和文艺学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争取广泛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假如它们有助于使我的结论更为完整和正确的话。”

我有一种感觉，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诗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蒋、张三君体现了千帆先生治学思路的这三部著作，将在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 30 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渊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切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别是他在 70 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的治学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所发展。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极有生气的学风。我由此又想起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清华大学学派时的一段话，他说：“清华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清华的这一学风，是由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等学者的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这已是我国现代学术思想上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不知怎么，在想到这些时，联系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我就不禁联想起程千帆先生，想起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与治学经验。薪传不息，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

1994 年 2 月

注：该文是为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所作的序。

开展地域文化的研究

近几年来，文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股新潮流。正如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报纸所说，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文化热”。文化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一门新的学科——文化学，正在形成。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近代中国的两位大学者的话，他们一个是王国维，一个是陈寅恪。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静庵文集续编》，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根据他所揭橥的这一主张，王国维列举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计有五项：（一）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之简牘，（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陈寅恪则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述两段话都是本世纪初一二十年说的，他们根据当时地下发掘的新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在各自的领域内作出新的开拓。王、陈二位都是他们领域中的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能不囿于旧的书面材料，勇于接受地下发现所得，确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日而喻。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确是走在前列的。但他们对学术新潮流起因的解释，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们还是较侧重于文献材料，以为有新资料才能有新学问，而不大注意于社会变革对于学术思想的重大影响。这是前贤所受时代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新学问、新潮流之起，恐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社会原因，是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引起思想界，从而在学术界，促进对旧学问的冲击和改造，新学问的兴起和繁荣。这倒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就以近些年来来的“文化热”来说，在此之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新材料，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安阳甲骨、敦煌卷轴那样震惊于中外。有的，则是在中国广大城乡出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改革。这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结构，都处在变化和前进之中。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必然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审视，加深对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些新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可见，8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是有其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土壤的，这是这门新学问获得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新材料的话，那末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就是任何地下发掘也无从比拟的丰富而深刻的新材料，那是研究者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即使传统的书面文献资料，处于今日的文化研究的整个系统中，也将会以新的面貌为研究者所利用。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的研讨，一类即是史的研究。这两大类互有关连，各有其研究对象。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宏观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步，为了研究的深入，必须把对象相对稳定，范围适当缩小，尤其是对文化史来说，似更应如此。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浙江文化研究丛书”，我以为虽稍偏重于史的研究，但又能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观照现实问题；同时，又能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内容。这一设想是有开创性的，必将获得新的开展和成功。而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种《浙江十大文化名人》，为在浙江历史上产生过的、对整个中国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立传，由此反映浙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成就，其选题也是十分合适的。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好意，要我为这部著作写一序言，我却觉得未必合适。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各自学科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这十篇传记，大都从他们原有深厚的蓄积中提炼而成，有不少还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和修订，使立说更为扎实，见解更为宏通。而我对这些方面却缺乏专门研究，除了乡籍也是浙江之外，确没有资格为本书作序的。我只不过在中华书局这一古籍整理出版的机构中做过若干年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倒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特别是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新建立以来，因为工作的需要，较为广泛地接触到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语言文字等学科领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同行，我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眼光与魄力表示欣赏，同时对于他们把开创勇气与求实作风相结合，踏踏实实地把文化研究真正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是追求一种时髦，也是深感钦佩的。因此不揣浅陋，冒佛头着粪之大不韪，写了这篇序，但我想还是难以副出版社同志的殷望的。

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相当的发展。良渚文化且不说，70年代在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后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差不多也可以是震惊中外的。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都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始文化，应当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源地的一部分。本书的十位文化名人传，更加有力地证明，浙江对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如何的贡献。文化名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时间流失了，具体的历史进程逐渐模糊了，以至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从他们的著作和活动记载中，是能较为充分反映他们的时代的。19世纪法国著名的美学思想家丹纳说过：“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艺术哲学》，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月版）丹纳这里说的是画家，我觉得可以扩而充之用于一切有才能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其背景是当时整个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发达的历史。应当说，本书所写的十位人物，他们的活动是有全国意义的，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培养他们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不只是浙江的“乡贤”。光是浙江的文化还不足以承担得起他们的教养。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浙江长大的，他们与浙江有着先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们的全部活动和著述有着深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鲁迅先生身上可以看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这几位名人的传记，可以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也应该促进

我们的学术工作者进一步去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它是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没有地方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不同，吴越文化与楚文化也有不同。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入。有志者如从事于此，必将大有所获。

另外，我觉得，人物的研究还应当与社会的风尚习俗研究相结合。我们现在看《清明上河图》，恐怕倒不在于观赏人物车马的笔法，而是神游于图中那种细腻生动的社会生活和人民习俗。这幅图距现在已相隔千年，图中描绘的生活与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两样了。但人们还是有兴趣观看，它的魅力仍然存在，这个道理是很值得思考的。其中一条，可能是人民对自己生活痕迹的怀念，这是一种深刻的感情。而风尚习俗则是构成生活痕迹的重要部分。陆游的诗，写山阴的特别多，尤其是中年以后。我觉得，读他的这些诗，总能使人感到浙江乡村的一种特有气质和风光。长久在本地生活的可能不一定体会到，远在外地的人，时间稍久，读陆游的诗，那种特定环境的乡思之情会油然而生。这就是陆诗的醇厚处，而这就与他的诗反映浙东地区的社会习尚分不开的。研究文化名人，特别是研究作家，注意他们所表现和反映人民生活的痕迹，将会大大扩展研究的天地，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

浙江文化名人不止十个，本书所列应当说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很有特点的，并未列入，如明朝的徐渭（文长）。有些人名气不是很大，但在文化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特别是一些民间艺人、匠人，由于他们与人民生活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创造就更值得珍视。我希望我们今后不要拘于整数，——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现在新的形势下，恐怕也是应当有所突破的。不知出版社的同志以为然否？这套丛书的其他一些选题，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比本书还使我更感兴趣，如浙江的佛教等。我也希望能把浙江的山水胜景，浙江的手工业和民间技艺等，纳入选题中去，极愿早日能读到它们。但它们的难度可能更大。唯其如此，我们更盼望它们能早日写就，早日出版，这对于我们整个文化史以及整个文化问题的研究和开拓都将是一个促进。

1986年7月

注：该文是为《浙江十大文化名人》所作的序。